

中国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研究

万 宇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研究 / 万字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308-11745-6

I .①中… II .①万… III .①书信—研究—中国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5727 号

中国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研究

万 字 著

责任编辑 李苗苗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745-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 | 序 言

万字君和我初为同事,又先后出于梦溪先生门下,自多几分手足相惜。现在,她的博士论文《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研究》即将付梓,嘱我一定写几句话。既有突兀之处,又在情理之中。此事之所以牵涉到我,主要是梦溪先生要求甚严,也不大瞧得上几个弟子的学问,是不可能为我们作序的,所以就轮到我这个并不称职的大师兄代为打理。此为其一。其二也有一些学术因缘。和我的《20 世纪学人之诗研究》不同,万字的《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研究》尽管不直接是“命题”作文,但能够通过梦溪先生的法眼,其间必有很深的家族类似性。而我以“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界定“学人”,也为包括万字在内的几位同门沿用,所以与这个论题不算太近也不算太远。

掩卷之余,首先要感谢梦溪先生允许万字做这个题目。不知道万字是在什么心境下开始做这个题目的,以及是不是理解了梦溪先生对现代学术史的精思深情。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自己就走了一些弯路。记得当时被要求做学人之诗时,我内心就充满了“情非所愿”和被逼无奈之感,以至于几年后在该书的后记中,我还耿耿于怀地写道:“记得在

最初与导师讨论选题时,我本想做一下明末清初的中国诗学研究,想以此为契机基本上打通中国诗学主要阶段,因为我过去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唐宋以前。又特别是考虑到自己对现代学术史及其人物关系的陌生,所以为了选题的事情曾经和导师谈判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也曾做过几个其他方面的提纲,但最后都被严师一个个毫不留情地枪毙掉。导师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以为这些题目无论在参考资料,还是在思想资源上可资借鉴的东西太多,一句话说就是它们都属于太容易做的题目。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起梦溪先生当时那不屑的表情,这使我本想轻松一点拿学位的想法遭受到巨大的障碍。在反复交涉与讨论最终无果之后,我只好硬下头皮来啃这块硬骨头了。”但在经历了更多的风雨阴晴之后,我才读懂了梦溪先生的眼界和格调。而今看来,最大的受益是:在自己精力充沛和比较自由的时候,多接触了一些日后不可能再碰的材料和领域,也沾溉了些许现代第一流大学者的内心图景和学术境界,由此在知识和价值上带来的增益与涵化,绝不是只凭由年轻时候的性子所可以想象的。现在,我就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当一个年轻人还没有清晰的判断力的时候,“听话的孩子”比“不听话的孩子”进步要快;但由于在这个时代要想有清晰的判断力实在太难,所以最好还是要多听师长和父母亲的话儿。

在我这个旁观者和过来者看,“学人论学书信”无疑是最适合万宇做的题目。万宇是古典式才女,喜欢读书和乱翻书,很早就能写一手好书评,在书林界颇有声望。但也有短处,由于不大喜欢理论,所以不可能深入太学理化的抽象领域;又由于不束缚于某家某派,所以也不适合做一般的专学题目。现代学者的“论学书信”,恰好就是一个中间地带。一方面,这个领域有一定的学理深度。“论学书信”不同于一般家长里短或问寒嘘暖的家书,在书信的来往、应和、问答中,主要是发表学术观

点、讨论学术问题、传授学术方法与门径、表达学术意见和评价及总结治学历程和得失,尽管通常篇幅不大,散落各处,但却有言简意赅和披沙拣金的妙用,有时比读“厚厚的大部头”更易得其精要。同时,“学人论学书信”实际上还再现了一个现代学人交际圈,一些重要学术观点、事件只有回到这里才能找出原委,所以还有补主流学术史缺漏的珍贵文献和重要思想价值。另一方面,这个领域充满了人文情怀。“论学书信”不是纯粹系统的学术著述,坦诚率真、朴素平易、毫不讳饰是这种学术话语谱系最独特之处。其中,不仅容易见到现代大师巨子的渊深和高见,也可以与他们的性情和灵魂闭门对话。由万字来做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合适的人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对象。当然,要想通过素以严格要求著称的梦溪先生的门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万字整理的《中国现代学人书信集知见简目》就可以知道,当年她是怎么在汗牛充栋的现代学人著述中披拣、发掘、校讎和考订的,以及怎样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完成了这个看似寻常却奇崛绝的研究工作,在此我要向万字表示由衷的钦佩和祝贺。

当今世界,媒介为王,信息传递高速便捷。但令人感慨的是,传承千年的中国书信日趋式微。与此同时,那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古典话语方式,在“拈花微笑”中进行的自由的思想情感交流更无觅处。就此而言,“学人论学书信”还有一种“继绝学”和“思来者”的深重况味,这也是我愿意把这本书推荐给读者朋友的一个重要原因。谢谢。

刘士林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二日于春江景庐

—| 中文摘要

随着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整理史料工作的不断开展,书信的史料价值也为人们所重视,目前的工作着重于书信的搜集和整理,但对于书信内容的研究仍属空白,本书拟开掘其内容研究,并对论学书信所起到的作用与价值作深入的研究。

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书信论学传统的回顾,从书信的起源、定义、文体特征等方面解析了书信作为文体之一种的特点,并从书信在人际传播中的作用以及从著作权角度的审视下书信的权属问题做了讨论,搭建了书信论学的基础。又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书信论学传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古代学者书信论学内容大抵经历了从论“文”到论“学”的过程,清代学者更为重视书信论学传统,也成为清代学风的特征之一,之后又以胡适为例谈现代学人对于古代书信论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第二章是从学术传播的角度来研究论学书信,也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一,尝试引入相关学科的新理论以丰富研究的视角,将其置于学术交流体系理论中进行研究,赋予论学书信研究以全新的理论支撑。根据“科学交流论”的研究,论学书信就是非正

式交流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非正式交流的鲜明特点,优点在于传递与反馈迅速、选择性强、便于当面示范以传授技术、便于处理敏感性信息等,同时非正式交流所具有的缺乏可靠性和稳定性的缺点,不利于信息的加工和知识的积累,影响了学者、专家对它的使用,书信缺乏严谨性,不如论文发表或专著出版那样严肃认真。第三章是对现代学人书信集整理与出版情况的统计,笔者查阅大量资料编订了统计书目,并根据统计情况讨论了现代学人书信相较于前辈学者们的新特点,体现了书信论学传统的时代特点。第四章着重于从功能入手,讨论论学书信的信息传播、学术组织功能和作为情感纽带的功能。第五章以学术研究基础——文献入手,讨论以抢救图书为中心的学人书信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与特殊价值。

关键词: 论学书信 学术传播 现代学人研究



Abstract

As the lucubrate of Chines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and the work of packing up historical data continue to proceed ,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letters is becoming noticeable . The straight matter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 The first chapter looks back to the tradition of LAD . The first section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tter as one of writing styles through its genesis , definition and feature , and dicusses the functions of letter in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the rights of attribution of letter . In this way , it puts up the foundation of researching LAD .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etter study in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 The third section talks about modern scholars how to succeed and develop the tradition of LAD , taking Hu Shi for example . The second chapter researches LAD from an academic communication point of view , and it is a creative point in this research . That is trying to bring into the new theories of relevant subjects in order to enrich the research visual

angles , researching it under the theories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system , and endowing it a totally new theory support .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packing up and publishing statistic of modern scholars ' letters florilegium . By checking and reading a lot of data and spending a great deal of time , I composd *a brief catalog of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 letters* and *a brief catalog of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 collections* . They discuss the new features of modern and former scholars ' letters , especially the new characteristic—LAD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a .

The fourth chapter puts stress on the functions of LAD . The first function is message transfer . The second one is the academic organization function of LAD . This dissertation describes how LAD takes part in the routine work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s , for instance , recommending teachers to universities , driving clerks moving and establishing academic organizations . It especially analyzes the active functions of those LAD adopted modern media in the academic magazines , and this dissertation takes the letter column of *new youth* for example . Excepting this , the function of letter as an emotioral link is also worthy of attention . The fifth chapter tries to establish ties of LAD by subject , mainly taking the LAD of taking urgent steps to save books for example . The most important example is Zheng Zhenduo and “the documents preservation organization” .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cavate the content of these letters and deeply research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them .

Key words : Letters about academic discussions (LAD) , academic communication , modern scholars

目 录

缘 起	001
第一章 中国书信论学传统概述	013
第一节 书信作为文体之一种	013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书信论学传统	035
第二章 现代学术传播视角下的书信论学	072
第一节 书信论学与科学交流论	073
第二节 书信论学与清代学术交流体系的形成	079
第三章 现代学人论学书信整理与出版现状	094
第一节 关于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的整理、出版状况的统计	094
第二节 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的特征	110

第四章 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的功能研究	119
第一节 论学书信的信息传播功能	119
第二节 论学书信的学术组织功能	133
第三节 论学书信的情感表达功能	158
 第五章 以抢救图书为中心的论学书信	182
第一节 学人书信与图书抢救	182
第二节 郑振铎与图书抢救运动	199
 余 论	226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37
 索 引	240

缘起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①，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话，对于人、文、学术乃至文化及民族兴衰的价值与尊严叙述得庄重而贴切。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正是由这样一个个光烁千古的名字搭建而成，而且他们并不是孤峰突兀，而是一群、一组学术上的高峰林立，汇集成中国学术史中密集的学术等高线，这也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这些学人是如何构成了这段奇妙的学术高原，他们的交际圈是否会有重合和交叠，他们的交游、往来与学术的发展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与人书一》中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简明而深刻地指出学术交流对于学者、对于学术的重要性，“孤陋”又“习染”，由如何

^① 袁英光，刘寅生编著. 王国维年谱长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

能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① 渐渐地,我将研究焦点汇集在书信上。作为人际传播的重要媒介——书信,具有真实、快捷、直接等特性,是人们互通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的重要工具,而现代学人们所写的论学书信更具有传递学术信息、交流、争论及修正学术观点等作用,更能为我们勾勒学术交往的轮廓,是珍贵的学术史料,同样是学术史研究不容忽视的环节。随着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整理史料工作的不断开展,书信的史料价值也为人们所重视,对于书信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详细情况可参见笔者整理的《中国现代学人书信集知见简目》,但对于书信的研究工作仍属空白,对书信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校正误、核时间的简单层次,而是应开掘其内容,并对其所起到的作用与价值作深入的研究。

首先,对本研究题目中的概念作一解析。何谓学人?何谓现代学人?学人的产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② 现代学人本身是20世纪中国的产物,它源于中国现代学术独立意识的产生,并随着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艰苦历程而进化和发展。中国学术在现代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传统学术体系向现代学术转化,包含了两个步骤:第一,是传统四部之学的瓦解;第二,是中国学者在西学影响之下,转用西方近代的学术分类,来统合整理传统学术的一切材料。学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不能排除时代变动及生存环境的影响,这种无论是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

① 原文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对于学术交流对于学人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可谓言简意赅。见:羊春秋、何严等编.《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长沙:岳麓书社,1982:359。

② 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

的巨大转变使身处在学术变革中的学人百感交集,在他们的往来书信中追寻学术史的历史印记,是现代学术史研究上重要的课题之一。

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传统结构性崩溃和现代性重建,在中西文明冲突和融合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科举制度终结对传统读书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新型教育、研究机构从传统上层建筑中解放出来走向独立,以及与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出现等,才终于为“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现实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现代学术与古典学术的最高理念分别在于“学为政本”与“为学术而学术”,那么又可以说,传统学者与现代学者(即学人)的根本区别是由“学术本身是目的还是手段”之分辨而突现出来的。^①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学人并不单指个人,有时也用来概括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与“现代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有重合也有交叉,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仍是一个有着诸多争议的问题。以笔者之见,“学人”作为一个阶层的代表,大体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应有比较完整的教育经历,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准。这里的教育可以是传统的教育,也可以是西方式的教育,有时也可以指非正式教育,例如自修求学的钱穆。

其次,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与学问的研究与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学院派的研究者、教师等,他们以此为职业,并取得相应的报酬,这一点很重要,可以维持学术相对的独立性与尊严。也因为对现代媒介(如报纸、出版物等)的应用使他们具有文化上巨大的影响力。

第三,他们的思想取向常常关注现实政治,求智求变,具有知识分

^① 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8。

子的社会责任感。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较,具有更强的现代意识,不同于传统士绅源于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学人阶层以精英知识分子的形象广泛释放着影响力。

论学书信就是以学术信息的交流、学术观点的研讨为内容的书信,也是书信作为学术交流渠道的类型之一。根据陈平原的意见,论学书信的分类应予以注意。首先应关注书信是否公开发表。经过作者的审订、收入作者正式出版的论文集集中的论学书信是视为著述的公开书信,与以书信形式发表的论文可视为同一类型。这些可视为公开著述的书信阐发的观点正式、严肃,作者考虑到书信会被纳入正式的发表渠道,面对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收信人,而是特定读者群,因此更为慎重严谨。与之相对,则是私人书信,包括作者未发表、或未打算公开的书信,这类书札可与他同时期的著述、已有的学术判断做比对。但是否能作为学术判断的依据,使用未公开的书信,就要特别慎重。这些信件中往往有过分的批评或过分的表扬,都会使作者的本意有所偏差。

其次应注意对论学书信的考量,从学术尺度与文学尺度的不同视角。虽然阅读私人书信的感受更为狂放、随意,能见作者的真性情,但作为论学书信,以之作为学术判断的根据就不一定合适。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学者早年得名,历史感强,他们从很早就开始有将书信留为学术史料的意念,他们所写的论学书信就与在随意状态下评判学术的书信有些很大不同。所以在将书信作为学术史料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文学尺度与学术尺度的关系,剔除个人意气 and 强烈的情感因素,这在使用中要特别注意。作为学术研究的材料,应看重公开发表,作为学术批评的材料。书信、日记、谈话等材料有些虽

是纪实,未必准确。^① 所以将书信作为引证材料要格外地小心,关注作者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什么媒介用什么姿态来写这封信,所采用的观点是一以贯之还是暂时的。例如陈平原就曾建议在编选《鲁迅全集》的时候,《二心集》应不入书信集,而入著作集,因为根据学者王得后的研究,两地书的原稿与正式出版后对人物评价有很大出入,这是作者在考虑场合等因素而进行的修订。^② 这一点在现代传媒出现之后要特别注意,因为期刊、报纸、学术专著等现代传媒出现之后,公开与私人就有了明确的分野。古代学者留下来的著作相对较少,论学书札往往经过精心挑选的,经过辨析与审定。而现代由于档案管理的意识和制度建立,会留下来大量前人的书札,有些书信是未打算公开发表的,就需要格外的注意。

书信论学传统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渊源有自,自有书信往来,人们就借助于斯进行学术的交流与争鸣,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王阳明的《传习录》就是一部以论学书信为主体的著作。书信论学在清代也成为其朴实学风之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曾大加赞赏,并说“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③。它填补了没有学术期刊的缺憾,拓展了学术交流的空间,是古代学术传播体系中重要的环节,同时也是人际传播中的重要渠

① 根据2007年3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对陈平原教授所进行的访谈录音整理,同行的还有南京师范大学的姜晓云。他对本书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② 鲁迅、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与其他书信没有混排,不只因其相对完整,更因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著述”。学者王得后将其与现存手稿相对照,发现鲁迅在整理时做了很多意味深长的修改,具体可参见《〈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4。

道之一。尤其是在摒弃了一般书信中琐细生活细节的论学书信中,一来一往,对于学术的价值判断,未经打磨成熟的学术观点,互相切磋疑问的学术群体都跃然纸上。

另外书信可以证史,从书信中了解这些学人的家庭背景、求学过程、师友关系及人际脉络,以求索各种可能对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造成影响之因素。以个人为研究对象,还原彼时彼刻的真实学术场景,将其置于当时的学术环境中,通过书信往来观察、研究学者处于同一学术空间内,是如何通过书信进行交往而互相影响,又如何借着彼此的交往而激荡出学术研究的新路向。书信也是人物研究的重要资料,是对学术论著、回忆文章、日记、自传等重要资料的补充,同时也可以参照各人物的日记、年谱等资料,了解书信背景、理清年代顺序,中心事件交互参证,厘清错误,使史料更有说服力。鲁迅对此就说过:“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确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①此外,对于了解、研究身处变革时代的现代学人心态,也具有很强的文献价值。

书信论学又是一个往来、交流、传播的过程,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书信的来往问答中,学术观点的形成、碰撞与修订,学术群体的形成、交往与巩固都能相当完整地呈现,具有相当珍贵的文献与学术价值。当时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的碰撞、形成与公布都以书信为载体,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八不”主张,就是胡适借以给陈独秀的书信得以传布的。具体过程可参见文中详细论述。因此,书信——这一边缘性应用文体在论学中的功用对于学术史研究的价值需要重新审

^① 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且介亭杂文二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定、评估。

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书信论学传统的回顾。第一节“书信作为文体之一种”,从书信的起源、定义、文体特征等方面解析了书信作为文体之一种的特点,并从书信在人际传播中的作用以及从著作权角度的审视下书信的权属问题作了讨论,搭建了书信论学的基础。第二节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书信论学传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古代学者书信论学内容大抵经历了从论“文”到论“学”的过程,根据学术发展具体内容的变化而不同,并以明代学者王阳明的《传习录》为例讨论了古代学者们对论学书信的重视与应用。清代学者更为重视书信论学传统,也成为清代学风的特征之一,本节从学者们对待论学书信的态度、论学书信的内容等讨论清代的论学书信传统。

第二章是从学术传播的角度来研究论学书信,也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一,尝试引入相关学科的新理论以丰富研究的视角,将其置于学术交流体系理论中进行研究,赋予论学书信研究以全新的理论支撑。根据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学家H.门泽尔提出的著名的“正式过程”和“非正式过程”交流论(从载体的角度对信息交流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经前苏联情报学家A.И.米哈依洛夫的研究整理,形成了体系严密的“科学交流论”的研究,根据该理论,科学非正式交流是情报生产者与情报利用者之间直接进行的情报交流,正式交流是指通过科学文献系统进行的情报交流。论学书信就是非正式交流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非正式交流的鲜明特点,优点在于传递与反馈迅速、选择性强、便于当面示范以传授技术、便于处理敏感性信息,非正式交流渠道由于能传递大量原生信息而受到学者的欢迎。同时非正式交流所具有的缺乏可靠性和稳定性的缺点,不利于信息的加工和知识的积累,影响了学者、专家对它的使用,书信缺乏严谨性,不如论文发表或专著出版那样严肃认

真。这些社会科学领域中其他学科理论的引入,使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的研究更为深入与丰富,也更具有创新点。论学书信对于促进学术发展的功能体现得更加鲜明。

第三章是对现代学人书信集整理与出版情况的统计,笔者查阅大量资料,花费大量时间编订了《中国近现代学人书信集知见简目》(因人物的时间跨度较长,为求全面,特将收录范围扩大至近代,以现代学人为主),《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全集知见简目》(因大量的书信整理集中在全集当中,所以编订此表,又因学人范围较模糊,为求全面,所以扩大至文化名人,力求使涵盖更为全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根据统计情况讨论了现代学人书信与之前的论学书信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学人书信与现代传媒互相结合这一特点,体现了书信论学传统的时代特点。

第四章着重于从功能入手,讨论论学书信的各种功能。首先是信息传播的功能。在中国尚未形成一个健全的学术资讯网,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图书馆尚未普遍设立,学术期刊尚未普遍发行之前,学术资讯与学者研究成果的传播,受到很大的限制,往往仅及于学者居住地域与人际网络所能到达的范围。当时的学术交流的方式,主要以登门造访、函札往来、著述刊布等传播方式进行,论学书信交流具有灵活、随意、直接、更具新意等特点,对于推动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缺点,相对于报纸杂志、学术期刊、论文集的出版等正式的信息交流渠道,传播的速度缓慢,范围狭小。

其次是论学书信的学术组织功能。本书选取了论学书信对学术机构事务的参与,如为大学推荐教员、策动人员流动、筹建学术机构等角度讨论其学术组织功能,尤其是借助于现代传媒的论学书信在学术期刊中所起到的活跃作用。本书以《新青年》的“通信栏目”为例进行具体讨论。除此书信作为情感纽带的功能也值得重视,例如前辈与晚辈之

间的仰慕与提携,学侣之间的学谊友情与文化托命在本章都有专节论述。

第五章则是以主题串起的学人书信,以抢救图书为中心的学人书信,这里特别以郑振铎在孤岛时期与张咏霓等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珍贵文献为例。一来特别典型,二来因特殊环境,保存下来的材料只有当时的部分书信、日记以及发给当时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等。在这里尝试以“信”证史,大量使用书信材料,用书信材料串起这段历史在写法上也有新的尝试。

总之,笔者尝试利用多维的研究视角对现代学人论学书信进行研究,搜集、整理的资料数量多、涉及人物广泛,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新材料及理论依据,也请方家指正。

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也是不断释疑、存疑的过程。在这里我也将一些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困惑提出向方家请教。

首先是如何处理这些浩如烟海的书信材料?书信材料作为研究史料的优势,显而易见,它不像那些公共领域的文字,经过了沉淀、推敲和修饰,直感式、不事掩饰、雕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写作者的思想情感、学识涵养、秉性爱好,正是其个性化所在。不过如何使用仍是一个问题^①。现代学人留下了大量丰富的书信材料,风格各异,内容丰富,如何寻找到核心线索,将这些碎片一一串起,进行研究呢?经过苦苦的思索与寻找,本研究以学人书信的“功能”为核心研究这些论学书信,信息

^① 对于如何使用论学书信的材料,也存在分歧,罗志田教授说,采用这种个性化的史料,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仍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相对客观的史事”,“每一带有个性的史料原是历史之部分,其真实性不仅不让档案中的官文书,有时且过之,最宜为史家所采用”,而根据前文所叙,陈平原的意见是审慎地使用私下场合、特定读者的书信,而应关注公开著述形态下的论学书信。

传播功能、学术组织,以及贯穿于书信当中的“情感”线索,都属开创性研究。因无研究模板可循,颇有推敲、寻觅之苦。是否还有另外更为恰当的研究思路?

朱维铮在为廖梅著《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一书的序言中也这样谈到以书信为研究材料的不足,“作为真正由第一手史料汇集而成的《汪康年师友书札》,固然极其珍贵,却有着书信体史料的天然不足。那就是它们都属于私人通信,一般用来交换收发双方个人或很小群体之间互相感兴趣的信息,就是说写作目的通常不是为了发表,因此涉及历史研究由以确定基本史实的史料诸要素,所谓时地人事,往往语焉不详,并且为安全计,还故意不署时间地点及双方名衔,更常用隐语代称以表示指涉的人或事。不仅如此,由汪康年、汪诒年兄弟细心保存的大批书信,都属于来函,除少量有汪康年等人的词组批注以外,都没有汪康年的原函或复函可资比照。因而作为历史资料,它们都是单方面,即使指涉的时地人事都较清楚,依然会给研究者带来困惑,难以从中认知汪康年或相关事主的见解、响应与活动实相。另外,手稿的漫漶和笔迹不一,以及众手编校必有的水准参差,也使书札的整理出现若干失误。”^①当是深有体会之言。书信作为史料的不足,还在于需要和其他史料结合、对照,若单从书信史料入手,不掌握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学术经历、学术特长及所叙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政治气候及学风等不作深入的了解,往往望文生义,或理解得不够完全及深刻。作为研究者,时有坠入无边的资料海洋之感。

第二是如何全面考量论学书信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价值?长久

^① 朱维铮.序,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以来,以人物为单元的研究方法使我们难以将这些学人放置于学者群及学者社会之中进行考量,他们之间的学术往来书信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追溯而上,又是什么因素引发这些书信往来?是师承?是地缘(例如同乡等)?是社团?是学问上的亲近与惺惺相惜?这些其实都是学术史应该关注而不受重视的问题。王汎森在其《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①一文中是这样探讨“思想史与生活史”的关系:

透过傅氏的来往书信,其实已大致可以将当时中国活跃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网络勾勒出一个大概。不同网络之间有的重叠交叉,但有许多完全没有任何“重叠共识”。在没有重叠共识的知识圈之间,互相的仇恨与猜忌相当严重。

……与傅氏有函札来往的大多是新知识分子,或与“五四”有关,或在英美受过教育,大抵是当时中国各门学问的领导人物,其身份与胡适通信者有极大的重叠关系,足见二人之为同一学派,决非无根之说。

^① 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11—343。该文通过对傅斯年档案的解读,探讨“生活史与思想史可能有交会吗”的问题,“如果有,如何描绘出来,这是吾人阅读私人档案时心中常存的问题。以傅档为例,究竟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重新建构傅氏的生活史,并作为我们了解其思想及转变的凭借。”他所指的材料当然不仅限于书信,包括日常生活所涉及方方面面,以傅档为例,包括日用品、催稿信、账单、便条、给学生的试题乃至医院诊断书等。《生活史与思想史可能有交会吗?》一文用傅的购书记录讨论其学术研究兴趣在“留学时期的几次转变”,很有新意。

我们当然可以计算出傅氏个人生活网络的边缘所在,及它的消长与变化,并将此变化与傅氏思想或政治观的变化相比勘。我们也可以观察傅氏的政治关系网如何逐步扩大,也可以看出傅氏的政治交往圈中,大致限制在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官僚,那么他的政治取向亦可知矣。

这一提法相当有意思,不落俗套。用信函来勾勒人际交往网络,考察“重叠共识”的形成及反作用,可以说在研究方法上独辟蹊径。考察“重叠共识”这种既可以充当思想史的可“信”史料,又能充分反映研究对象之生活细节的研究方法,王汎森并未给出研究的范本,因此笔者也在不停地探索之中。

论文在这些不断的困惑当中逐渐完成,笔者也曾自我解嘲地想,也许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具有同样的价值,在现代学人书信研究的这一重要性远被低估还未被太多学者开垦的学术领域内,论文能够作为一个醒目的问号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点启示,笔者就足够欣慰了。

另外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因为论文中涉及人物很多,多为著名的学界前宿,为求真切、简洁、行文方便,一律不用敬称。

——| 第一章 中国书信论学传统概述

第一节 书信作为文体之一种

一、书信的定义与书信的起源

首先应对“书信”这一研究对象做一概念上的明晰。古代,“书”、“信”各有其意,书,指书信或书写之动作。信,则指信使,送信的人。书,書,《说文解字》这样解释:“箸也,从聿者”,与“笔”同部。侧重于书写之动作。人类发明文字以后,既有地域之隔,自有信息之阻,则必有书牒之达。查先秦的各种典籍,唐尧禹舜夏商周时期已有某些文字或即书信,则上古书牒文献,犹有存焉。上古时代,以文字元号记事、记言的东西统称为书。凡著于简册、上报下命,往来声问之文字,原先通称为“书”。书之为体,起于实用,它一开始就显示出其固有的

特征:对象性、叙述性和传递性。^①而“信”在古文中有音讯、消息之义,如“阳气极于上,阴信萌乎下”(扬雄:《太玄经·应》)。“信”的本意也有信用,可信之意,也从侧面说明了书信的“真实”的特征。

至周代,讯传之事发展为愈趋完备的“传遽”制度。“传”为驿传之车,其字取义于“转”,为“专”之假借;“遽”为驿传之马。专置“行夫”之官掌邦传遽之事,特设“置邮”(驿站)以“传命”。又据《礼记·曲礼下》、《诗经·小雅·大东》、《国语·周语中》等,可知周代在道路修建与保养方面更有规模性要求。《易·旅》中叙商人行旅,已有止宿的“处”、“所”即旅馆之便。《周礼·地官·遗人》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以仓廩委积供羁旅艰厄之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驿制之规模。一般情况下,信件由驿道一站一站传递,遇有紧要之事,则派特使专送。《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传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杜注,“执讯,通讯问之官。”孔疏:“使执讯,使之行适晋也。”其讯传之便捷可见。这说明在周代,书信往来,讯息通达就已经初见雏形。之后,关于“书”、“简”的文字记载开始见于先秦古籍。从《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中的“嗣音”可见当时书信已经成为民间交往的重要媒介之一。^②

秦汉以后,书信体制和观念有了变化,一方面由最初的“书”嬗演出“章、表、奏、疏”;另一方面又从“奏疏”一类文体中分化出“笺启”,而又复归于书信。按照外在形式又可称为“函”;欲密奏为防宣泄故封板称“封事”;若欲大张讨伐之旗,或是出师获胜报捷,便“书辞于帛,建

① 黄维华.书信的文化源起与历史流变.江海学刊,1996(3):170.

② 黄维华.书信的文化源起与历史流变.江海学刊,1996(3):171.

诸旗杆之上”，“露布不封，播诸视听”，这种类似于公开信的文字，则称“檄书”，或称“露布”。刘勰《文心雕龙》中云：“（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就是说，把想要说的话写在简册上，于是语言变成了文字，这正是“书”的原始含义。“陈之简牍”的“陈”字，还应有以简牍上的文字相“陈”受信者的意思，如此，则刘勰的释义就已包含了书信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

从书信体在刘勰《文心雕龙》中所占的篇章看，刘勰对书信一体非常重视。刘勰论述书信的篇章主要集中在《书记》一篇，但并不局限于此。《书记》一篇涉及 20 余种文体，主要谈论的是书信体，其他 24 体都是书信体的附录。《书记》之外，《诏策》、《章表》、《奏启》、《议对》四篇所谈论的也属于书信体。刘勰对于书信一体非常重视，他不仅对书信作出了细致的分类，而且概括了书信的总体特征和不同类型的特征，强调了书信体的文学特征，描述了历代书信体的流变，评论了书信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从而在中国书信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信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刘勰看来：“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①“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既驰金相，亦运木讷。万古声荐，千里应拔。庶务纷纶，因书乃察。”^②，简牍最大的功能是使人“明决”、“乃察”，是人们交流思想、传递情感的重要工具之一。

但是，刘勰的书信观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他过分强调了君臣书信，将皇帝的诏书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另外，依据古代书信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书信可以分为这样三类，一是君臣之间的书

① 书记篇，刘勰著，周振甫译. 文心雕龙今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6：230。

② 书记篇，刘勰著，周振甫译. 文心雕龙今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6：242。

信,二是士人之间的书信,三是家书。可以看出刘勰论述的重点在第一类。^①

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序其“奏议类”云:“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颂之。”序“书说类”又云:“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②从文体上来解读书信,探究书信的文体学特征,是对书信的解析方法之一。现在仍沿用这种对书信的解释,《辞海》对“书”的解释之一为“信”,如“家书”,对“信”的相应解释为“书信”。基本未予定义。《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书信”的解释为“信”,与“书”的第四个解释项相同,“书”,即“书信”,举例为“家书”、“信札”;对“书札”的解释为:“〈书〉书信”,书信的书面用语。对“信”的解释为“按照一定习惯的格式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指定对象看的东西;书信”,举例为“送信”、“介绍信”、“证明信”;对“信札”的解释为“书信”。^③

以出土文献为证,在甘肃出土的简牍文书中,其记录的内容,除与汉塞守备、防御和邮驿有关的资料外,还有私人书信。这些私人书信真实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场景。在汉代县泉置遗址出土的一件帛书,不仅保存完整,而且文字清晰,提供了汉代私人书信的完美标本。

自释文可知,信中涉及买沓、买笔、买鞭、刻印、寄钱诸事。“伏地

① 孙明君.刘勰之书信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② 谭邦和.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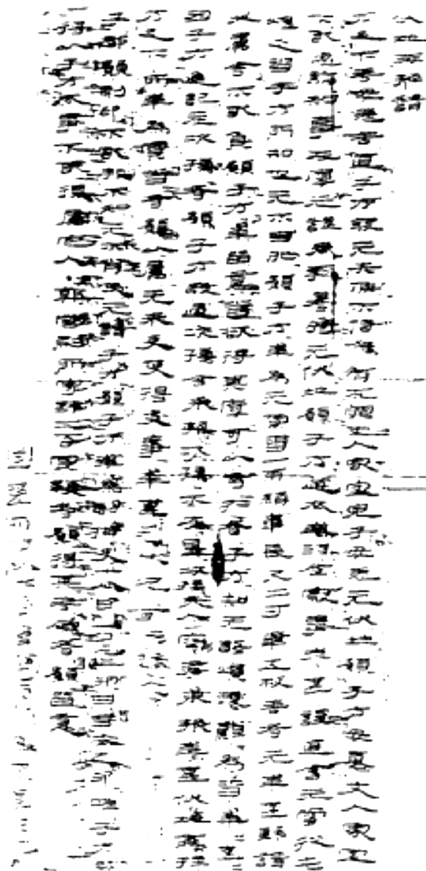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064,1284。

再拜”、“请”、“善毋恙”、“幸甚”诸词为当时的常用语。帛书的内容为：

元伏地再拜请：

子方足下善毋恙苦道子方发元失候不侍驾有死罪丈人家室
 儿子毋恙元伏地愿子方毋忧丈人家室 元不敢忽骄知事在库元
 谨奉教署时元伏地愿子方适衣幸酒食察事幸甚谨道会元当从屯
 敦煌乏沓子方所知也元不自外愿子方幸为元买沓一两绢韦长尺
 二寸笔五枚善者元幸甚钱请 以便属舍不敢负愿子方幸甚留意
 沓欲得其厚可以步行者子
 方知元数烦扰难为沓幸甚
 幸甚 所因子方进记荏次
 孺者愿子方发过次孺舍求
 报次孺不在见次孺夫人容
 君求报幸甚伏地再拜子方
 足下所幸为买沓者愿以属
 先来吏使得及事幸甚。吕
 子都愿刻印不敢报不知元
 不肖使元请子方愿子方幸
 为刻御史七分印一块上印
 曰吕安之印唯子方留 意
 得以子方成事不敢复属他
 人。郭营尉所寄钱二百买
 鞭者愿得其善鸣者愿留意。

自书所烦以市事幸留



意留意毋忽异于它人。^①

这一珍贵的出土文献形象地为我们提供了书信的样本。应该指出的是,古代“书信”连用并不普遍,如晋王羲之《杂帖》中“朱处仁今何在? 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又《晋书·陆机传》:“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②而今之“书信”实际上正如《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实际已成为一个偏义名词,其实指的就是“信”了。

古人对书信有很多不同的称谓、别称,以“尺牍”最为常见,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典籍。在纸未发明以前,人们常削竹片和木片作为书写载体,竹片称“简”,木片称“牍”,长度约为一尺。故书信被称为“尺牍”,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缙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又《汉书·陈遵传》云:“(陈遵)瞻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③后世文人辑其书札或选编书体文字,亦喜以尺牍^④命名。此外,因其书写工具、材料或方式而得名的,如“简”、“帖”、“笺”、“札”、“牍”,因题材而分为“简”、“札”、“启”、“笺”、“帖”(或作“贴”)、“表”、“疏”、“函”、“上书”、“奏议”、“封事”、“尺牍”、“尺素”、“尺翰”等等。也有用素绢、帛、缣等织物写信的,如“尺素”,晏殊《蝶恋花》:“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魏晋以后流行用纸、帛作为书写材料,刚开始用纸时,一般是每页墨书八行,故书信也叫“八行”。孟浩然有《登万岁楼》诗云:“今朝偶见同袍友,却喜家书寄八行。”又有代指,“鲤鱼与鸿雁”,它们不仅借代了书信,而且这些丰富的同义语

① 张俊民.两千年前的私人书信.档案,1996(6):35。

②③ 吴士海.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书信别称.档案与建设,2000(5):55。

④ 如周亮工《尺牍新钞》系集明末清初文人的短札;《秋水轩尺牍》则是清末许思湄自己的往来应酬之作成集,皆可证。

境也是汉语文化的结晶,具有文化价值。^①

此外,流传下来的尺牍墨迹,名人手迹也有相当部分的内容属于书信,如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丧乱帖》、《孔侍中帖》等,至于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名人尺牍,更为众多。这又涉及书法艺术传统。由此而生发出的艺术收藏传统,也使书信更具丰富性。收藏家中有专门搜集书信尺牍的,例如郑逸梅,自称有藏札癖,“寸缣尺素,广事收罗”,曾集名家信札数百家,有《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一书问世。郑逸梅的好友彭谷声,月积年累,所得自宋司马光信札始,以及元、明、清、民国等历代信札十万通之数。其子彭长卿,也有《名家书简百通》一书问世。著名的藏札家还有吴式芬^②编成的《昭代名人尺牍》一书,石印问世,影响广泛深远。之后信札印本,著名者有吴长瑛的《清代名人手札》印本、裴景福等的《明清名人尺牍墨宝》印本、谢行惠的《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牍》印本、龙伯坚的《近代湘贤手札》印本及《董香光手札墨迹》印本、《王文敏手札墨迹》印本、《翁覃溪手札墨迹》印本、《刘石庵手札墨迹》印本、《陈曼生尺牍墨迹》印本、《翁松禅手札墨迹》印本、《袁忠节公遗札》印本等等。包括近现代学人的手札信函,很多也是书信艺术珍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与欣赏价值。因此,原版影印的留真版也是体现这一艺术价值的出版手段。

看似简单的书信,包含着众多互相浸透又各自生长、发展的传

^① 薛海兰.个人书信与修辞说略.平顶山师专学报,2004(8):68.

^② 吴式芬(1796—1856),号诵孙,山东海丰人,1835年进士,后为内阁学士,善书法。其弱冠时即喜旧人信札,40年里经眼者数万计,在他62岁时,编就《名家书简百通》,包括清代顾炎武、黄宗羲、傅山、宋曹、王时敏、王鉴、邵弥、陈洪绶、肖云从、项圣谟、王铎、孙承泽、周亮工、梁清标、笪重光、朱奎、龚贤、查士标、程邃、王原祁、吴历、朱彝尊、高士奇、汪士慎、金农、丁敬、郑燮、袁枚、刘墉、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钱沅、罗聘等在内六百余家、七百三十余札。

统,文学的、历史的、艺术的,如何条分缕析,保持清晰的研究思路,既不能将其割裂,又不能陷入混沌,这是书信研究当中应予以注意的问题。

二、书信的构成与修辞、语体特征

从书信的定义看,主要是从其作为人交流思想、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应用文体来定义,因此下面简单讨论书信从文体角度的构成及文体特征。

1. 书信的构成

书信由“笺文”与“封文”两部分构成。“笺文”即写在信笺上的文字,也就是寄信人对收信人的称呼、问候、对话、祝颂等等,也是书信的正文部分。“笺文”是书信内容的主体,书信的繁简、俗雅及至其他方面的风格特征,几乎都由内容主体决定。“封文”即写在信封上的文字,也就是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和寄信人的地址、姓名等等。封文是用于邮递的,万一投递不到,能将信退还给寄信人。完整的书信应包括笺文与封文。

虽然,书信是一种个性很强的文体,写法上也比较灵活,但在写法上仍应该遵循一定的要求,最基本的可概括为以下两点:①必须合乎规范;书信写作规范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书写格式的规范,二是书信语言的礼仪规范。②言之有物,真实可信;“信”字本身含有信任、信用之义,这要求书信不论写给谁看,所述之事都要真实,言之有物。

根据交际目的,书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用书信,由单位间使用,如介绍信,证明信等,统称为公务书信。另一类是由个人之间日常用于交际沟通、传递信息,称为社交书信,是人际传播中的重

要渠道之一。即使在储存交流信息的物质手段高度发展的今天,书信依然是人际交往的常用手段,其私密性、灵活性及传递思想的快捷性都是其他现代化手段难以完全替代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在进行重新建构,书信的使用另有一新的发展动向,便是原先私函类中因为个人需要而向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知名学者等个人所发的事务性的信件,这一类信件的使用量逐渐增多,值得注意。

2. 书信的修辞特点

书信体语言作为人类历史悠久的一种语言交流活动,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累,已形成了特有的修辞特点。

针对性:任何一种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对象、范围、情境下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展开,书信的听读者往往是确定的或单一的,并与写说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是,双方具有“共知的条件和思想感情上的相通因素”^①,因而使得这种信息交流很易完成。书信往来双方因为这种心灵上的默契,能够自然、轻松地使用独立语、缩略语,甚至是只有双方通晓的秘密语、双关语等。而其他文体需要考虑大众的接受程度。针对性在于怎么写还要根据听读者的身份、年龄、学历等有针对性地选择措辞,具体应该坚持贴切、广泛、逼真的原则,依据对象的不同分别选择通俗、文雅、严肃、幽默等不同风格的词汇组句。另外,书信中的上下款称谓、首尾敬颂辞等也是颇有讲究的。

得体性:修辞的最高原则就是得体性原则。得体性的要求,一方面,是要求说话人(写作者)必须注意、重视、保持自我;另一方面则是,说话人(写作者)必须注意、重视、适应交际对象。话语同说写者自己的身份、风格和教养保持一致,“从修辞的角度讲,它不仅仅是语言文

^① 刘焕辉.言语交际学.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78。

字的技巧运用问题,也是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个性、气质,风度的外在表现形式。”^①

私密性:有助于融洽交际双方的情感,缩短对话的距离。一时难以启齿的,书信可以冲破“心理场”使交际成为可能;言不尽意的,书信可以让人从容自如,淋漓表达。因此,书信的情感表达较之口语交际更为细腻淋漓。^②

对于书信体语言的修辞,研究者们多给出的是一些性质上的描述,是定性的研究。也有的研究者以语料统计的研究对书信语体的特征进行分析,很有新意。该统计、比较研究是将书信体语言与文艺语体散文相比较,以表1的统计结果看,书信语体语言中辞格的运用效率大大低于散文,证明“书信语体不以细致描写见长而执意追求接近口语色彩言语描述的特征”。^③从表2的统计结果看,可以看出书信语体的语言中句式变化的频率平均高于其他语体,书信体语言自由灵活,省略句能简短明晰地传递信息,变式句能灵活自由地体现丰富的话语含义,非主谓句能精巧干练地表达出人意料的谚语效果,紧缩句洗练浓缩能表示周密的语义组合。这些句式在谈话语体中运用较多,显示了人们自然的语言状态。从而得出结论,“总之,书信体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多方面都显示了自己作为日常谈话语体中分语体的特点。”^④

为能形象地展现这一量化研究的成果,特将两表显示如下:

① 王希杰.修辞学导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466。

② 薛海兰.个人书信与修辞说略.平顶山师专学报,2004(8):68。

③④ 李敏红.试论书信语体的语言特征.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2):28—31。

表 1 语言材料分析表

语言材料	鲁迅 《致颜黎民》 (书信语体)	董必武《给 女儿的信》 (书信语体)	苏步青《自学 成才是“想吃 天鹅肉吗?”》 (书信语体)	刘白羽 散文《绿夜》 (文艺语体)	朱自清 散文《南京》 (文艺语体)	三毛散文 《永远的母亲》 (文艺语体)
语料字数	864 字	1144 字	2548 字	960 字	3150 字	3692 字
独立语	4 个	7 个	11 个	1 个	6 个	4 个
频 率	1/216	1/163.4	1/231.6	1/960	1/525	1/923
叠音 形容词	0	0	2 个	7 个	15 个	10 个
频 率	0	0	1/1274	1/137.1	1/210	1/369.2
辞格类型	比喻、比拟、 对比	比喻、反复、 排比	对比、对偶、 排比、反复、 移就	移就、比喻、 摹声、比拟	比喻、排比、 反复、通感、 对比、引用、 对比	比喻、移就、 拈连、比拟、 呼告、排比、 回环
辞格数量	3 次	3 次	5 次	5 次	20 次	17 次
频 率	1/288	1/381.3	1/509.6	1/192	1/157.5	1/217.2

表 2 语言材料分析表

语言材料	董必武《给 女儿的信》 (书信语体)	苏步青《自学 成才是“想吃 天鹅肉吗?”》 (书信语体)	三毛散文 《永远的母亲》 (文艺语体)	毛泽东 《孙中山的 精神》 (政论语体)	王群航《金融 时报》1998 年 12 月沪市 A 股行情综述 (科技语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198 号《城市道 路管理条例》 (公文语体)
语料字数	1144 字	2548 字	3692 字	2400 字	2041 字	4311 字
陈述句	25 个	52 个	84 个	35 个	42 个	64 个
频 率	1/45	1/49	1/44	1/68.6	1/48.6	1/67.4
疑问句 祈使句 感叹句	5 个	11 个	6 个	9 个	0	0
频 率	1/228.8	1/231.6	1/615.3	1/266.7	0	0
语气词 种类	吗,的,呢, 了,么	的,吧, 呢,了	了,罢了, 的,啊	呢,的,呵	了	无

续表

语言材料	董必武《给女儿的信》(书信语体)	苏步青《自学成才是“想吃天鹅肉吗?”》(书信语体)	三毛散文《永远的母亲》(文艺语体)	毛泽东《孙中山的精神》(政论语体)	王群航《金融时报》1998年12月沪市A股行情综述(科技语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8号《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公文语体)
语气词数量	12个	22个	18个	9个	1个	0
频率	1/95.3	1/115.8	1/205.2	1/266.7	1/2041	0
省略句	18个	21个	15个	10个	3个	1个
频率	1/63.6	1/121.3	1/246.1	1/240	1/680.3	1/4311
非主谓语 倒装句 紧缩句	2个	5个	1个	9个	1个	0
频率	1/572	1/509.6	1/3692	1/266.7	1/2041	0

当然这一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选择的研究语料都是现代书信,大量的古代、近代书信材料未加运用。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白话与文言、口头与书面有语体的问题,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轨迹,如果书信体研究只关注现代、当代书信,就放弃了相当范围的研究范围。第二,语料选择中如何避免以个体代表整体,由于书信这种文体自由、私密,写作者可以在最大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个性,如何避免这些个性的偏差对整体的影响,因此选取语料要特别慎重,而不能像该文都从程国政主编的《中外名人书信导读》(晨光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中选取例子,难免以偏概全。因此,对书信语体的研究还有不少领域等待研究者不断努力。

三、书信在人际传播中的作用

“人际的”(interpersonal)一词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汉语里,“际”字有“彼此之间”、“回合”与“交际”之义,突出建立交往

所需要的根基、背景与空间、表示人与人可以在此相遇、相关、会合、召唤,甚至发生相互的伤害。个体交往者也可以通过传播、彼此联系,获得和谐的、困厄的、深刻的、肤浅的,甚至无从解释的传播关系。^① 人际传播是在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进行的,面对面的或凭借简单媒介如电话、书信等非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交流活动。包括面对面传播和非面对面传播,前者如面谈、演讲等,后者如书信往来、电话交流等。一般来说,人际传播具有个体性、参与性强,易于反馈,可控性高和富于人情味等优点,缺点是传播面窄。人际传播是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基础。

人们寻求人际传播的动机可以表现为四个方面:

(1)获得与生产、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关的信息从而进行环境适应决策。也就是说,人们要能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就需要了解环境的变化,并以此为依据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要获得关于环境的信息,人们常常要借助人际传播。

(2)建立社会协作关系。通过了解他人,和让他人了解自己,来达到协作目的。而有效的渠道,就是人际传播。

(3)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自我认知常常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形成,即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这面“镜子”来认识和把握自己。相互认知更是离不开人际传播。而这两方面是建立社会协作关系的必要条件。

(4)满足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和伙伴,可以让人产生愉快的心理反应。^②

① 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

② 彭兰.网络中的人际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3)。

我们依此理论来探讨书信在人际传播领域中的应用,书信是由“写”与“读”双方交互的传播行为。有时是仅限于两者之间、双方之间的传播,有些则是公开的、多方的传播,例如公开信或是小范围传看的信件。获取信息,建立社会协作关系,自我认知,获取精神与心理上的满足,这四个方面的动机在传播过程中得到满足,也是书信在人际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也是本研究开展的内在线索与研究理路。

在这种人际传播过程中,需要遵循几项最基本的原则。首先,就是合作原则。这是人际交流最基本的原则,它是书信交际获得成效的前提。交际双方只有互相配合,密切合作,才能展开正常的交际。

其次,是语境原则。任何一种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对象、范围、一定情境下,为着实现某种目的而展开的。人——写作者、阅读者,则是构成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年龄、文化、阶层、个性、气质、身份、经历、处境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对交际活动有着制约作用。

第三,礼貌原则。对于书面人际传播而言,礼貌原则更为讲究。尤其是古代书信,在长期写作历史中,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极其丰富、自成体系的格式。如上下款称呼,因人而异;首尾致敬祝颂之辞,多有许多习惯用语;抬头空格,也有通行款式。譬如对收信人称谓,依对方身份而选择不同的用语,对尊长,如长辈、老师、官高位尊者,此类收信人概不写名,一般也不称其字,直接用相应称谓,且使用敬辞。“膝下”专用于父母,“函丈”专用于老师,“麾下”、“节”专用于将帅、督抚。通用的敬辞有:钧座、道席、座下、尊前。至于现代书信,也十分讲究文明礼貌、道德风尚,语言力求文雅、和气、谦虚。^①

第四,情感原则,书信交际的礼貌原则有助于维持或加强交际双

^① 陆欣.书信修辞简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4):68。

方的社会关系,而情感原则有助于融洽交际双方的情感,缩短对话的距离。

四、书信的权属:从著作权角度的审视

前文对书信从定义、来源、文体、在人际传播中的作用进行了综合性的介绍,下面本研究从著作权的角度对书信进行重新的审视与考量。因为从著作权角度的解析关系到书信的权属、发表、整理等诸多方面,尤其在知识产权受到日益关注的今天,这些审视与考量具有特殊的价值。

书信由矛盾的多维构成,既可以是私密的,又可以是公开的,既包含私人书信,又不乏一些向公众公布信息的应用文。如果从权属角度来审视书信,应该将私人书信与公开信等分开。如何定义私人书信?笔者赞同安玉萍、沙莎在《私人书信作品发表权论析》中的定义。

私人书信是指私人之间,多是作者与其亲朋好友之间的往来信件,内容大到社会时事政治、工作学术研究,小到家庭子女教育、朋友之间的文宴酬唱以及人情世俗交往,不适用于官方的文件、信函和涉及国家利益的文献、书信。^①

这一定义可以将用于公共领域之内的公开信函等与私人书信分别开来,这样讨论其权属也更为方便。关于书信的权属,首先,是讨论书信是否具有著作权?私人书信是否是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① 安玉萍,沙莎.私人书信作品发表权论析.青海社会科学,2004(6):120。

我国《著作权》并未明文规定,但在有些国家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是作品。如《意大利版权法》第六章第95条对书信作品作了特别规定:前面各条适用于受版权保护的书信,即使该书信已进入公有领域,但不适用于官方的文件和信函,以及涉及国家利益的文献和书信。

我国《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造成果”^①。一般认为,作品要成为著作权客体,须具备独创性和可复制性两个条件。对于书信作品,可复制性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独创性,是指由作者独立构思而成的,作品的内容或表现形式不是或基本不是同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相同,即不是单纯摹仿、抄袭、篡改他人的作品。^②那么,私人书信只要是作者直接创造的,是作者思想感情的体现,不是单纯摹仿或抄袭他人的作品,就完全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特定要求,应该可以成为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的。笔者认为,在符合作品独创性条件下,私人书信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私人书信作品的作者享有著作权,包括发表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权、修改权,并能具有对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

由于书信作品具有作品原件发生转移的特殊性,著作权与原件所有权分属不同的所有者,这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书信的物权应该属于谁?在承认私人书信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畴的前提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著作权法第十八条关于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见沈仁干,钟颖科著.著作权法概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56。

②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53。

的规定,适用于任何原件所有权可能转移的作品。”^①因此,私人书信作品的著作权人应是作者,无论书信的邮寄、投递、保存等过程中发生何种变化。那么信件邮递给收信人之后,所有权是否享有所有权呢?“英美法系国家认为:如果所有权归发信人所有,对于收信人而言,所有权原则就会要求收信人的利益而保留书信”。

“如果从大陆法系的物权理论来分析,则仅能依法律行为来解释:即发信人将书信投邮的行为,是赠与行为,是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当收信人收到信件,便发生了物权的转移,而由收信人享受书信的所有权,即享有财产所有权。”^②但收信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收信人作为作品载体所有人,其财产所有权与著作所有权是不同的,前者强调对实物的直接占有和处置,仅仅含有财产因素的内容,得物获权,物去权去。收信人可以凭其对书信享有的所有权而转让书信,按照一般财产的用途使用该书信,可以再转让、展览、长期占有,或销毁、丢弃之。例如现代女作家林徽因在去世之前将自己收藏的信件毁掉了,不少研究者深觉可惜,认为这些书信都是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史料,毁之可惜。但也应对林的书信所有权予以尊重。

如果这些书信不毁掉,而是予以公开,就涉及第三个问题,书信的发表权属于谁?因为私人书信作品多是对现实中真人真事的描述和真实观点的流露,其内容往往牵扯到当事人的隐私、名誉与声望^③,因而其是否发表、何时发表、何地发表、如何发表对于当事人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其发表权的行使与一般作品有诸多不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见沈仁干,钟颖科著.著作权法概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60。

② 周敏.书信的著作权、物权和隐私权.河北法学,1999(6):86。

③ 安玉萍,沙莎.私人书信作品发表权论析.青海社会科学,2004(6):120。

书信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发信人将自己的隐私透露给收信人,主要是出于对收信人的信任,如果将展览权赋予收信人,则容易引起侵权,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如果发信人已在书信中表明可以将信件公开,收信人才可以行使其展览权。如胡适在写给杨联陞的信中,曾经多次提到将信件交给他人传阅。否则,即使发信人已于书信原件所有权转移前公开其隐私或商业秘密,收信人未经写信人同意仍然不能展览该信件。收信人作为原件的所有者,并不享有类似于发表权的展览权。然而,由于书信作品的发表有可能涉及收信人以及其他人的个人隐私,因此,从维护作者以及原件所有人和第三人的人格利益考虑,私人书信作品的发表权应受到限制,其发表应需要经过作者及收信人的许可。《意大利版权法》第93条规定:凡具有机密性质或涉及个人生活隐私的书信、书信集、家庭和个人便笺及性质类似的书写物,未经作者及收信人的许可,不得发表、复制或任何方式公之于众。另外,对于涉及第三人的人身权利的书信作品的发表,还要征得第三人同意。前苏联、乌兹别克等都有此种规定。

有学者将投邮书信视为一种附加条件的赠与行为,收信人取得所有权就必须遵守所附条件,一般认为所附条件包括妥善保管、保密以及写信人在书信中明确表示收信人应当遵守的条件。根据修正后的著作权法,我国对展览权的范围有所限制,它仅包括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的原件或复印件,排除了其他文字、音乐等作品。因此,书信作品的发表权归写信人所有,收信人对原件的所有权是一种受限制的权利。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关于书信的权属问题。首先,只有作者能够接触到作品,才能行使发表权,尤其是书信作品。书信作品的接触

权,有的国家的著作权法要求美术作品的买主承担义务为作者复制(至少是以拍摄方式复制)其作品有的国家规定了作者接触作品的权利。如原联邦德国著作权法规定:“如果为制作复制物或改作且不损害占有人的合法权益,著作人可向占有著作原件或复制物的占有人要求让他接触原件或复制物。”我国《著作权法》并无相关规定。从保证作者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角度出发,规定原件发生转移的作品的作者享有作品的接触权是有必要的。其次,书信作品原件的返还请求权,书信返还请求权是对原件所有人所有权的一种限制。许多国家的著作权法不承认作者享有作品原件返还请求权。我国《著作权法》没有确认作者享有作品原件返还请求权。

五、书信的研究价值

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推进,目前最大的瓶颈因素恐怕就是史料建设的严重不足。通常我们看学术刊物上的相关文章,还有坊间的各种学人传记或者特定专题的研究性专著,感觉太多的一般性层次的重复和泛泛之论。不少作品缺乏扎实的史料根基,不仅某些断言或引用缺少必要的出处标示,而且当读者查考到原始文献后才能发现那样的断言或引用经常属于曲解原意或断章取义。因此,有学者指出,“做学术史研究,一个最基本的工作便是史料建设”。^① 史料的建设包括年谱的编定,政府以及教育或研究机关发布的有关学术制度的法令及规则、重要会议的原始记录、学人书信、日记、谈话录等等。

^① 贺卫方.史料建设.云梦学刊,2006(4)。

1. 书信作为思想史、学术史的史料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思想史的写法》中在处理史料的问题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书籍等等，是否也可以作为分析文本进入思想史的视野？”^①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思想史家如何去吸纳和诠释这些文本，也在于如何去改变过去习惯的叙述方式”。他认为经典文献在进入学者的叙述之前，他们已经在选择、编辑、写作、评述的历史中，经过“意识形态”（政治性的价值观念）、精英意识（传统的对精英历史资料的关注）、道德原则（例如，何为文明、何为鄙野的判断）和历史学叙述（观察、剪裁和修饰）这几重筛子的过滤，已经未必那么真实可靠了。而考古发现和作为文物的那些文字资料，如有名或无名的碑刻、艺术性的书画题跋、大量叙述家常与礼节问候的书信以及民间流行的各种通俗读物，反而并没有经过这种有意识的筛子，倒有可能有利于重建或呈现思想的真实历史语境。

以笔者所见，复旦大学历史系廖梅博士在其博士论文《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对《汪康年师友书札》中的书信材料使用颇为娴熟，仍以日记、书信等多种材料互证，驾驭得当。而广州的《东方文化》杂志在2003年第2期推出的日记专题与第4期推出的书信专题也在对史料的运用上提供了有价值的模板。《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夏济安日记的“阴暗面”》、《阅罢即焚的书信——汪大燮的生平与晚清历史》、《亲切的自叙传形象的编年史——朱自清日记》、《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仅从这些日记与书信研究文章的题目来看，它所传递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35。

的信息就很丰富,日记和书信作为史料的重要价值和功能,于此也可见一斑。

廖梅博士在《阅罢即焚的书信——汪大燮的生平与晚清历史》文中撷出汪康年的族兄汪大燮与汪康年的 200 余封往来书信,这些书信,主要涉及一些生活和政治事件,当我们随着作者一起阅读它们时,觉得晚清政治家汪大燮的形象仿佛向我们走来,血肉丰满、鲜活可触;而对晚清历史的了解于档案、论著之外,一种更为感性、更容易把握的途径被启用,两者之间的互渗使历史更完整、也更为贴近其本来的面目,使汪大燮这个资料非常少的晚清的一个重要人物,以他的书信作为第一手资料,其个性化的内容特征,为后世了解他的生平及思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无疑都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合理使用书信材料的范本。

2. 书信作为还原生活的史料

从书信中了解这些学人的家庭背景、求学过程、师友关系及人际脉络,以求索各种可能对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造成影响之因素,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以个人为研究对象,还原彼时彼刻的真实学术场景,将其置于当时的学术环境中,通过书信往来观察、研究学者处于同一学术空间内,是如何通过书信进行交往而互相影响,又如何借着彼此的交往而激荡出学术研究的新路向。论学书信是人物研究的重要资料,是对学术论著、回忆文章、日记、自传等重要资料的补充。

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刘梦溪先生提出的“历史的现代时”的概念。他在《柳如是别传》的介绍文章中提到,“天壤之间,有了《别传》这部新人耳目的奇书,活的史学,有生命的学术,历史的现在时,由是而

成为事实”^①。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书信正是再现“历史的现代时”的重要手段之一。

综合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书信可以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以王国维书札的整理为例,不只可以补订《王国维年谱》的某些误漏,它本身就是王氏学说思想,学术活动的系统实录。王国维从入时务报社到逝世的三十年间,先后经历了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政治的历史大剧变。“他对时政的种种关切,对国家民族之所忧患;对人事进退的好恶,对交游向背的去取;直至师友间的学术讨论、文字切磋,无不表述于书札。因此,王国维书信对研究王国维及有关的诸问题,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对于罗是否将王作据为己有这一段悬案,在书信中更有着明确的答案。

罗振玉和王国维自 1898 年结识订交,即相伴相偕,共历 30 载之久,共同的经历与事业,加上清朝遗民的共同的心态,成为了维系他们的友情、学术情、亲情等终身交往的前提条件。然而,由于王国维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以国学为事业的入室弟子,使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迅速得到了充分的确认,加之自沉殉难的行为使其获得身前身后名,而罗振玉自幼立志要做命世名臣,在晚清从民间入仕途,办新农业,办教育,希图革故鼎新,教养天下,一生涉足党争,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仅以顽固的清朝遗老身份处世,晚年更有一段出仕伪满的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在学术界也往往得不到公正对待。“抑罗抬王”的基调使罗长期蒙受不实之指。

后来经历两次史实的新发现,前述是非不辨的情形才得以部分

^①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见: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15。

澄清。第一是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发现了《殷墟卜辞考释》一书的原稿,证明并非罗振玉购买王国维的书稿。第二则是罗氏后人罗继祖在80年代初公开发表王于1926年10月间致罗的3封信,以及不久后结集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卷》,这使流传甚广的“逼债”一类谣言不攻自破了。这一例子表明了书信的重要价值。

罗继祖(罗氏后人)在为罗振玉与王国维往来书信所写的《跋观堂书札》中这样写道,“书信的内容,论学、论时事、论人以及生活琐屑几于无话不谈,但以论学部分为最多。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两人书中虽有他事,而言学问者约居其半,中国恐无第二人’。这几句话并不夸大。所谈的大都是王先生自己治学的心得,尽管其中大部分后来已著成专文,剩下的可能只是一时未定之论,经过再三研究终于成了废弃的糟粕,但如果把它作为某一学者治学经历的自述来看,还是有它一定的价值的”^①,当为不虚之言。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书信论学传统

一、从论“文”到论“学”

书信是一种很有趣的文体,既可以很正式,也可以很私密,既可以将其视为文学作品,又可以看做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在我国悠久

^① 保存于罗家后人手中的王国维的信既已陆续发表,而罗振玉的信则因王东明女士几次谈及其父焚烧罗信的情节,久传业已毁失。其实绝大多数还保存着,在王身后由赵万里整理粘贴,捐赠北京图书馆了。具体可参看《王国维罗振玉往来书信集》。

的文学传统中,书信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可以这样说,从书信的内容上也可反映出我国文学发展的潮流。在战国时,游说盛行,名札纷呈,纵横开阖,文采斐然,如乐毅的《报燕王书》、苏代的《遗燕昭王书》、李斯的《谏逐客书》、鲁仲连的《遗燕王书》等,行文排比铺张,曲折起伏。两汉时,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忧国幽思,比之《离骚》。李陵的《答苏武书》,激情委曲,扣人心弦。及至魏晋,崇尚清淡,书信以抒情擅胜,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信笔挥洒,孤高自负。六朝时盛行骈文,书信也多务词采,审音调,如吴均《与宋元思书》,陶弘景《与谢中书书》等骈体美文,寥寥数笔,勾勒山川之美,音调和谐,朗朗上口。到了唐宋,倡导古文运动,书信同样由骈而散,笔力雄健,或谈对政治、对文学的见解,或谈生活的遭际,表达己见,流畅明快。单从唐宋八大家来看,如韩愈的《与孟东野书》、欧阳修的《与尹师鲁书》、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等,都为人传诵。迄于明代,书信沿袭唐宋传统,出现了一批如宋濂、高启、王守仁、唐顺之、宗臣等名家名篇。随着晚明小品文的兴起,书信亦以隽永,公安派三袁书札,即为一例。在清代初期和中期,书信继承先秦以来的传统,格局严谨,不少作家作品,表达了反清复明的思想,希望摆脱异族的压迫。如黄宗羲、顾炎武、戴名世、方苞等尤为突出,能以犀利的文笔,从各方面抨击时弊。^① 将书信内容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传统中,重视的是书信作为文章的声韵气势、布局谋篇、语词篇章之美。

与之并行的是,书信的应用文体性质,以书信来发表自己的主张,发挥其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样是在南北朝时期,沈约与陆厥关于音韵的往来书信,充分体现在辩论中不断丰富、客观

^① 可参看《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一》序,上海书店,1992,2—3。

的学术观点。针对沈约“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的观点,陆厥心平气和地指出“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谙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乎诬乎?”,举出证据,“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味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问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①而沈约在《答陆厥书》中也相应做了回复,“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征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味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②并修正自己的观点。这是较早的学术争论,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书信的发展,由于其文体的特殊性,多种传统并行。

书信在中国古代通常被认为是散文的一种。从内容上看可分为政治公文及私人书信。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中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这指的就是用于政治用途的书信公文系统。从源流上看,春秋以前,政务简单,后列国纷争,交往日多,书信随之而生。如《左传》所载:“文公十七年,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在刘勰《文心雕龙》中对这种政治公文类的书信有比较细致的分类与阐释,臣子给帝王的上书包括“章表”、“奏启”、“议对”,帝王写给臣子的公文信件则为“诏书”,各种政治公文也有其特殊的写作要求,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与前者相比,普通士人之间的信件就显得平等、自然了。“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悻怀;

① 羊春秋,何严编.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长沙:岳麓书社,1982:27。

② 羊春秋,何严编.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长沙:岳麓书社,1982:33。

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①(《书记》)^②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对书信文体的基本要求,书信的首要目的在于“尽言”,即交流思想感情,彼此之间的书信交流可以改善情绪,表现个人的文采,传递彼此的心声。“条畅任气”、“优柔恻怀”、“文明从容”12个字反映了刘勰心目中理想的书信观。

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士人与政府重要官员及皇室成员有关的信件,“笺记”。刘勰说:“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也。”^③

对书信的风格流变,《文心雕龙》也做了阐述与评价,“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战国以前,君臣同书”、“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汉来笔札,辞气纷纭。”(《书记》)^④“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章表》)^⑤“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奏启》)^⑥“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议对》)^⑦,这些都从历史纵的角度来梳理了书信体的发展演变以及特点。

随着文学意识的不断发展,开始出现了一些书信体名家,如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书记》中所列举的不少以书信见长的好手:“魏之元

①②③ 书记.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233。

④ 参见:书记.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233—242。

⑤ 章表.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206。

⑥ 奏启.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213。

⑦ 议对.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222。

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琰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古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①。他们的书信扩大了写作范围,把书信写作由以公文为中心转变到以抒发个人情感、传播观点等多元的功能,把一种实用性为主的文体开始呈现出以抒情、议论、陈述等多种表达方式的应用文体。

刘勰不仅对书信作出了细致的分类,而且概括了书信的总体特征和不同类型的特征,强调了书信体的文学特征,描述了历代书信体的流变,评论了书信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可谓是进行书信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刘勰对于书信一体的重视由此可见,或者也可证明在魏晋时期书信体已经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由于书信内容的丰富,开始出现了以“论学”为主旨的书信——论学书信。起初,讨论的“学”的内容还比较模糊,以一种学习的精神、态度为主,与荀子《劝学》中的“学”颇为神似。如在诸葛亮的《诫子书》中,“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②其中的“学”意指抽象的学习精神、态度及状态,在信中提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宁静澹泊的处事原则与人生态度。这种笼统意义上的“学”可以理解为求学精神、向学之道,在之后的书信内容也一直有所体现,如顾炎武的《与人书一》中的“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基调相当统一。

而这个“学”从务虚层面的态度与精神落实到具体的内容,就要看“学”本身的发展与普及了。从书信的内容上来看,所谓的“论学书

① 书记·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231。

② 羊春秋,何严编·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长沙:岳麓书社,1982:6。

信”是在“学”不断发展、普及和推广的过程中共同发展的。这些论学书信从论“文学之道”的文学理论开始,随着“学”的不断丰富与深入,不断生发出佳作。

例如,从文学的功能上看,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冕就响亮地提出“教化中心说”,认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与徐给事论文书》)。裴度说,文章的作用在于“激情教义”,“理身、理国、理天下”(《答李翱书》)。白居易更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应该很好地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的作用。宋代的学者继承了这些传统观点,提出文学应该“有益于世”,有益于“礼教治政”(王安石《上人书》),并把它具体为十大作用,即“发圣人之微旨”,“摘诸自之异端”,“陈仁政之大纪”,“斥功利之末术”,“觉千古之未寤”,“正一时之得失”,“扬贤人之先烈”,“写下民之愤叹”,“陈天人之去就”,“述国家之安危”(孙复《答张洞书》)。至明清,“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更受到重视,如顾炎武将文学的功能归结为“明道”、“救世”两大目的(《与友人书二十五》),钱大昕又把它概括为“明道”、“救世”、“阐幽”、“正俗”四大任务(《与友人论文书》)。

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上看,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提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文学主张,为人“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杜牧在《答庄允书》中认为“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之兵卫”,黄庭坚在《与王复观书》中主张文学应“以理为主”,认为“理得而辞顺,文章则自然出类拔萃”,张耒主张文学应“以理为主”,认为“以言语句读为奇”,“以缺句断章为奇”,“以脉理不续接为奇”,甚至“以取古书训诂稀于见闻者为奇”,都是舍本逐末(《答李推官书》),柳宗元将“务富文采,不顾事实”的文风比作是“文

锦复陷井”(《与吴武陵论国语书》),朱熹说“葩藻之辞胜,而言志之功隐矣”(《答杨宋卿书》),吕南公说“言以道为主”,“文以言为主”(《与汪秘校论文书》),方苞说在内容上要“言有物”,形式上要“言有序”(《与程若韩书》)。^①

这些书信是彼此学术观点的交流与辩驳,同时也是著述;是文学理论的宣言,也是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材料。除了文学理论,论学书信涉及的面随着古代学术内容的不断丰富而发展,不断地扩大其涵盖面,因为学术需要学者来研究,而学者需要通过书信来进行交流。

这里我们不妨以《传习录》为例,着重分析一下论学书信与著述的关系。《传习录》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的重要著作。“他一生著述不多,正德十三年(1518),薛侃初刻《传习录》三卷,后邹守益等人刻《文录》、《文录续编》等,隆庆六年(1572)浙江巡抚谢廷杰汇集王守仁的著作刊为《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一至三卷为《传习录》,是王守仁在教习弟子时的语录,包括重要的学术书信来往,由其弟子徐爱编纂整理;四卷而后,均为其书、序、记、说、杂著、奏疏、公移等;三十二至三十八卷为其弟子及时人所撰写年谱等资料”^②。

《传习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典范意义的文本,一个有着代表性的文化标本。“卷上”分为“徐爱录”、“陆澄录”、“薛侃录”,是王守仁的弟子徐爱等记录王守仁的言行录,这种独特的论学文体,其实是对《论语》的模仿与沿袭,这种独特的文体以记录师生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来阐发其志向、主张以及旨趣,不单包括语录体,更有对生活中的事件与待人接物之真实记录,这是典型的非正式交流渠道,会

① 可参看羊春秋,何严编.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长沙:岳麓书社,1982;3—10。

② 序言,见[明]王阳明著.张怀承注译.传习录.长沙:岳麓书社,2004。

晤、面谈、言行举止、书信等。“卷下”的“陈九川录”、“黄直录”、“黄修易录”、“黄省曾录”、“黄以方录”等体例基本与“卷上”相同。

“卷中”则是王与六家的来往书信选。与他书信论学的有顾东桥、周道通、陆原静(《与陆原静书(一)》、《与陆原静书(二)》)、欧阳崇一、罗整庵、聂成蔚等。在钱德洪序中说:“……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①说明他对南元善刻《传习录》中所选书信的删改调整情况以及原因。并对所选书信有评价,“……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②“……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洁,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③。说明对南元善旧本进行取舍,是考虑到当时的需要,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对旧本的随意添加或删减。

从结构上讲,以《答顾东桥书》^④为例,基本采用“来书云”加上回复的格式,如第一节就采用这样的格式:

①② 钱德洪序,[明]王阳明著,张怀承注译.传习录.长沙:岳麓书社,2004:121。

③ 钱德洪序,[明]王阳明著,张怀承注译.传习录.长沙:岳麓书社,2004:122。

④ 答顾东桥书,[明]王阳明著,张怀承注译.传习录.长沙:岳麓书社,2004:124。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何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系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不同于后人编的往来书信选，《传习录》对来信的处理只是截取了讨论主题的那部分内容，主要是引出王守仁个人观点、主张的阐发。从内容上看，这也并不是一封书信的往来，而是多封论学书信的辑录。第一节的往来论学的内容很短，有的段落则很长，如关于“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辞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掇辅，漫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的回复就有3,000多字。而回信也并没有一封信的完整格式，如抬头、敬语等，可以看做是由“来书”而引发的议论与主张的阐发。

而《答周道通书》^①的开头则保留着书信的味道，“吴、曾两生至，备道道通恳切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谓笃信好学者矣。忧病中会，不能与两生细论，然两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见辄觉有进，在区区诚不能无负于两生之远来，在两生则亦庶几无负其远来之意矣。临别以此册致道通意，请书数语。荒愤无可言者，辄以道通

^① 答周道通书，[明]王阳明著，张怀承注译，传习录，长沙：岳麓书社，2004，164。

来书中所问数节,略下转语奉酬。草草殊不详细,两生当亦自能口悉也”,又颇像引言,叙述由来。

从来信人的身份来看,多数是王的弟子,如周道通、欧阳崇一^①,也包括当时的学者,甚至与他有学术的分歧,如罗整庵,他曾著有《困知记》,对于陆王与程朱均有批评。但在王与罗的通信中,王很高兴甚至感激罗的关注与来信。“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谕,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同如哉!”回信的语言也相当谦和,心平气和地作了驳论,“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无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谬,实起于此,不可不辨”^②。

① 顾东桥,顾璘,南都上元人,工诗文。周道通,周衡,号静庵,江苏宜兴人,从学于王阳明,后又从学湛若水,其学合会王、湛两家。陆原静。欧阳崇一,欧阳德,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王阳明弟子,为江右王门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整庵,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明代著名理学家,著有《困知记》,对于陆王与程朱均有批评。少宰,次长,他曾任吏部侍郎。聂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傅。为江右王门归寂派的倡导者。

② 答罗整庵少宰书,见[明]王阳明著,张怀承注译.传习录.长沙:岳麓书社,2004:212—213。

并提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①。这段话说得相当有力道。道是天下的公道,学是天下的公学,不属于哪个私人所有。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来判断别人的言论,“君子之过”我们不妨把它看做是“学术的争论”,学术的争论不以个人的好恶或利益为立场,即使有失当的地方,改正了也会受人尊敬,这种治学的态度,相当令人钦佩,也为《传习录》中的学术争论奠定了正确的学术立场,创建了一种友好的争鸣氛围。“卷中”另含《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②、《教约》,都是对教育方法的探讨。

《传习录》的附录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由王阳明做序并辑录的朱子书信,“辙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这些朱子书信包括《答黄直卿书》、《答吕子约》、《答潘叔昌》、《答潘叔度》、《与吕子约》、《与周叔谨》、《答陆象山》、《答符复仲》、《与吴茂实》、《答张敬夫》、《答吕伯恭》、《答周纯仁》、《答窦文卿》、《答林择之》(另《又》)、《答梁文叔》、《答潘叔恭》、《答林充之》、《答何叔景》、(另《又》《又》)《答林择之》、《答杨子直》、《与田侍郎子真》、《答陈才卿》、《答刘子澄》、《与林择之》、《答吴德夫》、《答或人》、《答刘子澄》等书信。可见王阳明自己对于书信的重视以及对书信材料的辑录。

《传习录》并非个别的例子,在明清时期对书信的重视还体现在

① 答罗整庵少宰书,见[明]王阳明著,张怀承注译.传习录.长沙:岳麓书社,2004:215—216。

② 教读,社学的教师,刘伯颂为教读之一。这是讲儿童教育的基本原则。

很多方面。明末清初,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相互间多有联系和交往,互赠著作,互有评论。如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又说他自己有《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①。这封信不仅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做了高度评价,同时也表明了他与黄宗羲思想的异同,显然是对黄宗羲的著作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而得出的结论。

再如黄宗羲为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所作的《序》中说:“淮海阎百诗寄《尚书古文疏证》方成四卷,属余序之。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中间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礼仪、地理、刑法、官制、名讳、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后儒之蔽,如此方可谓之穷经”。^②黄宗羲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评价,几乎成为日后评论阎若璩此书的定论,也奠定了阎若璩在清初经学史及考据学中的地位。“类似顾炎武、黄宗羲这些论学的书信和序、跋还大量散见于当时学者的著述之中,都应看做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第一手宝贵的历史资料。”^③

二、清代的书信论学传统

随着学问的不断深入,交流对于学术的影响日益显著,学者们也开始逐渐认识到学术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前文所引清代学者顾炎武在《与人书一》中“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

① 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佚文辑补.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 黄宗羲.古文尚书疏证序.《南雷文定》三集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

③ 王俊义.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3)。

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是一例,梁启超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也是同理。朋友师长之间的交流,书院学堂的演讲与聚会,都受到了学者的重视。所以,作为学术传播的手段之一——书信论学在清朝颇为盛行,成为清代学术风气的代表之一。如果从学术传播的角度来解析,它填补了没有学术期刊的缺憾,拓展了学术交流的空间,是古代学术传播体系中重要的环节,同时也是人际传播中的重要渠道之一。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学校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贄,——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者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①

这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描述的清代学术风气之一——函札的应用,并对此大加赞赏。其中所说的“札记”,指的是“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于预备资料中

^①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4。

者。”^①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在《从理学到朴学》的第五章《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中,利用“新文化史”的方法,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乾嘉学派”与清代的考据学,文中被称作“江南学术共同体”,他们依靠官方、半官方及私人的资助,凭借书院的讲学、书信的切磋、部分著作的刊刻等在学界传播他们的学术,赢得学者的认可和一定的名声,从而在一部分文化人中形成了考据学风气。其中提到了当时以札记为主的著作方式、更广泛更严格的资料意识与方法,他还特别谈到了当时学术传播方式中的书信往来,这使我们意识到清代中期学者之间书信的学术价值,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必要的学术信息,得到有效的学术讨论,发布自己的学术发现。

书信论学最宝贵的态度不外是在学问上的求真精神与讨论过程中的心平气和态度,这也是后来学者向往的一种境界,也是清代学者普遍认可的学风。

以钱大昕的一通书札中为例:

得手教,以所撰述于昆山顾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长洲何氏间有驳正,恐观者以诋呵前哲为咎。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此余无足观”耳。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不害其为大儒;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言之不足传者,其得失固不足辩,既自命为立言矣,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

^①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2。

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耶,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郑渔仲辈皆坐此病,而后来宜引以为戒者也。^①

其中“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正是他的学术立场,“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是他所持的态度,并且批评了“一有差失,此余无足观”的以偏概全的说法,提出“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这正是学术批评与争鸣的积极态度。在梁启超概括“正统派之学风”中“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和“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②,这在书信论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段玉裁是戴震的学生,但在戴震研治音韵学时,他自己已发表了一系列音韵学论著。戴震在致段玉裁的信中,批评段把古韵分为17部的做法,解释了自己把古韵先后分为10部及24部的原因。他回顾了顾炎武、江永的古音研究,建议段玉裁注意方法论。他认为自己和段的研究只是提高了古音研究的精密度。他说:“顾氏于古音有草创之功,江君与足下,皆因而加密。”^③

① 钱大昕.答王西庄书.见: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卷,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603。

②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7。

③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40。

在清儒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诸家的文集中,这样的论学书信比比皆是。大卫·尼维森指出,18世纪,中国学者的书信得到广泛传播、传抄,最终刊行出版。傲择·瓦莱(Arthur Waley)认为,18世纪还没有学术期刊。学术同行之间的书信交流弥补了这一缺憾,袁枚等许多学者把书信当做一种进行某些不宜以专著或论文形式发表的临时性研究的方式。后来,人们把学术信件收集起来,或编入作者的文章,或单独成集出版。^①例如,钱大昕与戴震、段玉裁等朴学家的书信汇集成《潜研堂书信》。学者之间的私人通信会晤对17世纪、18世纪个人之间的资料交流发挥过重要作用。钱大昕向以著述卷帙浩瀚、内容宏博著称,他常以通信方式委婉地指出同行、朋友出现的学术失误。1754年,他在北京见到戴震后,给他写信,婉转地指出他在历算论著中发现的错误,其他学者极少敢这样纠正戴震的学术失误。此外,钱大昕还致函段玉裁,言辞恳切地指出段《今文尚书考证》中出现的失误。而其他学者也常以这种方式 and 钱大昕通信,经常提供他进一步研究所需的资料和信息。^②

这时的论学书信更近乎著述,其私人信件的特性已经不被强调了。各种论学信件及文稿(有时是著作,有时是草稿)常为朋友传抄,甚至交给他人阅读、讨论。“许多学者都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得到学术界的中肯评价、认可和广泛注意。许多资深学者通过书信交换的方式,如梁启超所言,开始和需要解答疑难的学术新秀建立联系,与此

①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39。

②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41。

同时,这些新秀也附带呈上他们的新作。”^①

这里,我们不妨以章学诚^②为例,他的《文史通义·卷九外篇三》中收录了与他人的通信,基本都是论学书信,其中收录了与黄大俞、邵二云(邵晋涵)、周永清、史余邨(旧写)等书信,还包括家书,家书也以指导子弟如何读书为内容。艾尔曼在论及章学诚致邵晋涵的信,“主要讨论历史编纂学和目录学的问题”,其实内容不限于此,“古人记言与记事之文,莫不有本。本于口耳之受授者,笔主于创,创则期于适如其事与言而已;本于竹帛之成文者,笔生于因,因则期于适如其文之指,或录成文而无所更易,或就字句而小作更张”^③,谈的就是关于创作的文论问题。在与《与邵二云论学》中,“古人朋友之道,久不相见,则考订学业有无长益,见解有无商质,不仅述寒温,溯离合,甚或嗟贫而叹老,相与作楚囚之泣也”^④,谈到朋友之间的温情与学术上的切磋增益,颇为动人。信中还对邵的《尔雅正义》做出了评价,“功赅而力勤,识清而裁密,仆谓是亦足不朽矣”,这是学人之间著作交流并给予评价的例证。在信的末尾有“此言并示余村,策以及时勉学”,信首在谈及自己近况时有“移家一事,已详余村书中,可便省之”,由此可见,这些书信本来是向朋友圈子小范围公开的,而之后将其刊刻出版就是大范围公开——向所有的读者公开了。

① [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40。

②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清朝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文史通义》阐发作者迥然不逐流俗、究心史学义例以救当时学风之弊的治学志向和“六经皆史”的著名见解以及一生治学所得。自晚清以来,以《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广为学人重视。

③ 章学诚.答邵二云.文史通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64。

④ 章学诚.与邵二云论学.文史通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65。

论学书信中的内容相当丰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学者与作品的评价,这些都可辅助后人对当时的学术界有真实、正确的认识,而且书信内容往往与学者所持的学术观点保持着高度一致,可互相引证。以章学诚为例,针对当时有学者将学术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他持反对意见,在《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吴胥石简》中直接诘问,“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学问文章,皆形下之器,其所以为之者道也。”在《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又说:“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而何谓“道”,这是章学诚所持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原道》),他在《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九《又与正甫论文》有将这一观点继续阐发,“记诵名教,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之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学问中之功力,万变不同。尔雅注虫鱼,固可求学问;读书观大意,亦未始不可求学问,但要中有自得之实耳。”

清代学者刘台拱(1751—1805)生前虽然未出过学术专著,但和204位著名学者(如阮元、臧庸、段玉裁)经常通信,交换对经学研究看法,对当时的许多知名学者产生了影响。^①刘台拱与段玉裁、王念孙最为亲密。段氏《经韵楼集补编》中所载《与刘端临书》,多达三十多通。

卢文弨,因为专精校勘而成为考证学者,在他通信交往的朋友中

^① [美] 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40。

有汪中、王念孙、周永年。他在信中常和他们交流资料,阐明自己对许多文献考证问题的学术观念,确立校勘学从整体上为考据学服务的方式。他认为,校勘学是一种集体性事业,能以深入校订为基础提供更为可信的文献版本。他在信中讨论的许多技术性问题显示出相当的学术造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达到这样的学术造诣,就须精通典籍及其注疏和使用的考据方法。^①正因为这样良好的学术氛围,使书信论学这一学术传统得以发扬。

按照葛兆光的说法,那时“文化人实际上使用的是三种不同的‘话语’”,一种是在公众社会中使用的“社会话语”,尤其通行在官场、文书、礼仪、社交的场合;“一种是在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它是以知识的准确和渊博为标准的,只在少数学者之间通行,由于它的使用,这些学术精英彼此认同,彼此沟通,但它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话语”^②;还有一种是在家庭、友人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这种“学术话语”也就是当时书信论学赖以存在的“语境”。清代学术开始逐渐出现职业化倾向,学术传播体系初见雏形(具体内容可详细参见第二章),但因其涉及的人物有限,学术交流渠道也受到诸多限制(到底逃不出师承、地域之限),较之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术研究还存在很大差距。诚如葛兆光所言,“(清代考据学)这种知识性的学术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使他们在人生理想、社会政治、道德意识即终极性的价值层面上发生动摇,使传统思想产生根本性的瓦解?这涉及了一个学术研究与思想表述、学术史与思想史之

①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41。

② 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读书,1996(6)。

间的老话题。”^①

三、书信论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以胡适为例

学者对书信论学的重视，在晚清民国时期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其时，中西学术碰撞，学人辈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清代学者书信论学的传统得到了近现代学人的继承与发扬。这里，我们以胡适为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胡适始终秉持科学理性态度，强调一切拿证据来，主张重新估定既有价值，以审视的目光打量传统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人物，而不是盲从和迷信。胡适最重视对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总结，因此对清儒书信论学肯定有所留意。胡适记日记时，是有意地要为后人留下一份史料，他写探讨学问的论学书信时，也有意地将书信作为著述，在他的“文存”中，论学书信数量就有不少。胡适喜欢写信，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现在的电子邮件、教学平台、BBS 等多种网络沟通方式更让人与书信传统渐行渐远）。“在他的遗稿中保留了一份 1918 年 8 月 21 日至 11 月 21 日的‘来往信簿’中，寄出信件三百三十八封，收到信件四百封，平均一天至少写三封信”^②。据初步统计，仅 1949 年他离开大陆去美国之前，留在北京寓所里的个人书信就有 600 余通，他人来信有 1 万余通。

胡适在著述及公事之余，又有细心保存书信的习惯，所以许多书信保存完好。特别是他喜以书信为著述，乐此不疲，故对于研讨各种学术问题的书信更是倍加珍惜。凡是比较重要的论学书信，他都尽量抄存底稿，有时因为实在太忙来不及留底稿者，也往往要求收信人

^① 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读书，1996（6）。

^② 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14 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145。

阅后退还。他对别人的来信,也同样爱护备至,例如,有封钱玄同的来信,不知何故中间破损了一块,胡适细心裱糊后,又亲笔把损坏的字一一添补上。胡适曾说他保存这些书信的目的,就是要为后世学人保存一些原始资料;所以在他的一些著述与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有许多往来书信夹在其中,有时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① 这些书信中的论学书信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集》、《胡适书信集》和《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②

总体看来,胡适是将清人书信论学传统发扬光大,他的学术进程在书信中历历可见,而在他与顾颉刚、陆侃如、孙楷第、吴晗的往来书信中,胡适的学术影响也是有迹可寻,“据胡适秘藏书信,现存陆侃如致胡适书信有 34 封,顾颉刚致胡适书信有 136 封,胡适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往来书信数量虽不多,但意义却非同一般。而时间稍晚一些,王重民致胡适书信有 35 封,其中心就是胡适的《水经注》考证,而最近出版的胡适与杨联陞自 1943 年至 1962 年往来书信 205 封,这批书信著述的意味也更加明显”。^③

1. 论学书信与“八不主义”的产生

从胡适留学期间,他就喜欢与朋友们通过书信来争论问题。我

① 参看:前言,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② 北大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胡适书信集》三册,集录了胡适 1907—1933 年书信,按年编目,其中有许多家信,是考研胡适生平及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8 月出版了《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下两本,收集了 1910—1948 胡适学术往来书信 700 余件 80 万字,以书信来往人编目,对研究胡适的学术思想和现代文学史的发展有很大的价值。中华书局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 1979 年 6 月出版,上中下三册,首印 2 万册,内部发行。

③ 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94。

们可以看到胡适从“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的书信往来中,乐趣之外又获得了什么?在《尝试集自序》中,他说,“我对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也正是这篇序言,明确地阐明了“八不主义”产生的过程。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也表示,“其中可以考见胡适文学革命思想之历程者,盖莫如《尝试集自序》”^①。

《尝试集自序》中叙说了一段书信因缘,而这段因缘直接成就了胡适关于“诗界革命”的主张。1915年(民国4年),因胡适要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梅光迪要去哈佛大学,在与朋友们离别酬唱中,送给梅光迪一首长诗^②,任叔永(鸿隽)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③,胡适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寄给叔永诸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因“梅觐庄误会我‘作诗如作文’之句”,写信来辩论。梅说:

……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2004:384。

② 胡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见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326。《自跋》中说:“此诗凡用十一外国字:一为抽象名,十为本名。人或以为病。其实此种诗不过是文学史上一种实地试验,前不必有古人,后或可诏来者,知我罪我,当于试验之成败定之耳。”这也是胡适一生中所写的最长的一首诗。

③ 原诗为:“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都为胡适原诗中的外来字。见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372。

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以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胡适在自序中这样说,“这封信逼得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我的答书不曾留稿,今钞答叔永书一段如下”,在这封信中提出了“诗歌革命”的主张,“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①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张也直接源于这些争论,他在这篇《〈尝试集〉自序》中坦承“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化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②其间,与朋友争论“文学革命”的书信不断。

针对1916年7月12日,任叔永寄给胡适的一首《泛湖即事》诗。诗中有“言棹轻楫,以涤烦屑”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胡适回信说: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

^① 此段可参见《与梅觐庄论文学改良》等文章,见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372—373。

^② 胡适另填一首《沁园春》词,题目为“誓诗”。“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褰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此词填于1915年4月13日,可以看做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学宣言。

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衬也。

而梅光迪看了这封信,写信驳斥^①,语气相当不客气: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

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

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

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为创获,异矣。

批评可谓严厉,但这些关于文学主张的争论并未损伤朋友的感情,而是据理力争,且心平气和。胡适因此做了一首长约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来应答,“一半是朋友游戏,一半是友谊试做游戏诗”(《尝试集自序》),其中有“今我苦口饶舌,算来却是为何?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那不是‘活文学’

^① 胡适,《尝试集》自序,见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372—373。

是什么?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这是对白话诗的尝试,也是对与之讨论诗歌革命的朋友的直接交锋。

梅光迪与任叔永接到这首白话诗之后,分别写信驳斥。梅光迪信中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外人之命者……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①任叔永写信说:“足下此次试验的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②

对于他们的来信,胡适“最不承认的”是梅光迪“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和任叔永“白话自有白话用处,然不能用之于诗”,他不断地写信给朋友们,阐发自己的观点,并在信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而在吾辈实地试验”,^③这段写给任叔永的信件内容被胡适称为“文学的实验主义”,在同一封信中,“……我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斜逸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适。……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这也是胡适第一次宣布不做文言诗词。^④在之后致任叔永的信中“……我此时联系

①② 胡适.《尝试集》自序.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377。

③ 胡适.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344。

④ 见胡适致任叔永7月26日信,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346。

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我去志已决。……”^①

在其与朋友激烈的辩论当中,仍希望有同志结伴而行,这种平等友好的论学气氛使他们的思想观点互相激发。观之胡适与梅光迪等朋友的往来信件,激烈的争论与平等论学的友谊并不相悖,如在梅致胡适 1916 年 10 月 5 日的信中就有这样的描述:“足下将弟前片掷还本无足怪,因弟之讽刺惯习固不宜施之好友如足下者也。正拟作自解,复来手片作道歉之语,足下之待友可谓真切大度矣,诚喜诚喜!”朋友之间敞开心扉,又互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检讨道歉,这种论学氛围与清代论学风气可谓一脉相承。他们讨论的基本立场就是对中国的文学进行改良,争论的核心在于怎样改,梅光迪在信中说得好,“来片言:‘但有是非,何问新旧!正得我心。今世之人若能奉行此语,弟又有何说’,这一点是他们进行讨论的平台。

在胡适下定决心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的时候,“心里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绝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②。这段自序将书信对于学术观点的激发阐述得相当

^① 胡适.再答叔永.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347。

^② 胡适.《尝试集》自序.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380。

细致、深刻。

在1916年8月19日胡适答朱经农时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文学八事,这也是《文学改良刍议》的雏形: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①

1916年冬,应《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来信约稿,胡适将其提倡的这八条关于新文学的要点归纳为“八事”,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1日出版)^②。很快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写信^③给《新青年》支持文学改良:

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

^{①②} 胡适,《尝试集》自序,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380。

^③ 见《新青年》2卷6号,通信栏,胡适研究者周质平在《胡适与钱玄同》一文中指出,“钱玄同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贡献,应从他支持胡适白话文的主张开始”,“虽然胡适与钱玄同在个性上不尽相同,但丝毫不妨碍他们友谊的发展,也不影响两人在学术研究上的切磋合作。从白话文、新诗到标点符号、注音符号的提倡,以至于古史的考辨,胡适与钱玄同始终是并肩作战,互相支持的。”另外,胡、钱的学术争论也有相当的部分在《新青年》的“通信”栏中呈现。具体可参见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又不知者若何咒骂。

陈独秀收到这封信非常高兴,在2月份就刊出是函,并附上自己的回信,“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①对于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来说,钱的来信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胡适到晚年还印象深刻,“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②胡适在口述自传中,也一再强调钱氏在文学革命中的态度,对新文学运动具有重大意义。他说:

钱玄同教授则没有写什么文章,但是他却向独秀和我写了一些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信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声势一振。^③

由此,我们也可体会书信的支持、鼓励作用。

胡适的白话诗歌创作也在积极地创作。在他1917年4月19日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这段经历,“白话诗乃蒙选录,谢谢。适去秋因与友人讨论文学,颇受攻击,一时感奋,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私意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

① 陈独秀.答钱玄同.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68。

②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75。

③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76。

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实地证明,不容更辩;今惟有韵文一类,尚待吾人之实地试验耳。”在1920年3月,在胡适自誓三年的限期内《尝试集》终于出版,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

上面大量摘录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与《尝试集》产生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书信往来,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是之后刊载于《新青年》使胡适“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在朋友之间不断的思索、争论、辩解中诞生的,在往来书信的不断争论中,“新文学”的“八不主义”逐渐构建,不断地丰满、成熟。这个以胡适、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等留学生构成的话语圈共同关心着中国文学的命运,针对现状开出个人的药方,并在不断的争论中进行探索。其次,虽然争论激烈,但平等友好的论学气氛始终贯穿其中,显示了这个交际圈中成员所拥有的优良学风及个人品质,这也是书信论学传统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

2. 书信论学与学术交流

在此之后,胡适利用书信进行学术交流的例子就更丰富了。如余嘉锡对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中的疏漏予以指正:其一,胡适误解《癸辛杂识》“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中的“传写”,以为是英雄传奇故事中的传抄,余嘉锡以为“高、李乃当时画工传写者,谓传神写照也”,此于被省略的下文“余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可以推知;其二,胡适据《水浒传》中李逵、燕青在京城一家勾栏听人说《三国志》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遂推断出《水浒》的改定必在明朝初年成书的《三国志》之后。余嘉锡认为此推断不准确。“南北宋民间平话喜说三国,早成风气,不必待至罗贯中《三国演义》成书以后。若说《三国志》便是说演义,则罗贯

中当为五代、宋初人,而后可刮骨疗毒事。陈寿《三国志·关羽本传》叙之甚详,初非贯中所杜撰。但国志医者无姓名,演义付之华佗耳。《水浒传》只云刮骨疗毒,不云华佗,则无以见其所说之必为罗书也。”余嘉锡又就胡适未曾道及宋江征方腊一事,作考证一篇,并缮一清本寄给胡适以求指示改正^①。

又如对于《红楼梦》的考证。胡适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开始,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作者隐去真事的“自叙体”的新观点。关于《红楼梦》的考证,胡适虽先发其端,而具体的考证工作并非他一人之力,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里曾提到:“我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外一位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在《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里,所收存有关顾颉刚、俞平伯等先生与胡适为寻找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的往来书信就多达60余通。顾氏在大量的通信中为胡适提供材料,使得胡适的考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这些书信,对于了解他们为考证《红楼梦》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所采取的治学方法,以及“新红学派”的开创与影响等,都提供了较为完整而珍贵的原始材料。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学生顾颉刚。

鲁迅先生在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对胡适《红楼梦考证》中的观点予以评论:“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做考证,乃较然彰

^① 余嘉锡致胡适函 1929年2月19日。见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641。

明”，并肯定胡适的“自叙说”，“实是最可信的一说”。虽然“五四”之后，胡适和鲁迅存在着“政治上的分化”，但并不妨碍两人在学术上的交流。胡适、鲁迅两人的学术交流正是建立在共同的学术兴趣之上，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的建构正是研究中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至少有九处参考胡适的研究成果，而胡适的小说考证至少有七处引用鲁迅的论点，如《〈三国演义〉序》（1922年5月16日）一文就注明是参用周豫才的《小说史讲义》稿本。至于在1924年2月9日鲁迅致胡适的信中提及可购买百廿回本《水浒传》的消息，胡适在《百二十本〈忠义水浒传〉序》中有记载：“民国十二年左右，我知道有三四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出现，涵芬楼得了一部，我自己得了一部，还有别人收着这本的。”百二十回本之得，似与鲁迅有关。^①

王重民，则是胡适《水经注》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王重民与胡适有大量的论学通信，为胡适的学术工作提供了许多基础性援助。在《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里，尤以胡适与王重民关于重勘“水经注案”的往来书信为最多，有150余通，约20万言。从这些书信中，不仅可以看到胡适为重勘此案，在王重民夫妇的大力帮助下，从各个方面、各种渠道搜寻《水经注》的各种版本，查找有关《水经注》的各种原始资料，以及撰写诸多篇考证文章等多花费的大量精力及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校勘此案时所采取的治学方法，对王重民及后世学人都产生过有益的影响。

^① 徐雁平. 胡适与整理国故：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97。

论学书信的影响是相互的,胡适从王重民那里得到的是无私的援助,王也从胡适那里得到了方法上的影响。胡适在重勘《水经注》案中所推崇的考证学方法,就是宋代学者李若谷所说的“勤、谨、和、缓”四字。他在与王重民的书信中,曾多次提到这四个字在考证学与校勘学中的重要性。他在1943年5月30日的信中说:“勤”,即是“眼勤手勤”、“此是治学成败第一关头;凡能勤的,无论识大识小,都可以有所成就。”“谨”,“即是苟且,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谨。”“和”,“即是‘武断’的反面,亦即是‘盛气凌人’的反面。……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和之至也。”“缓”,“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匆遽下结论。”“凡不肯悬而不断的人,必是不能真做到勤、谨、和三个字的。”他又在1944年3月23日的信中说:“我到中年以后,才知‘勤、谨、和、缓’四字之中,‘缓’字最难,‘缓’字包含时间。”

同时他也对王重民的许多来信与所写文章中,只记书写时的月日,不写年份,认为不妥,应当写全年月日期,才能便于自己与别人查考。特别是对王重民有时在文章中不注明引文的出处,提出劝告说:“随笔添注所依据的书籍,以便后来自己可以复勘,并且可供后人的复勘。此为旧日史馆成规,亦是世界学人通例。……如钱宾四所记赵东潜生卒年,他当时若随笔记出处,何至使孟心史、郑天挺诸君与你我费那么多的时力去寻检?”这些都潜移默化影响到了王重民的研究。

胡适能和他人从容论学,取决于他对学术的态度。他说“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

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①。“学问是平等”在此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胡适可以质疑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等前辈学者,而比他晚一辈的学者也可与他商榷;二是学问上的发明无大小之分。

在1929年胡适写给陈寅恪的信中提到,“鄙意吾兄作述学考据之文,印刷时不可不加标点符号;书名、人名、引书起讫、删节之处,若加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又可免去读者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采纳。”^②虽未对研究内容提出什么意见,但标点符号的问题对于读者阅读、传播还是很有影响的。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别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鲁连黄鹄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何如此推崇王氏,胡适本人对王氏的学问就很敬重。1923年12月16日,胡适拜访了王国维,所谈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戴震(东原)的学问与哲学的传人问题。第二天,王国维回访了胡适。从此,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胡适在王国维的启发下开始研究戴震,并著《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他编注一本新的《词选》,实际上是他上述整体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编注此书的过程中,每遇到疑难之处,胡适都要虚心及时地向王国维写信请教,同时,他也往往能得到相应的圆满答复。1924年7月4日、10月10日、10月21日、12月9日,胡适都为词学上的问题写信向王氏请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代学人之间的学术关系。

^① 胡适.论国故学(1919年8月16日).见胡适文存.合肥:黄山书社,1996:321。

^② 选自陈寅恪保存的胡适信札.转引自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762。

胡适的论文《词的起原》初稿写完后,立即呈送王氏,请他指正。王氏的两封答书,被胡适收在该文的后面,作为文章的有机部分,一并刊出。胡适向学界充分表明,他的词学研究成果中,有王国维的直接介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通信双方甚至多方共同构成的交际圈,或是“学者社会”的构成,以胡适为例,丁文江、丁声树、王国维、任鸿隽、朱经农、孙楷第、汪原放、吴晗、杨联陞、张元济、陆侃如、陈垣、陈独秀、陈寅恪、周汝昌、周作人、陶行知、梅光迪、钱穆、钱玄同、顾廷龙、顾颉刚、梁启超等,他们与胡适往来论学的书信,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涉及学术领域许多重要问题,对了解 20~40 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概况及发展动态,都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新资料。

3. 与青年学子书信论学

胡适是当时文化界学术界的中心人物,他能以这种态度对待前辈学者,又能耐心与晚辈商量学问,积极鼓励后学,无疑有一种极大的鼓动作用。胡适还与许多不知名的青年学子保持着经常联系与真挚的友谊。由于胡适在“五四”时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许多青年都把他当做学习的楷模、指路的明星,而予以崇拜。如,青年张汝舟在 1922 年 4 月 21 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天生了先生这一副聪明才力,不是徒然的,是特派来负一种责任,指导我们青年走他能走的路,享他能享的福。我常私自喜幸,生在先生指导之下,这番有了疑问,不求解决,岂不是坐以自误吗?”又如,青年教师吴文祺在 1922 年 10 月 30 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是最佩服先生的人,我的思想行为,受先生的影响也最大。早四年前,我是一个旧文学的信徒。后来读了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使我不得不信仰白话文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我读了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

纲,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读了先生的《论国故学》,我又知道整理国故的重要。”还有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在他初涉明史之时,曾得到胡适的指教。他在1931年8月26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要“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下去。”至于写信请教各种学术问题,要求帮助审阅各种文稿、指导各种研究课题,提供各种参考书目等书信就不胜枚举了。故有人说胡适“影响了一代青年学子”,看来并非过誉之词。^①

胡适的《〈镜花缘〉的引论》(1923年写)问世后,引起江苏海州人的关注,吴鲁星撰《〈镜花缘〉考证》一文,以为《镜花缘》不是李汝珍所作,而是当地传说中的许乔林、许桂林兄弟所作。孙佳讯看到吴文以及许氏兄弟所著书后,作《〈镜花缘〉补考》,断定李汝珍为作者,同时补正胡适文中的几处错误。孙佳讯文在《秋野》第二卷第五期上刊出,胡适读后,即写信给孙,“高兴的是你寻得了许多海州学者的遗著,把这位有革新思想的李松石[汝珍]的历史考的更详细了;感谢的是你修正了我的许多错误。”^②胡适在信中还请孙佳讯允许将著书以及许氏兄弟所作《〈镜花缘〉补考》作为《〈镜花缘〉的引论》的附录。

孙佳讯回信说:“接读你的信,使我十二分喜悦;我这篇《补考》,仅是零碎的杂记,不意竟引起先生的注意!受胡适的鼓励,孙佳讯于当年写了一篇《海属镜花缘传说辨证》(后刊于《青年界》第四卷第四期)。1935年又有《再辨镜花缘传说》之作(后刊于《学术》第三期),到1980年重审《镜花缘》作者疑案,撰《镜花缘作者的疑案》(刊于《中华文史论

① 参见:前言,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

② 胡适.胡适文存,第三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429。

丛》第三辑),至1984年孙佳讯出版《〈镜花缘〉公案辨疑》(齐鲁书社1984年版),终了结此公案。断断续续有五十余年,此中当然有他自己的治学兴趣,但也决不能排除胡适的肯定与鼓励的影响,这对一位刚走上学术之路的青年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这些论学书信,对于胡适而言是源头的活水,是学术的资源,是友情的承载,同时也是他学术理想的寄托,著述的方式之一。

在现代学人中,利用书信论学这一传统进行学术交流的,胡适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历史学者陈垣在撰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后,在写给陈乐素的信中说:“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惜陈[寅恪]、胡[适]、伦[明?]诸先生均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非无人也,无不客气之人也。”^①充满了无人商榷学术的遗憾之情。应该说当时整个学术界书信论学的风气都很浓厚,也能够心平气和地站在学术立场上进行讨论,由此而结成的学谊颇为我们现在所钦羡。以前文提到的胡适与陈垣为例,1930年11月,胡适携眷至北平,在米粮库4号租定新宅,而陈垣从1932年8月也搬至米粮库1号,直至卢沟桥事变,两人做了近5年的邻居,他们之间的论学书信往来很是频密,尤以1933年、1934年为突出。住得这么近为什么采用书信的方式,而不是对谈的方式,很是有趣。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书信的方式可以更为系统地阐述看法,并能保存,事实上这些都可以作为著述或是著述的准备。陈智超在《陈垣与胡适》文章中说:“他的一般信稿都写在用过的纸张背面,誊清发出后即不予保留。但5日函却保留了誊过的底稿,可见他对这次讨论的重视。同时他又为有胡适之这样直谅多闻

^① 陈垣致陈乐素函(1940年1月7日),见: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28。

的诤友而高兴,他在信中盛赞胡‘绝顶聪明’、‘研究态度及方法亟当师法’,是极少见的,也都不是谦辞。”^①在1933年4月1日至10日的十天当中,两人围绕《四十二章经》的问题,往来书信达8通之多,而且基本都是长信,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讨论^②,胡适对此次讨论相当重视,将《四十二章经考》一文及4月5日两人来往函、6日致陈函都收入他自编的《胡适论学近著》一书中,公开发表,“此次所论,问题虽小,而牵涉的方法问题颇关重要”,是展示他“此次所论,问题虽小,而牵涉的方法问题颇关重要”,是展示他的“历史演变的观点”的一个实例。

他们的书信论学犹如一场精彩的友谊比赛,实力伯仲、旗鼓相当,达成一致的地方心有默契,未能达成一致的地方,经过辩论、不断补充论据,使自己的观点更加严密,在学术上平等、坦率,用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智慧的交锋、学问的切磋,令人钦敬。

① 陈智超,陈垣与胡适.陈智超自选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216。

② 具体可参看陈智超,陈垣与胡适.陈智超自选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205—216。

——| 第二章 现代学术传播视角下的书信论学

书信论学在我国的学术传统中渊源有自,传统的中国文人借此传情达意,交换意见,表达学术主张及志向。随着现代学术在中国的发端与确立^①,书信作为重要的非正式交流渠道之一,在学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逐渐彰显。在这里,笔者尝试引入相关学科的理论以丰富研究的视角,将其置于学术传播与交流体系的理论中进行研究,赋予书信论学研究以全新的理论支撑。

^① 根据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序》中所说:“1898年至1905年前后这段时间,应该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时期。”“中国现代学术创造实绩的拓展和繁荣,是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和三四十年代。1925年清华设国学研究院、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是现代学术发展的两个里程碑。”

第一节 书信论学与科学交流论

一、“科学交流论”与“非正式交流过程”

对于学术交流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默顿(Robert K. Merton)早在其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结合社会学与科学史的名著中,以17世纪的英国为例,指出科学家彼此间的会面、通信以及期刊的出版,提供了思想交流的机会,因而有助于创造性研究的出现^①。学者Christine L. Borgman^②认为,学术交流是关于任一领域(物理、生物、社会、行为科学、人文学科、技术)的学者如何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使用和传播信息的研究。

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学家H. 门泽尔从载体的角度对信息交流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正式过程”和“非正式过程”交流论。“科学交流或情报交流通常被划分为非正式型和正式型两种”。科学非正式交流是情报生产者与情报利用者之间直接进行的情报交流,正式交流是指通过科学文献系统进行的情报交流。科学非正式交流也称直接交流,内容既包括传统的科学家个人之间的交

^① Robert K.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Howland Fertig, 1970: 216—224, 转引自陈以爱,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 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南京: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2。

^② C. L. Borgman,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C. L. Borgman (e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bibliometrics* (Sage Publications, Newbury Park, CA, 1990), 13.

谈、讲演、书信往来、参观访问、讨论、出席学术会议、交换出版物的预印本、抽印本等,也包括现代的电子邮件、电子会议、BBS、USENET 交流等。

这一理论经过前苏联情报学家 A.И.米哈依洛夫的研究整理,形成了体系严密的“科学交流论”,这里被称为传统的科学交流模式。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他就对“科学交流与情报学”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对“科学交流”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米哈依洛夫认为,交流是各个体之间借助于他们共同的符号系统(对人类来说就是口语、手势、文字,等等)进行情报交流;而人类社会提供、传递和获取科学情报的种种过程是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这些过程的总和称为“科学交流”^①。

根据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论”,我们可将科学交流过程概括如下:^②

关于学术交流,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依据科学知识传递的方式可将科学交流分为非正式交流和正式交流(或直接交流与间接交流);基于人际交流的科学交流和基于知识库的科学交流,非网络交流和网络交流等;根据知识创造者与需求者双方人数的多寡还可分为一对一交流、一对多交流、多对多交流等;根据知识创造者和知识需求者双方的性质可分为同行交流、学科交流、国际科学交流等。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科学家的个人交谈和交换书信是科学交流

^① [苏]A.И.米哈依洛夫等著,徐新民等译,王熹审校.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

^② 该图转引自李国红.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交流模式与规律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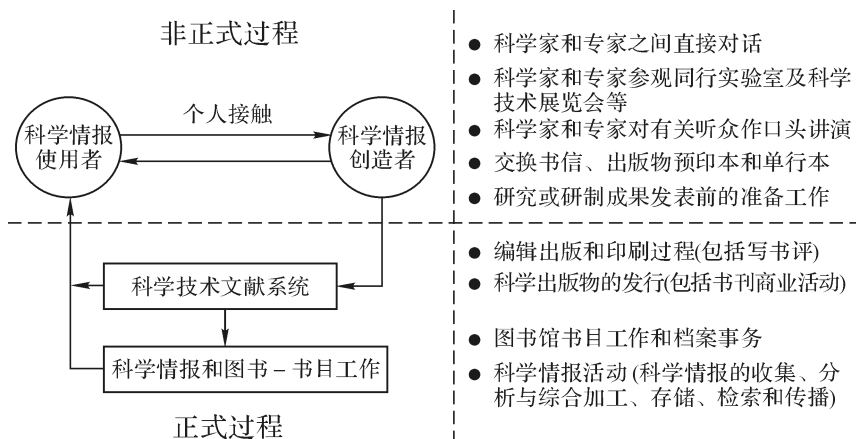


图 2-1

的主要方法。^① 17 世纪最常用的交流类型是学者的信件。David A. Kronick(戴维·A. 克朗尼克)在《科学技术定期出版物史》^②中解释说,“学者的信件曾被作为学术界交流思想和新闻的一种形式和最初的‘出版物’的形式。例如,Leibniz(莱布尼茨)在一系列信件中撰写了一部完整的哲学专题论文……”。

17 世纪的科学家通常独自工作,他们的信件往往论述他们自己的实验和思想。一封信可以采用方便的形式和长度报告一个单独实验的结果。一般情况下,一封信是写给一位科学家的,或者可能同时抄写并发给 3~4 人。收信人可能将信件给一些其他朋友看,但真正看到信的人数并不多。观察和新实验通常在科学家之间以私人信件

^① [苏]A. И. 米哈依洛夫等著,徐新民等译,王熹审校. 科学交流与情报学.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

^② Kronick D A. A Histo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 New York: the Scarecrow Press, 1962, 转引自李国红. 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交流模式与规律研究. 南京大学博士论文, 2002。

形式进行交流。这是一种传送研究新信息的方法,可将个人或团体进行的研究传送给其他的个人或团体,这些信件通常被送给一个扮演“守门人”或邮箱的人,让他或她传送新闻给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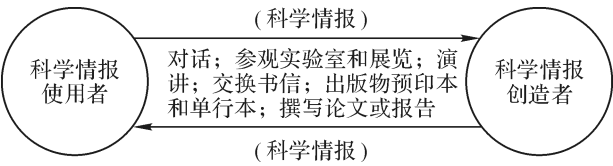


图 2-2

这种非正式交流或直接交流的过程包括直接对话、参观实验室和展览、演讲、交换书信和著作预印本、撰写科研成果,它们均带有明显的个体性质。与非正式过程相对应,在非正式交流中科学情报流动的通道或途径被称为非正式渠道。这种非正式交流由于没有中间环节而具有以下优点:

- (1) 间隔时间短,传播迅速;
- (2) 选择性和针对性强,即通过与同行或同事的直接交流比通过文献查找所需要的情报要方便和对口径;
- (3) 反馈迅速,即直接对话时对任何问题都可以立即澄清并根据需要立即修正答案,进行讨论;
- (4) 能根据谈话、演讲时总的气氛、语气、手势、暗示等领会所表达的意思,易于对所得到的情报作出恰当的评价;
- (5) 可以了解到通常不写进论文里的某些细节。^①

正因如此,非正式交流在交流系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① 该图转引自南京大学李国红博士,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交流模式与规律研究,博士论文,2002。

但另一方面,非正式交流渠道也有不可忽视的弱点,例如,适用的范围有限,往往只有少数人有参与直接交流的机会;由于不易搜集、加工,不便于知识的积累等。

二、“非正式交流”与书信论学

非正式交流也称直接交流,内容既包括传统的科学家或学者个人之间的交谈、讲演、书信往来、参观访问、讨论、出席学术会议、交换出版物的预印本、抽印本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应包括现代的电子邮件、电子会议、BBS、USENET 交流等多种交流方式。“非正式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古希腊、罗马时期已流行讲演、讨论,著名学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曾经利用讲演、会晤方式交流与传播他们的观察结果与学术成就。到中世纪,拉丁语成为欧洲通行的国际语言,科学家往往将其科学发现、学术思想以私人通信方式向同行报道或相互交流。如哥白尼在创造其天文学说时就多次与其他科学家进行过讨论。17 世纪早期,法国数学家 M. 麦森尼不仅与伽利略、霍布斯等互通书信,而且其住所成为学者聚集地。1800 年左右,巴黎成为国际科学活动中心,科学家云集,纷纷以法语发表讲演,互访频繁。^①直到今天,各种形式的学术沙龙、研讨会仍然是学术共同体科学交流的重要形式。

非正式交流导致了所谓的“看不见的学院”(invisible colleges)的出现。“看不见的学院”一词是英国科学家玻意耳在 1646 年提出来的,特指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由十几名杰出科学家组成的科学

^① 杨子竞.情报的非正式交流.情报资料工作,1992(6):13—14。

交流群体^①,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普赖斯(Derek J. de S. Price)将与正规组织学术共同体相对应的人际群体科学交流网络称为“看不见的学院”,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黛安娜·克兰(Diana Crane)进一步将人际间科学交流活动的网络作为“看不见的学院”。看不见的学院是区别于正式大学学院的、由关心科学的人们组成的非正式交流小组或群体,是科学共同体中各成员进行知识交流的重要网络。看不见的学院是由某些核心科学家领导组织的,其他科学家则围绕他们,相互了解,经常联系;他们的目的就是在一起聚会,讨论和研究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彼此交流思想和情报。

看不见的学院具有以下特征:

(1)科研上的共同性。看不见的学院具有共同的专业领域、趋同的学术思想、理论倾向和一致的方法论基础。学院的成员定期聚会,会上进行科学实验,讨论所得结果,而且这些实验和讨论结果往往被记录下来,记录的副本以书信的形式分发给其他学院中从事同类研究的朋友。

(2)组织上的松散性。看不见的学院没有正式的领导与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其成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国家很少介入科学的组织事务。而且,看不见的学院不是严格确定的学术团体,交流活动也没有制度化,但极少数科学界高级精英构成了该学院的核心。

(3)时间上的有限性。看不见的学院因某种学术研究任务、课题、兴趣而暂时组合,又由于任务、课题的完成而解散,或者转化为完全可见的正式的学术团体或科学院。^②

① 周庆山编著.文献传播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

② 杨子竞.情报的非正式交流.情报资料工作,1992(6):13—14。

论学书信就是非正式交流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非正式交流的鲜明特点,优点在于传递与反馈迅速、选择性强,处理敏感性信息等优点,非正式交流渠道由于能传递大量原生信息而受到学者的欢迎。同时非正式交流所具有的缺乏可靠性和稳定性,不利于信息的加工和知识的积累,影响了学者、专家对它的使用。书信的随意性缺乏严谨,不如论文发表或专著出版规范、严肃,同时获取渠道也有受到人际交往的限制,并非可以公开获取的信息,这也影响了其传播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现代学人的论学书信是现代学术传播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学者利用这一渠道越娴熟,学术资讯的获得就越容易,学术理念的传播也就越迅速,这也带动了学术群体的形成,推动了学术发展的潮流。

第二节 书信论学与清代学术交流体系的形成

根据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所为我们勾勒的清代学术社会,当时的学术交流体系已经初现雏形。

一、清代学术交流体系构成的各要素

1. 学者阶层的形成与学者的职业化

首先,“人”的因素体现在学者阶层的形成与学者的职业化,这是学术交流体系形成的必要条件。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学者培养路径:

兹学盛时,凡名家者,比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大抵后辈志学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辈延主其家为课子弟。此先辈亦以子弟畜之,当奖诱增益其学;此先辈家有藏书,足供其研索;所交游率当代学者,常陪末座以广其闻见,于是所学渐成矣。^①

私塾、家学、藏书、交游,经过精心培育的学者阶层开始显现。他们的前途除了科举出仕之外,也有了其他选择,“其学成名著而厌仕宦者,亦到处有逢迎,或书院山长,或各省府州县修志,或大族姓修谱,或有力者刻书请鉴定,皆其职业也。凡此皆有相当之报酬,又有益于学业,故学者常乐就之。吾常言: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出来,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②与前代学者相比,清代学者生活在一个主要依赖赞助的学术环境里,除了出仕做官,官方所提供的学术职位包括官修书目等(颇类似于现有学术体制中的大型科研项目)需要多人参与、集体相互协作的计划。如在17世纪《明史》、《大清一统志》等计划以及持续到18世纪的各种文化工程中开始形成的,这些文化工程主要依靠官方或半官方赞助维持运转。《四库全书》是规模最庞大的学术工程,它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协调一致共同合作。它为建立一种有助于资料交换及相应的成果发表的学术与社会交流体制树立了榜样。藏书家和学者们也投入到这样一

①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5。

②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6。

个图书整理工程,完成了一部当时世界上内容最丰富的丛书与目录。朝廷修书和地方官员幕友的著述活动要求众多学者同力协作,此外,私人学者也常招聘专家协助他们著书立说。这也就是艾尔曼所谓“清代书院、修书工程、学者型幕僚共同推进的学术研究”,“为考据学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话语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我们可以将其中的“考据学”理解为当时的学术发展。^①

学者阶层在充分的经济保障基础上,其从事的学术也相应地有了自己的尊严。艾尔曼在分析“江南学术界”的时候,另外还“与学术发展相应的外在而必不可少的社会、政治因素”^②,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他分析,江南是中华帝国晚期商业和交通的中心,进而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例如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地在文学、音乐、戏剧、书法、绘画领域内都深具影响力。另外,在19世纪之前,江南的盐商操纵了盐业,资产庞大,扬州盐商以学术界、戏剧、艺术的头号赞助商而闻名,常聘用大批考据学者开展学术活动。当时的图书业与江南高水准的文化成就也存在密切关联。江南一直都是图书出版、收藏中心。对清代各地进士录取名额的统计表明,江苏、浙江进士录取率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位。科举录取领先的地位使江南士子处于较高的政治地位。而这些出仕的江南士子又将江南学术的活力、风格移植到北京。这种移植是通过负责官方修书活动的政府赞助机构以及江南学者占有优势的清朝书院制度实现的。“1780年完成的官修《四库全书》聘用的大多数杰出学者来自江南。许多朝廷大员的幕

①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98。

②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7。

室以及北京翰林院中集中着大批前来投奔的江南学者。江南文风、学风及艺术风格通过这些赞助渠道传遍全国。”^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学者已经具备自己的品格特质,“学者的人格”也是梁启超所推崇的,“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格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②。他们对学术(或言学问)的执著追求,被梁归纳为“研究精神”,“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经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贡献。必如是始能谓之增加遗产,对于本国之遗产当有然,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其然。”^③这些无疑都是梁对清代前辈学者的肯定与致敬。

因此,学者阶层的出现、学者的职业化渐渐引发了地域学术团体的兴起。“这些学者借助个人或地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上的默契、共同的师承关系等中介聚合起来,形成特殊团体”,“江南学界富有吸引力的观点、通行的研究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个别特定学派的歧见,寻找发掘其共同的学术特征”。^④依照艾尔曼的观点,清代学者的职业化是保证清代朴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地域学术团体又可细分,张舜徽先生在《扬州学记》中指出:“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⑤。吴派以惠栋为

①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9。

②③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05。

④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9。

⑤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见张舜徽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

首,皖派以戴震为首,以汪中、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等都是地域性学术团体的代表。

2. 学术交流的渠道基本搭建

知识的创造与延伸是依靠一种有效的交流与承继制度来完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要形成公认的话语就要求相关学科具有用途广泛的文献积累与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因此,藏书楼^①、出版业对清代学术研究以及江南学术共同体中考据学派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广而言之,这些也是建立在印刷文明基础上的正式交流渠道在清代学术交流体系中的体现。依据上节“科学交流论”的理论阐释,以“出版”、“收藏”、“利用”为功能的“文献交流系统”是“正式交流”的核心所在。由于现代意义上的重在流通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尚未形成,其中图书馆担负的“收藏”、“流通”功能基本以藏书楼的形成出现。

“藏书楼”这个名称在我国晚清以前是很少有人使用的,它的产生和流行本身就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为了区别于西式图书馆和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图书馆,而将具有古代藏书性质的藏书处所统称为“藏书楼”。一般说来,中国古代藏书的特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私有。在中国古代的四大类型藏书:官府藏书(含皇家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中,虽然官府藏书经历过“学术守于王官”到“学术下于私人”的变化,但是“官守其学,学守其书”的格局几千年没有多少变化,因此在整体上仍是私有的。(二)封闭。这种封闭性不仅体现在不同类型藏书之间和同类型藏书之间彼此鲜有关联,而且更体现在其读者群的长期局限之上。(三)专享。显然古代藏书只是帝

^① 根据程焕文在《晚清图书馆学术史》中所说,在晚清之前,中国的藏书处所的命名没有定制,“藏书楼”完全是一个“近代化”的名称。中国古代的“藏书思想”与西方传入的“图书馆学术”相互融合,逐渐使图书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王的御用机构和达官显贵与士大夫阶层的专用设施。^①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在“藏”与“用”的关系上,绝对的只“藏”不“用”是不存在的,随着文献的印刷、获取的便捷与学者阶层的日益形成、壮大,古代藏书的流通与利用也逐渐地受到重视,也出现了一些有见地的声音,如曹溶的《流通古书约》^②、丁雄飞的《古欢社约》^③、周永年的《儒藏说》^④等,他们深刻认识到藏书的“藏”与“用”的辩证关系,曹溶设想私人藏书家的协作共同完成对各部类图书的校勘、集佚;丁雄飞通过学者之间的人际交流、传播功能合理流通私人藏书,并为我们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样本与案例;周永年更为我们勾勒了“务俾古人之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儒藏”美好前景,“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功倍哉?”,“儒藏既立,可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列入群书之前。经义治事,各示以不可紊之序,不可缺之功。凡

① 参见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5。

② 曹溶建议“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注,次史逸、次文集、次杂说,视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这样可以“成就古人,与之续命,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枣梨……”。

③ 丁雄飞与黄虞稷立约:“每月十三日丁至黄,二十六日黄至丁。为日已订,先期不约。要务有妨则预辞。不入他友,恐涉应酬,兼妨检阅。到时果核六器,茶不计。午后饭,一荤一蔬,不及酒,逾额者夺异书示罚。与徒每名给钱三十文,不过三人。借书不得逾半月。还书不得托人转致。”见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古欢社约.中华书局,1982:45。

④ 周永年对待藏书的态度相当达观,“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见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儒藏说.中华书局,1982:47。

欲读藏者,既以此编为师,斯涉海有航,无远弗届。”这些声音都说明在我国古代藏书仍是“藏书楼”阶段时,就已经开始逐渐出现流通的功能与进入公共领域进行学术传播的萌芽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清代学术交流体系中正式交流的功能。

而出版更是将学术成果进入公开、流通、传播的正式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在欧洲历史上出版业曾对学术文化的进步发展产生过人所共知的巨大影响。人们把出版业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人文主义思潮最重要的交流渠道。在西方文明史上,印刷术出现的意义远远超出纯技术发明的范围,它是著名思想家传播自己著作的得力手段。对学术研究而言,它使学者可以迅速和对同一题目感兴趣的同行交流研究成果。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印刷术都取代了职业化媒体成为最便捷的交流工具,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需要费大量人力才能运转。印刷品则是一种大批量生产、形式统一、可反复使用的商品。研究者过分重视了印刷术的技术价值,很少注意其产生的文化影响。

18 世纪,中国出版业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图书收藏及刊行成为现实,这就大大改善了学术研究及教学的条件。清朝时期的官刻业主要集中在内府,在武英殿设立了专门的刻书机构。刻书的印刷形式多种多样,雕版、铜版、铜活字、木活字、彩色套印等多种方法。编纂校精良。私家刻书,一类是著名文人所刻的著作和前贤诗文,另一类是则是考据、辑佚、校勘学兴起之后,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辑刻的丛书、逸书,或影摹校勘的旧版书。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商业的发展,商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使当地出版家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版图书。如“鲍廷博刻印的《知不足斋丛书》就被人称有二善:凡收一书必首尾具足,其善一也;必校讎精审后再镂版,其取材之精密,刊刻之谨

慎,尤非它书可比,其善二也。同时,鲍氏雕版的书,以罕见者为主,不与时人争奇。其他如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等,都极精善”^①,嘉庆年间阮元所刻的《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更是清代汉学家的文献,为研究汉学所不可缺的参考书。学术研究、藏书楼和书商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文化网络。^② 出版业的发展改善了江南及其他地区发表、流通及查阅资料的条件,使上述的图书收藏及交流形式成为现实,并推动各种史料系统、广泛的收集。出版家向江南学术界及其学校、书院、藏书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触珍本古籍的机会,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

如前文所描述的学术交流的过程,在清代的学术交流系统中,非正式交流中的书信、当面的晤谈是主要的交流渠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与其他学者的见面与晤谈非常普遍。如在钱大昕的《竹汀先生日记钞》^③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学人之间的交游,如“晤黄尧圃”,“黄尧圃来,以唐秘书省正字徐寅《钓矶文集》见借”,“黄尧圃过谈”等记载比比皆是。“答谈阶平札”,“卢抱经以校定熊方《后汉书年表》样本见示,闻鲍以文已刊入丛书矣”,书信往来,手稿的传阅与征求意见都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① 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338。

②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00。另外,伊里莎白·爱森斯泰因指出,印刷术的诞生是欧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手写文化的终结,印刷体文化的开始。他还指出,历史学家在理论上固然承认活字印刷术发明的革命性意义,但是具体研究中却缺乏真正的重视。只有理清手写体文化与印刷体文化的特点,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中世纪”和“近代”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③ [清]钱大昕撰.奚水勇校点.竹汀先生日记钞;附八喜斋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本书于钮非石日记、曝书杂记、前尘梦影录、破铁网等四种合订。

明清的学者喜欢游历,游历不仅可以增益见闻,而且可以尽量结交有助自己研究的学者,其实这也是谋求非正式交流渠道的做法之一。“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学者的成功,每得力于出游。一则可以论学取友,辨析疑难;二则可以搜访图书,增益见闻。在过去交通不便利,又不容易找到书籍的时代里,想在学术上做一番工夫的人,自然有必要勤于动脚,作远游计了”^①。以顾炎武为例,他漫游四方,游历的地区很广。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对于“交游”的研究,顾炎武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有《亭林学友表》,列举36人。其后谢国桢撰《顾亭林学谱》,其中《学侣考》一章所及有六七十人。所谓“学友”、“学侣”都是指与顾炎武互相论学的学者。^② 在他四十五岁准备到北方游学的时候,他的好友万寿祺、归庄、吴任臣等二十一人,替他写了一篇《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介绍信^③,将顾氏的家世、出身和治学功力一一阐述,介绍顾氏到富有藏书的人或官府里去参考异书秘籍,“昔司马子长遍游天下山川风土,乃成《史记》,范文正自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若宁人者,敬为先之以言。冀当世大人先生,观宁人之文以察其志,而助之闻见以成其书。匪直一家之言,异日天下生民之福,其必

① 张舜徽.顾亭林学记.见张舜徽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16。

② 参看《顾亭林交游表》.见: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该文将与顾炎武有书信往来、诗歌酬唱、面晤往来的人做了系统的整理,所依据的材料为诗词、书札、年谱、序跋、行状等资料,这也是对书札材料应用的例子之一。

③ 具体可参看《顾亭林学记》的附录.《顾氏生平论学取友的一斑》.见张舜徽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17。

由之矣”^①。又因他为人谦虚,尊重他人意见,取人之长,补己以短,使人容易接近,当时许多学者愿意亲近他。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改正一百多处,他自己认为虽已刻成,不可刷印,恐有错漏以误后人。他常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他出游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一带,随处都结识了一批朋友,他对这些学者朋友们的评价很高,在《文集》卷六《广师篇》中这样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在1662年冬,他到达山西太原,遇到阎若璩。这次见面对他们两个人都很重要。他向阎出示自己的《日知录》,阎提出了某些补充、纠正,被他愉快地采纳。阎把自己对顾炎武《日知录》的50多条补正以《补正日知录》的标题收入自己的读书札记中。

对于明清学术与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书札对于学术发挥的作用也开始受到重视。在张舜徽所著的《顾亭林学记》中,设有附录《顾氏生平论学取友一斑》,分为四节,“四十五岁以前的江南友好”,“四十五岁以后北游时期所结识的朋友”,“书札往还,未曾会晤的学者”,“相从请益的学生”,显然研究者注意到了顾氏当时所处的学术圈的交游,在“书札往还,未曾会晤的学者”列举了黄宗羲、陆世仪等两位终身未见面的学者,虽然未曾见面进行当面的学术交流,但其书信往来互相相当推崇,顾氏与黄宗羲的通信,收于黄氏《思旧录》,顾氏称道黄氏所著《明夷待访录》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这是书信作为非正式交流的典型例子,如果没有书信往来,两

^① 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张舜徽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17。

位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可能就没有交集了。在张舜徽的著作中,“学侣”的概念被常常使用,我们也可将其视为学术交流频繁的学者群,他们常常见面,诗歌酬唱、书信往来,形成了松散的学术群体,是对当时地域性学术群体的补充。

二、论学书信的内容

学者之间的私人通信会晤对 17 世纪、18 世纪的学术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清人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为著述被收入文集当中的论学书信所起到的作用。仍以顾亭林为例,分析他的论学书信,基本可以将这些书信的内容概括如下:

1. 自述生平。在《文集》卷三《答汪苕文书》中“弟少习举业,多用力于四经,而《三礼》未之考究。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方欲讨论,而多历忧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难购书籍,遂于此经未有所得”。诚实而谦和地指出自己对于“礼”的研究没有什么所得。而在《文集》卷三《与叶郎庵书》中云“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 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将自己坚持气节,不仕外族的志事解析得沉痛坚定,也是他所提出的“行己有耻”在现实生活的实践。这些论学书信的直率、诚恳为我们了解书信写作者的生平、志向以及研究方向等都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因此在对学者的专题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2. 发表学术观点,书信即著述。这是清代学者的“正统派”学风之一。很多私人书信是准备公开发表的,或是对某一学术领域的公开

著述,例如顾氏写给李因笃的《答李子德书》^①,长至三千字,是一篇完整的著述,也是他讨论古代音韵的代表作。其中:

夫人有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今之《广韵》,固宋时人所谓兔园之册,家传而户习者也。自刘渊韵行,而此书几于不存。今使学者睹是书,而曰是齐梁以来周颙、沈约诸人相传之韵固如是也,则俗韵不攻而自绌,所谓一变而至鲁也。又从是而进之五经、三代之书,而知秦汉以下,至于齐梁,历代迁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诗可弦而歌之矣,此所谓一变而至道也。

将古代音韵的迁变,源源本本,说得很清楚。这样的例子在清代学者的论学书信中很多。

3.朋友之间的意见交换及书稿往来评价。这类书信典型地将学术著作置于学术交流体系之中了,将学术著作递交给从事同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当下的同行评议制颇有类似之处。例如他写给陆世仪的《与陆桴亭札》^②中说:

二十年以来,东西南北,率彼旷野,未获一观清光。而昨岁于蓟门得读《思辨录》,乃知吾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具内圣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复簣;而秉烛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

① 转引自顾亭林学记·张舜徽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2。

② 转引自顾亭林学记·张舜徽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9。

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思辨录》刻全,仍乞见惠一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评价、认可。《日知录》与《思辨录》都是凝结他们学术主张的著作,通过邮寄互相交流,希望得到对方的“指示”和“批驳”,可以说是他们对学术交流的自觉运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顾炎武不喜作应酬文字,在《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八》中说,“《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他坚决不做无谓的应酬文字,所以当他的好友李中孚请他替母亲做传时,他认为“无关经术政治之大”,竟拒绝不作。因此可以将他书信中所做的评价视为中肯、真诚之作,而非应酬。又如在《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七》中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

评价也包括跟朋友交流对自己著作的评价,顾氏自己曾经指出《日知录》这部书:“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又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这种对自己著作的评价可以为我们了解《日知录》创作的主旨、特点以及作用有更深入的了解。

讨论学问的研究方法和入学门径。“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

(《文集》卷四《与人书四》),提出做学问,要钻研旧注,不满足于拘守一个时代、一位经师的说法,特别强调了融会贯通的重要。

这部分书信尤其值得重视,它们在学术史、思想史中的地位应予以充分认识。上面我们以顾炎武为例,简单分析了一下清代学术交流体系当中论学书信的内容。以管窥豹,可知当时书信论学的风气之盛。随着对清代著名学者文集的整理工作,《黄宗羲全集》、《王船山全集》、《戴震全集》、《曾国藩全集》等相继出版,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的书信论学传统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也有一些很有趣的类型,例如《曾国藩家书》。从严格意义上讲,曾国藩算不上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学人,不过他的论学书信传布之广,影响之深,还是值得一说。曾国藩家书初刊于1879年,即曾国藩死后七年的清光绪己卯年,由长沙“传忠书局”刊行。“从1879年至1949年七十年间,曾国藩家书几乎是每个读书人必读的书,那时候叫《曾文正公家书》”^①,毛泽东也曾在1917年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家书一体,又分为“禀父母”、“谕子”、“示弟”几类。在曾国藩家书中有大量的书信谈到如何学习,如何入门,尤其是教子书,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论学书信。虽然一概是居高临下的训示与吩咐,但对于学问入门者不无参考价值,其中几通写给儿子曾纪泽和《致澄弟沅弟季弟》的信,几乎与《朱柏庐治家格言》有同等的地位,有几篇甚至选入某些地方的中小学课本,作为修身、治学的格言来读。如“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②、“读书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等^③,也有谈到具体的学习方法,如“尔治经之时,无论看注疏,看朱传,总宜虚心求之。其惬意

① 钟叔和.重印序言.曾国藩家书.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3。

② 教子书,第二书,曾国藩家书.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442。

③ 教子书,第三书,曾国藩家书.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444。

者,则以朱笔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着数字,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久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①这些对于初涉学问之途的青年人都很有参考价值。对于学术界,曾国藩也有相当中肯的看法,“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其尤著者,不过顾、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昧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会所扇,群彦云兴。”^②简单对清代的学人作一梳理,无疑开列了一份人物谱与导读书目。这样的例子在《曾国藩家书》中有很多,也是后来家书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

① 教子书,第五书,曾国藩家书.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447。

② 教子书,第十五书,曾国藩家书.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456。

→ 第三章 现代学人论学书信整理与出版现状

前文主要论述我国清代学术交流体系的形成与中国古代书信论学的传统,下面我们着重讨论现代学人书信对于书信论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20 世纪可以说是书信论学传统的高峰期,其后随着通讯手段的不断丰富,书信论学传统逐渐走向衰落。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对于论学书信的整理、出版与研究状况。

第一节 关于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的整理、出版状况的统计

文献的积累是民族文化的血脉,同时也是治史的必备要籍。做学术研究(尤其是传统的文史之学)的努力方向,大略可分为三种,一是文献的发掘与整理;二是用某种方法和理论对史料作出解释;三是体系的建构。其中的第一种工作是提炼史识或建构体系的基础,文献工作的深入与展开,可以避免研究者匆忙得出结论或者作过度的发挥。因此,对书信这样的基础文献的整理应是当今学术界重视的

问题。

为了清晰地反映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的整理、出版状况,特制作《近现代学人书信集知见简目》,供研究者参考。由于人物的时代跨度较大,统计的人物基本以现代为主,兼及了近代。另因全集中的书信卷中也有大量的书信,所以再做《近现代学人全集知见简目》以供补充、参考。在此表中就不再另行统计全集中的书信卷。统计的不当之处,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统计状况概览

近现代学人书信集知见简目

著作名	册	编撰者	出版社	出版年
胡适来往书信选	3	社科院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	1979.5—1980.8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2	杜春和等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胡适书信集	3	耿云志、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42	耿云志主编	黄山书社	1995
胡适家书手稿			安徽美术出版社	1989
胡适给赵元任的信		蒋光华主编	台湾萌芽出版社	1970
胡适秘藏书信选	2	梁锡华选注	台湾远景出版社	1982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		台北胡适纪念馆编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8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		台北胡适纪念馆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王国维、罗振玉往来书信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东方出版社	2000

续表

著作名	册	编撰者	出版社	出版年
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		万丽鹃编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此书为台湾出版
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		周质平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胡适友朋手札	2		江苏广陵刻印社	2005
王国维全集·书信集	1	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	中华书局	1984
吕澄、熊十力论学书信集				
弢园尺牍		王韬		
近代十大家尺牍		曾国藩等	文明书局本	
俞曲园书札		沈松家标点	民国大中书局	1931
俞曲园先生书札		俞樾	新文化书社	1926
春在堂尺牍		俞樾	台湾文海出版社	
章太炎书信集		马勇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陈垣来往书信集		陈智超编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严复集,第三册:书信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蔡元培书信集		高平叔、王世儒编注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梁漱溟书信集		梁培宽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陈寅恪集:书信集		陈美延	三联书店	2001
周绍良友朋书札	1	李经国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梁启超致江庸书札		江靖编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梁启超未刊手迹	2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中华书局	1994
张元济书札		张元济著	商务印书馆	1981
张元济书札		张树年、张人凤编	商务印书馆	1997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张元济、傅增湘	商务印书馆	1983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		张元济、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2

续表

著作名	册	编撰者	出版社	出版年
清晖山馆友声集 :陈中凡 友朋书札	1	吴新雷等编纂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汪康年师友书札	4	上海图书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艺风堂友朋书札	2	上海图书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	1	陈独秀著	台北近代文哲学人 论著丛刊	1996
闻一多书信选集		闻一多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周作人书信		周作人著	青光书局	1935
周作人书信		止庵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知堂书信		周作人著	华夏出版社	1994
知行书信		陶知行著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9
行知书信集		行知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
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		周海婴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鲁迅书信选		鲁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鲁迅书简		鲁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鲁迅书信选注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 系编	语文自学讲义增刊	1977
鲁迅书信集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鲁迅书信集拾遗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资料室编	东北鲁迅学会丛书	1981
鲁迅杂文书信选		鲁迅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1
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		鲁迅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2
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		文物出版社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75
鲁迅著译书信索引		北京大学中文系资 料室、图书馆编	内部出版物	
鲁迅著译书信索引补正		北京大学中文系资 料室、图书馆编	内部出版物	
鲁迅书信	4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续表

著作名	册	编撰者	出版社	出版年
鲁迅书信钩沉		吴作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鲁迅书信选集		陈漱渝、刘天华 编选	民主建设出版社	1996
鲁迅书信考释		王景山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2
钱玄同文集·书信集		钱玄同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曹靖华书信集		张羽、铁凤编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		刘麟编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1 ^①
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		刘麟编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1
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		柳无忌、柳无非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			中华书局	1992
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名人手札选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名人手札选续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浙江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选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		
近代名人手札精选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9
近代名人墨迹		冯天琪、冯天瑜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尺牍留真:上海图书馆珍稀藏品系列		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作家书信集珍		刘衍文、艾以主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9
中国书札赏玩		梁基永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5
韩国钧朋僚函札名人墨迹		江苏档案馆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① 原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的“现代作家书简丛书”之一种。

另外,在全集中一般都有对书信的收录,为了全面地反映现代学人书信整理的状况,特将 80 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近现代文化名人的全集出版状况统计如下,以供参考。

近现代文化名人全集知见简目

书 名	卷/册数	出版年	出版社	备 注
谭嗣同全集	2	1981.1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孙中山全集	10	1981.7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龚自珍全集		1975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国维全集		1984.3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李鸿章全集		1985	上海人民出版社	
蔡元培全集	8	1989.7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蔡元培全集	18	1997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
朱自清全集	12	1988—1998	江苏教育出版社	
朱光潜全集	20	1987—1992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
宗白华全集	4	1994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
陶行知全集	6	1984.1	湖南教育出版社	
陶行知全集	10	1991.7—8	四川教育出版社	
杨贤江全集	6	1995	河南教育出版社	
戴望舒全集	3	1999.1	中国青年出版社	
鲁迅全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鲁迅全集	8	1995	新疆人民出版社	
鲁迅全集			广西民族出版社	
鲁迅手稿全集		1977—1979	文物出版社	
鲁迅全集		1958 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新版 注释本)	16 卷	1981 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2006 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续表

书 名	卷/册数	出版年	出版社	备 注
萧红全集		1991	北方文艺出版社	
萧红全集	2	1991	哈尔滨出版社	
艾青全集	5	1991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冰心全集	8	1994	海峡文艺出版社	
赵树理全集	5	1986	北岳文艺出版社	
曹禺全集	6	1996	花山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全集	12	1992	浙江文艺出版社	
欧阳予倩全集		1990	上海文艺出版社	
郭沫若全集	50	1982.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文学编 历史编 考古编
茅盾全集	40	198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松堂全集 (冯友兰)		2001 年出齐	河南人民出版社	
徐志摩全集	5	1991.7	广西人民出版社	
徐志摩全集	5	1988.1	上海书店	据香港商务版重印
闻一多全集	4	1982.8	三联书店	据上海开明书店 1948 年 纸型重印
闻一多全集	12	1993.10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
巴金全集	26	1986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秦牧全集	11	1994—2004	人民文学出版社	
韬奋全集	14	1995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鹤琴全集	6	1987—1992	江苏教育出版社	
胡风全集	10	1997	湖北人民出版社	
张岱年全集	8	1996	河北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全集	8	1989—1993	山东人民出版社	
李四光全集	8	1996	湖北人民出版社	
俞平伯全集	8		花山文艺出版社	
俞平伯全集	10	1997	河北教育出版社	

续表

书 名	卷/册数	出版年	出版社	备 注
郑振铎全集	20	1998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邓以蛰全集	1	1998	安徽教育出版社	
康有为全集		1987—1992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晏阳初全集		1989—1992	湖南教育出版社	
章太炎全集	6	198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謇全集	7	1994	江苏古籍出版社	
冯至全集	12	1998	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瑶全集	8	1998	河北教育出版社	
廖沫沙全集	5	1997	花城出版社	(三家村文库)
吴趼人全集	10	1998		
程千帆全集	14	1998	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季思全集	8	1998	河北教育出版社	
吴梅全集	4	2002	河北教育出版社	
顾随全集	4	2001	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朝闻全集	18	1998	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大钊全集	4	1999	河北教育出版社	
梁实秋全集	10		鹭江出版社	
郭小川全集		200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顾毓琇全集				
沈祖棻全集	4	2000	河北教育出版社	
康有为全集		1990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元任全集	4	2002—2005	商务印书馆	
章士钊全集	10	2000	文汇出版社	
蒋孔阳全集		1999	安徽教育出版社	
师陀全集	5	2004	河南大学出版社	
孙犁全集	11	2004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萧乾全集	7	2005	湖北人民出版社	

续表

书 名	卷/册数	出版年	出版社	备 注
罗念生全集	10	2004	上海人民出版社	
阿英全集		2006	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适全集	44	2003	安徽教育出版社	
戴震全集		1991—1998	清华大学出版社	
傅斯年全集	7	2003	湖南教育出版社	
傅斯年全集		1980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汤用彤全集	7	2000	河北人民出版社	
章士钊全集	10	2002	文汇出版社	
熊十力全集	10	2001	湖北教育出版社	
赵元任全集	14	2004	商务印书馆	
范文澜全集	10	2002	河北人民出版社	
魏源全集	20	2004	岳麓书社	
曾国藩全集	26	1987	岳麓书社	
张之洞全集	12	1998	河北人民出版社	

二、现代学人书信集出版状况的特点

1.大量近现代学人书信集得到出版

从笔者整理的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 ,近年来近现代学人书信集的出版呈现逐渐繁荣之趋势。一来是因为近现代特殊的学术史价值得以承认和肯定 ,另外书信对于当时学术史的特殊价值也日益受到重视。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书信 ,与日记、年谱等都受到了治史者的重视。上表是根据笔者所见所进行的不完全统计 ,目的在于全面、清晰地了解近年来对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的整理情况 ,也为有关研究者提供文献线索。

2.以人物为中心 ,大量书信得到系统的整理

由上表 ,我们可以看出 ,大量的近现代学人的书信被搜集、整理

出来。大多数书信集以人物为中心,其中又以胡适、鲁迅为整理的重点。像《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这类型的由机构(出版社、图书馆、档案馆等)收藏为中心的书信集较为少见,不过其中提供的材料仍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以《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为例,该书以原版影印的方式收录了1949年以前近150位名人与中华书局磋商书稿、探究学问的书札约750件,其中有些书信在全集中也未收录。这批书信相当有特点,虽然有舒新城等具体的收信人,但因为是写给出版社的信件,所谈基本都是公务,介于公函与私人信件之间,或谈版税或荐稿件,是难得的史料^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②为胡适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同时,将这些珍贵

① 根据陈平原《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一文的论述,这册书信手迹的价值首先在于有助于确定作家和学者的创作和研究活动。不只是这些书信基本上是首次公布,为各名家的年谱、全集所漏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确定某些未编年诗文和书信的写作时间,因为中华书局收藏信件上大都盖有某年月日收到章。第二在于提供不少有趣且有用的史料,如曾朴在批评译界懒惰、译文生硬晦涩时,称“鲁迅所译诸书,令人有译如不译之叹”,宗白华“做文努力于言简意赅,不愿拉长许多废话”,所以版权方面希望抽版税而不卖稿等。第三,在于有些史料可以纠正研究中的偏见。具体可参看陈平原,《漫卷诗书:陈平原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② 北京大学图书馆决定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将这批珍贵资料影印出版。这些资料的内容包括:1.澄衷中学日记;2.胡适抄录徐志摩日记残稿;3.中文书信116封;4.英文书信141封。在这些资料中,《澄衷中学日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胡适日记,起始年为1906年,比200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中最早的《藏晖室日记》第五册早出三年多。虽然胡适在澄衷中学的时间只有一年,但这是他接受新式教育和现代思想的开始,严复、梁启超等人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他后来思想、志向的形成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其价值不可低估。从现在已经出版的情况来看,徐志摩的日记非常不全,胡适手钞徐志摩的这篇日记残稿,属于已经出版的志摩日记所未收的文字。在这批中文信件中,除胡适妻、子的家书之外,还有蒋梦麟、傅斯年、罗常培、钱端升、王重民、孙楷第、翁文灏、王世杰等当时著名学者和政界名人的书信。英文书信主要集中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当时为国内抗战所做的努力,以及与美国学者名人的文化交流。

的书信、手札由收藏机构来出版也是一种很有新意的出版思路。

对于现代学人的书信整理,在国内做得比较完整的是对胡适书信的整理。由表 3-1 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胡适书信的整理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胡适档案》,收录有 1949 年离开大陆以前的各种资料)、台湾胡适纪念馆以及其他机构(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来进行。由于书信的收集和整理存在很大的难度,以胡适的书信为例,在他的故乡安徽绩溪有部分收藏,台湾有胡适纪念馆,国内的一些院校,例如北京大学,也有胡适离开大陆前遗留的大量资料。因此,这些书信集互相比照,可以互相补充,纠正讹误。例如《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中共收胡、杨往来书信 205 封,其中胡适致杨联陞信有 87 封,而在北大版《胡适书信集》中只有 10 封,同时北大版在对胡、杨书信的编次、内容核对上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的内容根据杨联陞提供的原件或复印件,在综合由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的原件照片由台北胡适纪念馆认真整理,因此可作为研究胡、杨之间往来的可信底本。同时,也说明由于书信的特殊性,要想整理、出版尽可能真实、完整的书信集,要靠书信的发件、收件人、研究机构与出版机构的通力合作。

以人物为中心的书信当中,一种是往来书信选,收录双方或写给其他多人的往来信件,专收特定对象两者之间的如《王国维、罗振玉往来书信》,《谈诗论学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专收两人之间的往来书信,收录作者与多方之间的如《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陈垣来往书信集》。一种是收录单方的信件,多数是收录写给其他人的书信,如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书信集,也有特殊的只收录收到的来信,例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艺风堂友朋书札》(2 册),4 卷本的

《汪康年师友书札》收录的均非本人写给他人的书信,而是其他友人写给缪荃孙和汪康年的来信。

在书信顺序的编排上基本都以时间为序,有区别的则一种是单以书信的年代为顺序(例如1936年为标目,列出该年所写的所有书信);一种以往来人物的书信前后为顺序(例如写给某某的来信以时间顺序罗列)。前者是将所有的书信汇集起来,按照年代进行编排,同年的书信按前后顺序编排,如《鲁迅书信选》等,优点在于简便易查,缺点在于将专门人物或事件的信件割裂开来。另外一种以人物为中心的书信编排方式注重“往来”,将与某人的往来书信再按时间顺序汇集,如讲一事就显得有头有尾,清晰明朗。

应该指出的是,对于现代学人书信的整理还过于局限与集中,随着资料搜集的积累,一些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例如熊十力、傅斯年、吴宓等的书信集也应逐步推出。^① 另外一些重要的机构,例如出版社(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图书馆、档案馆也应该积极开发内部资源,为保存珍贵的学术史料贡献力量。

3. 全集的出版与书信的整理

对现代学人书信的整理,与对现代学人文集、全集的整理与出版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对书信的单独整理之外,对于近现代学人书信的整理,大多以名人全集中的分册的形式出版。通常是列为全集中的书信卷,或与日记、档案等卷合编为一卷。其实这两种形成也是

^① 由于政治上的忌讳、学术上的困难,还包括经济上的窘迫等,未能及时整理、出版的现代学人或“大家”的书信集还有不少,例如严复(1854—1921)、康有为(1858—1927)、蔡元培(1868—1940)、章炳麟(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刘师培(1884—1919)、陈独秀(1879—1942)、鲁迅(1881—1936)、周作人(1884—1967)、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顾颉刚(1893—1980)、茅盾(1896—1981)、郑振铎(1898—1958)等。

密不可分的。

全集是“将一个作者或几个相关作者的文字作品尽可能全部汇集的书,是全面了解作者思想主张和生平活动的最主要的资料”。^①同时,全集的出版不仅对于研究作者,而且对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物的研究,甚至研究某一特定的事件和时代,都保留了大量的资料,有着珍贵的价值。“重要作家全集的编纂,不但是文学史研究的重心,梳理特定时期清晰的文学知识谱系,也可让学者以宏观的视角,探索作家的历史定位,并能微观作家的内在机制与独特风格,琢磨推敲个别文本与同时代其他文本间铸造的相互参证的坐标。”^②“全集”之不同于“选集”,不在篇幅,而在体例:后者可以扬长避短,前者则必须巨细无遗。因为全集是对作者全部著作的收集,不仅在特定的学术专业领域中穷尽其文,凡作者所涉猎的领域均要反映。这就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材料。不仅可以了解作者的学术见解,而且可以通过这些第一手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为全面了解某学科的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是一项有重要文史价值的文化积累工程。

近现代学人书信得到有计划的整理,部分借助于20世纪末的“全集”出版热。根据笔者对1980—1999年间全集出版情况进行的不完全统计,出版各种文化名人全集大约近百种,与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只有《鲁迅全集》、《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几种全集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全集,文集的汇编也为书信的整理奠定了基础。与全集不同,文集“即作者一生文章的汇集,按照一定的编辑体例分类出版。

① 出版词典编辑委员会.出版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122—123。

② 陈长房.厌足知性的好奇:试论英美作家全集的纂辑.台北:文讯,1998(9):42。

它和全集的区别,一是文章选得没有全集多;二是作者在世时不宜出全集,文章收得再全,也只能叫文集”。^① 全集、文集这样的文献资料必然为研究作者的思想脉络、生平活动、学术承袭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些有计划的整理中,许多现代学人的书信集得以整理、出版。例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系列,整理、出版了包括《王国维全集》书信卷、《严复集》(书信卷)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正如《王国维全集》书信卷中《编辑说明》所言,“他对时政的种种关切,对国家民族之所忧患;对人事进退的好恶,对交游向背的去取;直至师友间的学术讨论、文字切磋,无不表述于书札。因此,王国维书信对研究王国维及有关的诸问题,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的推动下,上海图书馆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近代文史方面的馆藏稿本,如作为《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艺风堂友朋书札》2册、4卷本的《汪康年师友书札》,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些书信资料珍贵而具有参考价值。“艺风堂”是清代著名学者缪荃孙(1844—1919)的室号,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纂,创办过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学问渊博,交游广阔,著述繁复,尤于金石碑帖、版本目录之学钻研特深,熟娴文史掌故。缪氏与同时代知名学者 157 人与之论学的书札。凡关于搜书刻书、访碑摹拓,以及清史之编纂、各省方志之重修,以至朝政时

① 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② 编辑说明.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1。

事、社会活动等等,于书札中均有较多之记载与反映。自清末至民初四十年间之学术动态,版本流传、文人交游,皆得于此观其大略,可供学术界和文史研究工作者研究和参考。四册的《汪康年师友书札》,为研究汪氏和清末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这些书信所采用的是以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作为底本,史料价值难以磨灭,同时也为我们明确再现缪氏和汪氏的交际圈,提供了有趣的研究路径。

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也设有一个整理出版《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的计划,主要是搜求编印散落在民间或海外的文稿,其中有关书信的出版物有《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陈垣先生往来书札》、《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①等。

不过,全集对书信的处理存在一个问题,书信本是一种对话,可一入全集,都变成了独白。而丧失了对话者以及特定语境的书信,阅读起来总有遗憾,这是所有编纂全集者都面临的难题。书信进入全集,只能按时间顺序排列,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样一来,此前出版的若干书信集,或因其专题性,或因其保留对话者,仍然有其存在价值。比如,《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

^① 台静农辞世后,文哲所筹备处在各方协助下整理他遗下的各类文献,其中所藏的书信颇为可观,仅陈独秀写给他的信就有一百余封,故先将陈先生的真迹影印问世。《书札》共分为“书札”、“相关资料”、“诗文卷”、“题字对联”、“陈独秀手书自传”五部分。“书札”起于1939年迄于1942年,具体分布是1939年6封,1940年35封,1941年36封,1942年17封,年月不确定者5封,只有信封者12封。综观这些书札和其他诗文,可以说它们是研究陈独秀晚年日常生活和著述情况的一份重要而丰富的材料,《书札》可以说是陈独秀的一部作品集,而这些作品在目前比较完备的《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均未提及,所以尤其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而此书整理极为精审,信件存有信封者连信封一同印出,仅有信封的也将信封印出,而且印制清晰,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存真。这种整理文献的精神令人钦佩。

1970)、《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后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简体字版)、《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和《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以及研究者广泛使用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便都有全集不可及处。

4. 书信整理中的难点与遗憾

首先是搜求的困难,因为信件要寄送给收件人,书信往往分散在四处,如果作者不自行抄录底稿,想要把书信搜集完整,确实很有难度。这就需要大量的搜求、征集工作了。对于零散书信手札的收集,应留意收藏市场;对档案的系统整理,也能使一些难得的书信手札公之于众,很多学者都有起草书信草稿的习惯,例如胡适、陈垣等,书信的草稿也应予以注意。胡适成名早、撰述多、影响大,尤其难能的是他的“历史癖”,知道身后必将成为研究对象,预留了许多有用的资料。每文必注写作时间,书信从不苟简,日记里粘贴许多参考资料,悉心保存自家草稿及朋友往来书札,这些都为书信整理留下了很多线索。学术期刊中的零散材料也不容放过,有关人物的佚札、书信往往能为书信的搜求提供有用的线索,尤其是史料类的期刊,如《新文学史料》、《新文化史料》、《文献》等。

其次,整理中对于书信撰写时间的编排,有些信件未标明明确的时间,就需要整理者根据所述内容、事件、人物进行时间上的排序,在出版的书信集中,书信的时间误排是常见的错误。书信中字迹的潦草,难以辨认,就使誊录与标点难度增加,原版影印的方法使这样的误植最大限度地降低,同时可以保留书信原貌,例如抬头、空格、对人物的尊称等都能得以保存,但并不方便广大读者,建议书信的整理可

以以影印加整理文本的形式,给出参考的底本。

第三,对于书信内容的解读,由于书信书写的随意性较大,有些内容会结合当时的情境、语境进行简写或指代,对于后来的解读造成困难,整理者必须理清所叙事件的脉络,了解书写当时的历史背景、细节,对某些特定的称谓、人物、事件进行必要的注释、解析。关于注释,陈智超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提到的两种方法相当可靠。一是“信史互证”,以传记、学谱、著述等多种材料互相印证;二是“尽量采用当事人自己的话”,包括过去的文章、写信征询收信人的回忆等方法,提高注释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对于书信的整理和研究,目前仍处于资料整理的阶段,对于书信资料的处理限于存真、勘误。而这些书信对于学术史的珍贵价值、作为学术传播体系渠道之一的重要作用,并未得到足够的认识与重视。

第二节 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的特征

对照前文所叙的清代学人的书信论学传统,现代学人的论学书信又有哪些新特征呢?

一、书信的数量大增

对比清代学人的论学书信,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到数量的区别。清代学人的书信往往汇集成一卷,或与其他文体(如表、志)的文章混为一卷,置于文集之末。而近现代学人的书信数量就丰富多了。以胡适为例,1949年他离开大陆去美国之前,留在北京寓所中的个人书

信就有 600 余通,他人来信有 1 万余通。单《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就收录与当时的社会知名人士研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等各种学术问题的往来书信近 700 件,约 80 万字。大量的书信往来,是当时学人交流的重要渠道。再以陈垣为例,《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集到他写给他人的信件 375 通,编者说“这在他一生所写的大量信件中,可能不到百分之一”。这些都是清代文集中所收录的论学书信无法比拟的。

究其原因,首先是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清末民国期间信息交流渠道的发展与丰富。1906 年清朝政府成立了邮传部,民间的书信、邮包的传递改由国营,效率提高,另外电报、电话业务的建设与发展也使人们沟通交流的渠道更为丰富,^①函电也成为书信的类型之一。这些新变化都直接促成书信的数量增加。其次在于对待著作与书信的态度。前文提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代学术风气的总结中提到经过师友严勘得失的书信,“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比起前代学人,现代学人得以学术交流的渠道更多,例如正式的交流渠道——学术期刊,繁荣的现代出版业都为现代学人提供了广阔的成果交流平台。著述的交流与公布不再困难,而与其他学者或是外界的交流渴望变得更加强烈,论学书信的数量大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关于对现代学人书信的辑佚,陈平原有一很有趣的说法,“对于那些特别珍惜自己羽毛的文人学者来说,后人的拼命辑佚,把他遗弃或有意掩埋的东西翻出来,重见天日,简直是跟他过不去”。有些学

^① 参见苏全有著的《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第五章《邮传部与清末交通事业的发展》中有专门的介绍。

人基于爱惜羽毛的文人传统,反对校勘,不愿意重印某些旧作,所谓“悔其少作”,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刻意掩饰,而是对于那些不太精彩的“少作”,如果确需重印则要修改。对于那些未打算公开的私人书信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陈认为应注意经过公开渠道发表的论学书信,对现在公布的大量学人书信材料的使用,应持慎重态度。

二、内容发生了显著变化

说到内容,现代学人的论学书信中所涵盖的内容就丰富而广泛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学人”的职业化引起的,中国学术史上的传统意义上的书斋型学者在近现代开始逐渐职业化,“学人”开始以学术为职业,大学、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报刊、杂志等学术传媒的蓬勃发展,使学术成为一种事业、职业,逐渐建构起西方式的学术机制,因此学者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学术事务性的内容的往来信件越来越多,学术观点的交流、意见的交换也越来越多。

在这些内容当中,公与私、新与旧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耐人寻味。书信这种特殊的文体,既可以公开,又可以私密。它的私密性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它也往往是人们公开发表自己观点、态度、学术立场等的重要工具。“顾廷龙曾要人们读盛宣怀的来往手札时,能与《汪康年师友手札》中同一人所写的信相对照。因为盛是大官,友人给他的信中谈的多是公家的观点,可是汪康年是报人,友人给他的信函中常表达私人的观点。两者常有出入。”^①这就说明根据交际对象的区别人们的书信内容也随之变化。又如林纾,这位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在家信中却告诉他的小孩应该“德文、算学,以全力赴

^① 参看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之,国文流览而已”^①,这也是公开与私下有所分别的例子。在傅斯年的档案中,也有相似的例子,譬如陈布雷,在公开场合或许不致对孔宋财团表示明显的不满,可是在私函中,则对傅氏攻击孔祥熙事表示欣赏。

“公”与“私”最明确的分野在于传媒的介入,私人通信仍旧属于隐私的范畴,而公开发表的书信使其进入了传媒的视野,进入到公众领域中,使其成为宣传思想、表达观点、进行争论的工具,这种书信体的文章或是期刊中的“通信”栏目的内容集中体现了书信的“公”、“私”之别。报刊文章在当时成为真正的“时代宠儿”,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著述,都首先在报刊发表,而后才结集出版。这里以《新青年》为例,介绍其重要的栏目“通信”,后文中还有详细的论述。《通信》栏目是《新青年》杂志的常设栏目,很多有分量的话题与争论都是从“通信”栏目开始的。例如1916年刊于《新青年》第2卷第2号的“通信”中,就有胡适写的《致独秀》,讨论关于着手文学革命的8件事,陈独秀亲自撰写回复,“海内外讲究改革中国文学诸君子,倘能发为宏议,以资共同讨论,敢不洗耳静听!若来书所谓加以论断,以仆不学之文,何敢何感!”^②在陈的鼓励之下,胡适在其来信的基础上撰写《文学改良刍议》,刊载于3个月后的第2卷第5号上。之后陈独秀又撰写回应文章,将话题引向深入,如刊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的《文学革命论》。又有《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钱玄同、刘半农制作的“双簧”,由钱

① 周策纵编.民初书法.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1995:40,转引自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32。

② 胡适,陈独秀.通信.见: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287。

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诸君子”写信，责难白话文学，后由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逐条批驳，且嬉笑怒骂，刊于《新青年》4卷3号，影响巨大。这些都是对“通信栏目”的巧妙应用。“每期《新青年》上的‘通信’，都并非无关痛痒的补白，而是最具锋芒的言论，或最具前瞻性的思考。一旦思考成熟，不衫不履的‘通信’，便会成为正襟危坐的‘专论’。对于不只希望阅读‘思想’、更愿意同时品味‘性情’与‘文采’者来说，作为‘专论’雏形的‘通信’，似乎更有魅力。”^①报刊作为开启民智、传播文明的重要公共空间，书信借助于报刊这一新兴媒体在其搭建的公共空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体可参看第四章第二节“书信的学术组织”的章节，有作详细的论述。

“新与旧”的碰撞与融合正是当时的时代特征，时值新旧转换之际，“新”与“旧”的微妙分别也渗透到每一种领域中。当时许多文字中都透露一种“新人”与“旧人”的分别。两者在价值观、人生观、学问的品位及态度、行事风格等许多方面的不同。在当日，“新人”、“旧人”可以从职业、日常生活的习性、嗜好、语言、衣着、甚至饮食之微细处看出分别来。在私人信函中尤其可以从隐微之处看出新旧转换或毫无变化的痕迹，我们可以选出不少这样的例子来，如《张元济书札》、《陈寅恪书信集》中张、陈的书信等皆为文言，而胡适等新派人物的信就基本是用白话的。而在《蔡元培全集》中蔡的书信、私信多用文言，而一些公开性质的序跋、演讲词多为白话。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由他起草的故宫博物院致（北洋政府）国务院函（1926年1月）通篇文言，典雅华丽，读之朗朗上口，又是以文言来写的公文信函，与前者对

^① 陈平原序。见：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9。

照,很有趣味。又譬如在《傅斯年档案》中,绝大部分公私信函都用毛笔,用钢笔者极少,用原子笔则绝无仅有。当时钢笔固不便宜,但是连傅斯年这样的留洋学生也用毛笔,值得注意。在同一份档案中,李方桂、赵元任留学生等则从未有用毛笔的书信。^①

在《新青年》中刊登过当时还是年轻学生的郁达夫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通篇白话,“胡先生:我并不认识你,你当然是不认识我的。你们的那一番文艺复兴的运动,已经唤起了几千万的同志者。大约不认识你的青年学生,唐唐突突的写信给你的人,也一定不少的了……我也就是这些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个人。”并请胡适“回信最好请你用英文写”。^②梁鼎芬民国后,尚以“宣统”纪年,以示不忘旧主;董康则以民国比诸“夷狄之不如”,且云:“质而言之,吾人之所图者唯名与利;宗社已覆,唯借此数片梨枣,以博身后之名耳。”^③公与私、新与旧、文言与白话,这些都是现代学人论学书信中出现的特有的时代特征。

三、论学书信对现代传媒的积极介入

现代传媒的出现对于学术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科举废除之后,特别是在社会制度发生转型之际,现代文人,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人对于出版业的积极参与,使现代出版业别开生面。“现代出版业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知识分子在调整了安身立命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也调整了生

① 可参见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32。

② 郁达夫.致胡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一.上海:上海书店,1992:398。

③ 参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存的方式和实现自我的方式,仕途已经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比较实在的倒是祖先们筚路蓝缕开创而来的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①根据前文所研究的学术交流理论,现代传媒(出版机构、学术期刊)是科学交流的正式渠道,书信是非正式交流渠道的代表,这两种交流渠道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我们通过查阅资料可以发现,当时大量书信都以公开发表的形式出现,留意书信集的出处,很多信件发表于当时的期刊、报纸上。由于当时正处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的时期,学术论文的书写格式还未有固定要求,很多学术观点的阐发就是以书信的形式(具体可参看论文第四章)。在各大学与研究院的学术期刊出现之前,学术性报纸的副刊起到了传播学术的基础性工作,例如有胡适、钱玄同、顾颉刚、陆侃如等参与的《读书杂志》(《努力周刊》的增刊)、天津的《益世报·史苑》和《大公报·文史周报》等,尤其著名的是当时北京的《晨报副镌》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

我们可以从现代学术传播的角度检视,为了实现有效的传播与交流,现代学术界发展出了正式学术媒介系统(学术会议、定期出版物、图书馆等),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各种非正式渠道(私人通信、访问讲学、暑期研讨班、论文预印本等),而且,正式与非正式学术传播渠道之间也是一种“共通共融”的互利关系。学人书信的公开发表,其实就是非正式交流渠道与正式交流渠道(学术期刊的发表)谋求“共通共融”的典型例子。

借助于出版周期短、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的现代学术媒介,有利于特定学术读者群体的形成,同时也能以期刊、报纸上发表的论

^① 陈思和.试论现代出版业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复旦学报,1993(3):47。

文、书信等实现快速传播效用,之后再以书籍形式出版。

除了直接将书信发表,或以书信体撰写学术论文,学人书信中还有常与期刊、出版机构等现代传媒互相接触的内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张元济友朋书札》选入严复致张元济书札一通,就是当时严复与张元济商量《原富》一书的翻译与出版问题的,书札中对书的具体出版步骤乃至书的版式设计都有细致的设想,可见他们对于现代传媒相当熟悉,而且多有介入。

四、学人的交际圈扩展

往来书信能够描绘交际圈,从现代学人的论学书信来看,比起清代学人这些前辈,他们的交游更为广泛,更为活跃。相对于前代学人亲缘、地缘、科举考试的师生、同年考中科举的人等种种关联,现代学人又多了不少交际网络,例如同学、同事、经由现代媒介而建立的关系(例如同人杂志中志同道合的同人,经由期刊、出版物等现代媒介结识的陌生朋友等)。现代学术(包括学术机构的成立、学术期刊的出现、大学的逐渐形成)的确立也为现代学人构建交际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交际圈中,在讨论学术的范畴内,“新”人与“旧”人的关系相当密切,例如胡适与王国维(具体可参见前文),以“学术”为旨趣成为他们交流的坚实基础。与国外的学术界也有良好的沟通,在王国维、胡适、鲁迅等的书信集中可以找到不少与国外学者互相致意、提供研究线索的信件。例如在《王国维全集·书信卷》^①中就收录了他写给铃木虎雄、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等日本汉学家们

^① 参看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的信件,反映了当时中日的学术交流情况。关于中日学术交流的书信论学情况可参看第四章关于书信的信息传播功能的论述。

同时,这个学人的交际圈除了进行信息的沟通、交流之外,也能够给学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行切实的帮助。例如在《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中,就能找到赵元任和杨联陞帮助在台湾的梁方仲、全汉昇、劳干、李济、严耕望赴美访学的文字。在1953年6月22日胡适在致杨联陞的信中谈到培养人才的计划:

我去冬在台北时,有一天,蒋孟麟兄约了台大、中研院七八个朋友谈话,说有一位朋友曾对他说,哈燕学社颇想在台湾做点有益于学术(文史方面)的事,所以他(蒋)约我们谈谈。谈的结果,由沈刚伯、刘崇宏两先生起草,把意思归纳成几条,大致是希望哈燕学社与台大、中研史语所发生“人的交换”,每年有二三人从哈佛到台北,利用史语所的资料,做点研究,同时也可以给台大带点“新血”、“新力”去;同时每年由哈燕社资助一两位“自由中国”的文史学者出来到哈佛作一二年的研究,使他们可以得点“脱胎换骨”的新空气、新生命。^①

而这些机会对于学人与学术而言,又是何等的珍贵而重要啊。

^①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93。

——| 第四章 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的功能研究

无论是从学术传播的研究角度,还是从论学书信的内容分析,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功能之上。那么,论学书信具有哪些功能?其信息传播、学术组织及情感功能又是如何在书信论学中发挥作用的,这是笔者所要探索的,也是之前对书信研究的空白点,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节 论学书信的信息传播功能

一、论学书信与学术交流

信息传播是书信的基本功能,也是论学书信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前文已经有很多例子,现代学人通过论学书信来进行学术信息的传递、学术争论,进而直接促成学术成果的诞生或完善。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中国,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图书馆尚未普遍设立、学术期

刊尚未普遍发行之前,学术资讯与学者研究成果的传播,的确受到很大的限制,往往仅及于学者居住地域与人际网络所能到达的范围。学术交流的方式,主要以登门造访、函札往来、著述刊布等传播方式进行,论学书信是重要的获取信息、信息传播的工具与媒介。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例,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当时北京大学国学门的主事者有着绝大的差异,但也一度和国学门建立学术上的联系,在1922年分别允任国学门通信员^①,希望与外界“通声气”,足证闭门著述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二、与国外学者的论学书信

本节拟从现代学人与国外学者的论学书信中分析论学书信的信息传播功能。与国外学者书信论学,这是现代学人的前辈们很少经历过的事情,但并非没有先例。例如清代学者俞樾^②的尺牋中就有写给日本人的论学书札,《致日本国僧小雨上人》中对日本诗集一百七十家提出了具体的编选意见,“鄙意选诗当以人分,不以体分,每人选刻古今体诗若干首,略以时代先后为次,既有所寄,年契一册,当不至颠倒后先。但仆披览未周,不知各集中,均有年号可考否?若圈点评语,古书所无。中华自前明以来,盛行时文,乃以房社体例,变古书面目,为识者所嗤,鄙意似可不必。不如每人之下,就其全集中,或评论其生平,或摘录其未选之佳句,使读者因一斑而窥全豹。且于论世知

^① “通信员”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给予住在北京之外或国学学者的名目,主要是对国学门的发展提出建议,担任类似顾问的角色。

^②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曾讲学诂经精舍。治经、子、小学外,擅诗词,重视小说戏曲,著作甚多,著有《春在堂全书》。其书札有《春在堂尺牋》,台湾文海出版社本。

人,不为无补,请与吟香居士酌之。”^①意见中肯,可操作性强,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步骤。而在《致日本人竹添进一》中提到,应日本友人之请,撰《东瀛诗选》44卷。针对其“来书云,崇论閎议,非时流所及梦见,以西法盛行,欲修周孔之遗法以胜之”的观点,发表了自己对于时政的观点,“鄙意则谓居今之世,只须《孟子》七篇,便是救时良药。”^②用诸子的智慧为时政开药方,不失学人本色。

与前辈学人相比,现代学人与国外学者书信论学的例子就丰富多了。我们同时可以注意到,现代学人与日本学者的关系相当密切,例如王国维、胡适等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与日本汉学家们都有着书信往来,学术成果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例如王国维1920年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9期发表论文《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讨论敦煌文学资料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他文中的大部分资料,是由日本学者狩野直喜等人提供的,这其中也包括狩野本人的文章。^③曾到日本访求图书并进行研究的孙楷第在写于1934年的《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所列的9篇参考文献中,日本学者撰写的就有6篇,分别是盐谷温的《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关于明代小说〈三言〉》、《宋明小说传流表》,长泽规矩也的《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辛岛骁的《警世通言三种》,丰田穰的《明刊四十卷本〈拍案惊奇〉及〈水浒传传评林〉完本出现》,可见当时日本学者的研究风气、方法及材料都深深影响着中国学人。

① 俞樾.致日本国僧小雨上人.邓逸梅,陈左高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书信日记卷1.上海:上海书店,1992:37.

② 俞樾.致日本人竹添进一.邓逸梅,陈左高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书信日记卷1.上海:上海书店,1992:38.

③ 严绍璦.日本中国学史:19世纪60年代—20世纪40年代中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384—385.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中日的社会文化、学术思潮都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过程,这在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对清代学术的扬弃,研究材料的扩充等;同时中日学术在材料、方法、内容等方面的亲缘性也使中国学者容易接受日本学术的影响。而这一过程并不完全同步,大致而言,在以西方的材料方法和学术观念研究中国文化方面,日本要先行一步,这种过程的相似使频繁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成为可能,而时间上的落差,也更容易刺激中国学者对日本学者的奋起直追。^① 1921年6月胡适在《〈水浒传〉后考》^②一文结尾有这么一段话:

青木先生又借给我第一卷第五期《艺文》杂志(明治43年4月),内有日本帝国大学狩野直喜先生的《水浒传与支那戏曲》一篇。狩野先生用的材料——从《宣和遗事》到元明的戏曲——差不多完全与我用的材料相同。他的结论是:“或者在大《水浒传》之前,恐怕还有许多小《水浒传》,渐渐积累起来,后来成为像现在的《水浒传》。……我们根据这种理由一定要把现在的《水浒传》出现的时代移后。”这个结论也和我的《〈水浒传〉考证》的结论相同。这种不约而同的引证使我非常高兴。

中日著名大学的教授一先一后于“历史演进法”对《水浒传》作了考证,表明于正统经典的考证之法与新的文学观念已经融合,受这种风气的影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珍本戏曲小说不断地被发现,以此发

^① 徐雁平.近代中日学术交流考论:以胡适与青木正儿为中心.汉学研究,2002,20(2):86。

^② 胡适.《水浒传》后考,1921年6月11日.胡适文存.合肥:黄山书社,1996,412。

现为基础的论文也纷纷问世。

胡适在他积极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中反复强调,治国学必须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借鉴欧美日本学术界的的成绩。如“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①。正是因为这开放、积极的学术交流心态,促成了他与当时日本学者的书信论学佳话。

这其中,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胡适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之间的书信论学。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科的第一届学生,在近代日本中国学的谱系中,尤其是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狩野直喜一系最为引人注目。严绍璦称日本近代中国学中最具价值的研究成果来自于“实证主义学派”,狩野一系是此中代表,他们“师生三代对中国文化史(含文学)业绩至巨至大。”青木与胡适的书信往来不仅限于资料的搜集与交流,还牵涉到更多的中日学术界的人和事。关于他们的书信往来在《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中选取了12通,《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中有耿云志整理的《胡适与青木正儿来往书信27通》,徐雁平根据27通来信整理了《胡适与青木正儿论学书信提要》,相当详细地描述了他们之间书信论学的情况,特引如下^②。

①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

② 徐雁平.近代中日学术交流考论:以胡适与青木正儿为中心.汉学研究,2002,20(2):94—95。

胡适致青木	1920. 9. 25	对青木寄赠《支那学》一卷一号表示谢意
青木致胡适	1920. 10. 1	表示对文学革命的浓厚兴趣
青木致胡适	1920. 10. 26	寄赠《金冬心之艺术》《品梅记》
胡适致青木	1920. 11. 11	告知将两册《支那学》借给周氏兄弟,认为青木叙述文学革命运动取材确当,见解平允
胡适致青木	1920. 11. 18	告诉青木《金冬心之艺术》中所引用诗句读有误
青木致胡适	1920. 11. 20	谢胡适所寄《尝试集》,并告知狩野已读《水浒传考证》
青木致胡适	1920. 11. 28	告知即将刊出的《本邦支那学革新的第一步》一文大意
胡适致青木	1920. 12. 14	请青木在日本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九经通论》《庸言录》,求内藤《章实斋年谱》并所藏钞本《章氏遗书》目录,以及狩野的《水滸考》。并寄赠《儒林外史》
青木致胡适	1920. 12. 17	请胡适为《支那学》写稿,并议将其办成“一个打破国境的学术杂志”
青木致胡适	1920. 12. 21	答应问内藤关于《章氏遗书》的事
青木致胡适	1920. 12. 21	收到《儒林外史》,佩服胡适所写的《吴敬梓传》
胡适致青木	1920. 12. 24	赞成将《支那学》变成“打破国境”的杂志
青木致胡适	1920. 12. 25	告知《古今伪书考》可求,而《九经通论》、《庸言录》无人知晓,请胡适查考日本正德享宝时冈岛璞所学的中国话是何种方言,又提及冈岛璞曾翻译《水浒传》等书
胡适致青木	1921. 1. 24	请青木求冈岛璞训点刊布《水浒传》,并望购买日本《水浒传》。告知浙江图书馆印《章氏遗书》,并拟做《吴敬梓新传》
青木致胡适	1921. 1. 27	告知抄好内藤的《章氏遗书》目录,又请胡适觅抄沈曾桐藏《章氏遗书》目录给内藤
青木致胡适	1921. 1. 29	告知《支那学》同人藏有《诗经通论》
胡适致青木	1921. 2. 3	给青木抄录《章氏遗书》内藤本比自藏多出的篇目,并请青木找其《礼教》《所见》的两篇原文。
胡适致青木	1921. 2. 4	已请人翻译内藤《章实斋年谱》,并订正其中几处错误,准备让顾颉刚整理《东壁遗书》
胡适致青木	1921. 2. 8	感谢青木寄赠《忠义水浒传》二册,并请他访求一部百二十回的《水浒传全书》和百十回的《忠义水浒传》,准备为《水浒传》做一可靠的考证

续表

胡适致青木	1920. 9. 25	对青木寄赠《支那学》一卷一号表示谢意
青木致胡适	1921. 2. 17	感谢胡适寄赠新印的《章氏遗书》，并告知《东壁遗书》及百二十回本《水浒》虽经过访求，但未能得到
青木致胡适	1921. 3. 15	告知寄上《支那学》二月号并《艺文》（上有狩野《水浒传》考证文），自己借览姚氏《诗经通论》，并访求其《好古堂家藏书画记》
青木致胡适	1921. 3. 20	感谢胡适所寄《英雄谱》，并拟以此与《合刻水浒三国全传》比较
青木致胡适	1921. 4. 8	得知所抄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凡例有益于胡适的考证，高兴至极。并答应访求冈岛璞《水浒传》译本，拟做《水浒》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影响。又告知神田喜一郎的《四部丛刊底本论》在中国有意外反响，神田很高兴
青木致胡适	1921. 4. 17	感谢胡适所寄《章氏遗书》
胡适致青木	1921. 5. 19	告知收到百十回本《水浒传》校记及《忠义水浒传》译本。认为青木考定百十回本《英雄谱》为明末刻本大概不错
青木致胡适	1921. 6. 1	感谢胡适所寄《红楼梦》，并告知狩野曾用英语做过《水浒传考证》，并拟在《支那学》上介绍胡适的考据文章。告知狩野推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精核，并拟寄上狩野的英文论文《红楼梦考证》
青木致胡适	1922. 2. 17	感谢胡适所寄《胡适文存》一集，想替胡适访求一部影印本《唐三藏取经诗话》，未得。寄赠日本古代白话小说《海外奇谈》

这些信将两人的学术兴趣、交往一一道来，让人读来，如沐春风。而信件中所描绘的中日学术界的交流情况也是我所关注的。书信不仅帮助他们传递搜求资料的信息，而且也为他们创造了学术交流的机会，再现了当时中日学术交流积极友好的情形。如青木在得知胡适有到日本“观内府的百回本”的打算时，立刻表示“这个不难，那时我也要请帝国大学二三教授的帮助，替你介绍内阁当局者”，也表示出“一游禹域”的想法，并“无奈没有因缘”。同封信中还提到“神田君的《〈四部丛刊〉底本论》意外有反响，他非常欢喜了；企图是你促成这

反应(reaction)的。我要写信给他知道这个原由。这等事我也替学界很欢喜”,这已经将两人之间的论学往来扩展到中日学术界,并试图创造更多学术机会,提高学术质量,推动学术发展。他们将《支那学》办成“打破国境”的杂志,正是他们这一学术理想的体现。

书信传递着珍贵的信息,包蕴着情感,为学者治学提供了切实的帮助。通过青木的来信,胡适对日本学界的进展增加不少了解。并且由于青木正儿寄来日本期刊《支那学》,胡适才注意到内藤湖南撰写的《章实斋年谱》,由此萌生研究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念头。并将《中国学报》上所刊出的新材料以及《年谱》中的几处错误托青木转告内藤。1922年1月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他托姚名达增补,到1931年再版,已经有7万多字,大大超过内藤之作。由于日本学者内藤的倡导,以及胡适的深入拓展,章学诚的思想很快就成为学术界众人关注的题目,以至于“北京大学招生,有投考者必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一条”^①,可见当时中日学术界互相影响之风气,这也是现代学人书信论学的功能体现之一。

胡适对青木正儿的帮助在《〈水浒传〉后考》一文结尾处曾深表感谢:

这十个月以来发现的新材料居然正式了我的几个大胆的假设,这自然是我欢喜的。但我更欢喜的,是我假定的那些结论之中有几个误点,现在有了新材料的帮助,居然都得着有价值的纠正。[略]我最感谢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他把我搜求《水浒》材料的事看做是他自己的事一样;他对于《水浒》的热心,真使我十

^① 钱穆.记钞本章氏遗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8):281。

分感激。如果中国爱读《水浒》的人都能像青木先生那样热心，这个《水浒》问题不日就可以解决了。

这种学术增益也是相互的。青木正儿在为胡适访求资料时，他的学术兴趣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胡适的影响。胡适在1961年4月16日与胡颂平的谈话中提及他与日本战前汉学界的关系，胡颂平的记录是：“‘支那学’的中心人物内藤湖南，当年受了先生的影响最大；那时年轻一辈的如神田、青木等人，现在也有六十多岁，都是早已成名了。这‘支那学’一派完全受了先生的影响。”^①如青木正儿在看完胡适的《吴敬梓传》（1920年11月），准备以此为素材，写一篇以乾隆时代扬州为背景的小说；他替胡适访求姚际恒著作时，也“借览姚氏《诗经通论》，又访求他的《好古堂家藏书画记》；他不但是一个怀疑的学究，并且这等趣味的人则我尤为尊崇的。”^②青木正儿在1921年5月发表的《〈水浒传〉在日本文学史上的传播和影响》一文的篇首提到狩野和胡适的文章，并对胡适考证之精密大加赞赏，在文中也谈到胡适正在进行的《〈水浒传〉后考》的工作。^③针对胡适指出青木正儿所著《金冬心之艺术》中《双禽曲》等三首诗词的句读之误，这对青木正儿的触动很大，他认为“我们日本人的读书法，把中国文牵强日本的文法，音韵不谐的。因为这个原故，我们所求支那学的时候，不便不少，就中研究韵文为尤甚。……我们应该废弃这个偶像，学习今日中国

① 胡颂平.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149.

② 青木正儿致胡适函(1921年3月15日). 见耿云志. 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 胡适研究丛刊, 第一辑. 北京大学, 1995: 325.

③ 转引自徐雁平. 近代中日学术交流考论: 以胡适与青木正儿为中心. 汉学研究, 2002, 20(2): 96.

的音读法;否则我们的读书力,进步不可企及;这是日本支那学者流的第一步。”^①这一论点的展开论述,就是青木正儿发表在《支那学》第1卷第5号(1921年1月)上的《本邦支那学革新的第一步》。因此,徐雁平在《近代中日学术交流考论:以胡适与青木正儿为中心》中将青木正儿定义为“二十年代初中日学术交流的媒介人物”,相当有见地,并从他们的论学书信中得出结论,“落到实处来说,胡适与日本学界交流也主要是有以书信为主,而且最有成效”^②。因为在1927年4月,胡适在从美洲返回的途中在日本停留了20多天,也会见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一些学者,但行色匆匆,另外语言不通,所以交流效果并不理想,对比而言,书信论学确实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中日学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当然不只限于胡适一人,在王国维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给铃木虎雄、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神田喜一郎等日本汉学家的多通来信。王国维对当时日本学界的影响也相当大,日本学者盐谷温在所著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说:“近年中国本国也曲学勃兴,曲话及传奇的刊行不少。……尤其是王氏有《戏曲考源》、《曲录》、《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有益的著述。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六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对于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的研究吐卓学,或竞先鞭于名曲底介绍与翻译,呈万马骈镳而驰骋的盛观”。^③ 王国维的信用文言,篇幅一般较短,不过也

① 青木正儿致胡适函(1920年11月28日),见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1995:309。

② 徐雁平.近代中日学术交流考论:以胡适与青木正儿为中心.汉学研究,2002,20(2):98。

③ 转引自袁世英,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78。

为我们描绘了他与日本学者往来的情形。书信中的内容多半涉及互赠论文、书籍、代访、代抄材料、析疑解难等学术交往,在与铃木虎雄的信中多次提到与日本学者的诗歌酬唱,“狩野先生欧洲之行,本拟作五排送之,得数韵后颇觉不工,故改作七古,昨已脱稿,兹录呈请教,”^①之后铃木虎雄还索其诗稿,想在杂志上发表。王评价铃木虎雄的《哀将军曲》,“悲壮淋漓,得古乐府妙处。虽微以直率为嫌,而真气自不可掩。贵邦汉诗中实未见此作也”^②,并将所作《蜀道难》一首与之交流。后来铃木虎雄在《追忆王静庵》一文中这样描述这段诗歌酬唱的经历,“王君寓居京都时期,示余诗篇甚多,刊载于《艺文》杂志上。又君本身删定当时诸作,以古木活字刊《壬癸集》。《颐和园词》虽君自书,然实由罗氏影印行世者”^③。

王国维回国后,在担任南书房行走之职即将北上之时还写信给神田喜一郎,告知他重要的学术信息,“洛阳近出魏三体石经,一石有一千八百余字,即黄县丁氏所藏残石之上半。此事于经学、小学关系至大,现拓本当不易得,谨以奉闻”^④。在1926年中写给神田喜一郎的几通书信则主要是托他代购那珂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并将自著《鞑靼考》赠送给他,也帮神田喜一郎寻找、影印他所需要的书籍。信中还解答了神田喜一郎提出的关于魏延昌四年诏书中“远傍惠康”之意。他们书信交流频繁,中华书局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卷》收

① 致铃木虎雄,1912年9月27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1。

② 致铃木虎雄,1912年12月19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2。

③ 袁世英,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80。

④ 致神田喜一郎,1923年5月11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48。

录 1925—1927 年间王国维写给神田喜一郎 10 通书信,往来书信那就更多了。他在 1926 年 9 月 14 日写给神田喜一郎的信中还特别提及想买日本的学术期刊,“贵国杂志如《文学杂志》、《东洋学报》现在尚可设法购一全份否?如有全份,则需价若干,祈于便中见示”^①,通过学术期刊了解当时的日本学术界,是王国维,也应是当时学人的共识了。前文提到的创刊于 1920 年 9 月的“有意打破国境”《支那学》杂志,就刊载不少学者的文章,例如王国维、罗振玉、吴虞、孙人和、胡玉缙等的论文。几乎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刊物上也登载了由外国学者撰写或编辑的论文、通信及书目。作者包括日本的内藤湖南、桑原鹭藏、狩野直喜、原田淑人等。

与胡适不同,王国维与日本汉学家们的交流方式更多采用见面的晤谈。因为王国维懂日语,进行过翻译,另外又有在日本居住、治学的经历,更因为王国维的日语老师藤田丰八博士(中日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人物)与罗振玉的原因,他与日本汉学家们的交流就更多。狩野直喜就曾回忆过他们 1910 年在北京的见面,“明治 43 年左右,据闻敦煌发现的遗书,运到前清新设的学部保管,我国京都大学的内藤虎次郎、小川涿治、滨田耕作、富冈谦藏诸君,奉命共赴北京调查。……(略)当时王静安君也在农科大学做职员,为我们一行照顾不少。适其时我也想研究元代戏曲,已在京都大学讲授元的杂剧,恰好王静安君也和我的研究相同,他已著有《曲录》及《戏曲考源》等书,因此我利用旅居北京之便,常与王君晤面,听取他对元代杂剧研究的

^① 致神田喜一郎,1926 年 9 月 14 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442。

心得。很有意义。”^①前文所提到的青木正儿也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说记录了数次与王国维的见面与谈话,“明治45年(1912年)2月,余始谒王先生于京都田中村侨寓”,并将这次见面中他的感受记录如下,“……极欲向先生有所就教,然先生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且此时先生之学将趋金石古史,渐倦于戏曲。余年少气锐,妄目先生为迂,往来一二次即止。遂不叩其蕴蓄,于今悔之。”年轻气盛的青木与研究兴趣已经转变至历史及考据学的王国维之形象无不栩栩。1925年春,青木到北京求学之初就到清华园拜谒王国维,青木形象地将这次对话记录如下,“先生问余曰:‘此次游学欲专攻何物欤?’对曰:‘欲观戏剧,宋元之戏曲史,虽有先生名著,明以后尚无人著手,晚生愿致微力于此!’先生冷然曰:‘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余默然无以对。”青木颇感不服,“噫!明清之曲为先生所唾弃,然谈戏曲者,岂可缺缺哉!”

铃木虎雄也在《追忆王静庵》一文中将他们之间频密的学术交往记录如下:“君寓居京都田中村时,正值其整理戏曲研究。我当时亦起戏曲研究之念,乃屡屡叩君门,聆受君教。为了习练,尝试圈点高则诚之《琵琶记》,难解之处,时时乞君指教。……君当时已将《古剧脚色考》刊载于《国学丛刊》,我将此文译载于《艺文》杂志,此所发表仅为其研究的一部分。君之研究,当时已甚广泛,后来《宋元戏曲史》于上海出版,《简牍检署考》余亦译载于《艺文》。正如内藤湖南翁谈话所说,王君精读《十三经注疏》,君又就与君同时来寓京都之罗叔言振玉氏研究龟甲文字,几乎每日赴罗氏处。余自君处得启蒙之利,不只限

^① 艺文,第18年第8号,1910年8月,转引自袁世英,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62。

于戏曲一事,其他如有关书籍,清朝掌故,社会风俗,日常琐事等等,无遑枚举。”^①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王国维在京都时的研究工作情况,更将与日本学人的交往勾勒出来。

综上所述,中日学者利用多种方式积极推动学术交流,留学、书信、互通材料与信息、利用学术期刊,双方的学术交流得以发展、巩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不断地扩大研究范围,更新研究方法,例如罗振玉对林泰辅(日本学者)甲骨文研究的推赏,以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内藤湖南的启示都推动了中日的学术交流。

以上是中日学术交流为例,讨论学人书信的信息传播功能。在现代学术研究跨越国界、语言限制的交流环境中,中国学人与外界的接触、交流是全方位的,同时,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也相当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另一重要人物是罗振玉,他是当时的中国学者中,与欧洲和日本东方学界来往的最为频繁的人。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通过他转赠给国学门相关的书籍,1921年冬,他被法兰西学院授予考古通信员职称。罗振玉是第一位对敦煌文书作出介绍与研究的中国学者,同时他与王国维对中国境内各种新出土的古代文物,如安阳甲骨、流沙坠简,都设法搜集与刊印,并进行考释,其研究成果深受欧洲及日本学者的认可。

1931年,由当时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员会决议,由世界文人思想领袖,交换函札,讨论今日文化中心问题。所邀请者如德国的 Thomas Mann、法国的 Paul de Valery 等。1932年,蔡元培收到巴黎文化合作院(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主任班纳(Bonnet)来信,请提出问题研究,蔡元培就写信介绍了中国文化与外

^① 袁世英,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80。

来文化的交流史,如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和,介绍了中国现代学术界的变化,并表达了与西方交流文化的愿望,“要之,鉴于世界未曾解决之问题,尚复甚多,而愿与欧美学者共负一部分之责任,则中国知识阶级公有之大愿也。鄙人谨敢代表中国知识阶级,敬谢先生合作之提议,而贡其深愿合作之诚意,幸先生及合作社诸君子垂鉴焉。”^①之后,在1933年初,蔡元培又收到国联文化合作委员会主席麦雷教授的来函,谈到现代文化之湮灭及战争之危机。由该委员会发起这些通信后来结集出版,其中一册就是蔡元培、麦雷 Herri Focillon、Paul de Valery、S. de Madriaga、Ozorio de Almeida、Alfonso Reyes 之通信^②,可见当时国际学术界对于学术交流的重视,对于书信这一交流、传播工具的应用,是为一例,以补充上文。

第二节 论学书信的学术组织功能

在论学书信的信息传播功能之外,论学书信是否具有一定学术组织功能?这个想法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一直隐约浮现,在翻阅现代学人书信集的时候,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他们的书信当中往往都有推荐教职这样类型的信件。如何理解这样的信件?是单纯的人情世故吗?这其中是否涉及一个大学的教学资源设置的问题?另外,在学术交流活动中,学术期刊的约稿信,学者以信件形式所撰写的著作与论文,甚至有些刊物的通信栏目(尤以《新青年》为突出)本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299。

② 参见林语堂译麦雷致蔡元培来信之附志.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299。

身就是学术观点的宣传地,面向公众的学者园地,这些书信对于当时学术界所起的作用相当大,负载的功能也相当丰富,恐怕不能简单地概括以信息传播,笔者认为它们还担负着对学术资源进行配置,对学术讨论进行组织、对学术事件积极参与的功能。这里也想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呈现,以期抛砖引玉,还望方家指正。

一、论学书信与大学

有关大学的论文书信多与大学事务有关,也反映出现代学人与大学密切的关系。大学的出现,在中国学术史上无疑是个大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援引蔡元培写给当时国联文化合作院主任班纳的信中将当时中国的学制及学术机构设置描述为,“中国旧有之学官及书院,本为考取较为高等之学者,而予以专门研究之机会。惟偏于哲学、文学及政治学耳。及采取欧美方式而为新学制,则以小学及初级中学为普及常识之机关;而自高中至大学,则为养成专门人材之机关;然为培养创造之人才起见,于大学中设有研究院,以备大学教授与毕业生之研究;而更由中央政府设立中央研究院,以备学者之自由研究;其中一方面以世界公用之方法研究世界公有之问题,冀有普通之贡献;一方面则用中国固有之方法,参用欧美最新之方法,就中国特有之材料而研究之,以冀有特殊之贡献。”^①

1. 推荐教职

推荐教职的信件在现代学人的书信中非常普遍,这与当时大学的聘用制度有关。当时大学的教师是由学校聘请。大学主事者的胆识与能力往往体现在对教师的聘请上。例如蔡元培为改革北京大学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299。

的文科,先后聘请一批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者以削弱顽固守旧势力的影响。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同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于不称职的教师,蔡元培大刀阔斧地裁减,曾有一名被裁撤的法国教员为此提出控告,蔡元培则委托王宠惠出庭,指出解聘理由都按合同上的条件办的,对方败诉。经过调整后的北大教师,“据1918年的统计,全校二百多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甚至有二十六七岁的教授。”^①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认识蔡元培,而是蔡从他们的学术论著中发现真才实学,或是经人推荐的。蔡元培决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也是经当时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的推荐,他回忆说,“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果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②

除了上文提到的当面推荐之外,推荐信也是大学聘请教员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北京大学文学系任教的沈尹默曾连致几函给当时在辅仁大学主事的陈垣推荐人选。“兹有友人王相伯君托为转呈所著书一部,幸赐收入。此君意欲在辅大谋一教书位置,不知有法可想否?”^③“兹有一事奉恳: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生钱王倬君,前在南开大学讲授国文,颇著成绩。兹因事离津来平,特为介绍,能在辅仁大学为觅一位置否?”^④大学主事者在物色教授、教员的时候很看重推荐的资历与分量,而推荐者也往往十分慎重地推荐,一旦推荐的人选表现

① 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22。

②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349。

③④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35。

不尽如人意,多少有些难为情,有点学术“连坐”的味道。这一用人制度与现在的考核制度相比,也有其独到之处。

台静农在《辅仁大学创校点滴》一文中说:“这一新兴的大学,主要教授多未从其他大学物色,而是从大学范围以外罗致来的。因为援庵先生居北平久,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也就将他们推荐出来。”例如经由陈垣推荐至辅仁任教的余嘉锡,之后任国文系主任,博学严谨,著作颇丰。而陈垣本人与余嘉锡的学术交往也很多,他在1962年11月为《余嘉锡论学杂著》所作序言中说:“季豫先生1927年入京,不久他就来看我,我们谈起彼此治学的经过,各有甘苦,颇能契合。后来他到辅仁大学中文系任教,见面的机会较多,研史论学,互有启发,每谈至深夜,不知疲倦。抗日战争期间,论学诸友纷纷离京南下,能谈者渐少。余与先生同在一校工作,又同住一街为邻,早晚相见,来往就更多了一些。”可见推荐人选并非客套应酬,而是知人之举。如陈垣对岑仲勉的推荐,当时岑在广州圣心中学任教,在校刊《圣心季刊》上发表文章,寄给从未会面的陈垣十部,并在1933年12月6日函中说:“故都贵僚好有不视为纸麓中物者,望为分致。”陈当即分寄给陈寅恪、傅斯年等人。12月17日,陈寅恪就有信致陈垣:

久未承教,渴念无已。岑君文读论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寅近作短文数篇,俟写清后呈正。所论至浅陋,不足言著述也。

12月20日,陈垣将此函寄予岑仲勉,这是多么大的鼓励。岑在次年1月22日复信中说:“奉十二月二十日惠书,夹陈君寅恪手缄,奖

誉备至,惭汗交并。”傅斯年也在2月17日复信说:“承赐《圣心季刊》,至佩。其第一册犹可求得乎?岑君僻处于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以此为契机,岑后来进入史语所。^①

在这些推荐信当中,怜才、希才之情溢于言表。例如朱希祖在1933年9月2日来函^②中言辞恳切:

援庵先生左右:

此次来平,辱承宠燕,不胜感谢。北大旧史学系旧毕业生谢兴尧^③君,专研究太平天国史,颇有心得。前数年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学系任明清史讲师,今因女院裁减课程,因此无事,不能维持生活。闻辅仁大学明清史尚未有人担任,谢君尚堪承乏,敢请鼎力扶植,成全后进好学之忱,不啻身受。诚心好学,专精研究者,当世甚乏其人。萌芽摧折,诚不忍坐视,故敢冒昧进言,伏祈原宥。

专此,敬颂道安。

弟朱希祖敬上。“民国”廿二年九月二日

信中将其学术背景、工作经历、生活现状等一一介绍,并请陈垣

① 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陈智超自选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167。

②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32。

③ 谢兴尧(1906—2006)出生于四川,1927年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1931年,他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北平女子第一中学、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等处教学。他在太平天国史方面的研究造诣颇深。在他的回忆中相当怀念北大的生活,在北大的六七年,虽然像坐冷板凳,但却是讲自由民主、讲科学研究,进行独立思考的黄金时段。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堪隐斋杂著》、《堪隐斋随笔》等书中,收录了《自传》、《沙滩马神庙》、《红楼一角》等文字,生动地描述了北大生活,相信他也一定难忘朱希祖先生对他的大力推荐与提携。

多加照顾,“成全后进好学之忱”。他不忍坐视“萌芽摧折”的师者之心,诚如父母心,令人感佩。

有时这种人员的推荐与流动也是大规模的。例如1927年中山大学进行改组,由校长制改为委员制,以戴传贤出任委员长,顾孟余任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朱家骅几位任委员。顾孟余和朱家骅此前均为北京大学教授,有意将离京的学者请到中大。所以在9月底邀孙伏园到广州办报,10月间又电请沈兼士、林语堂、周树人三位前来指导改革事宜^①。同年,朱家骅又聘请留学欧洲归国的傅斯年出任文学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傅与朱商议,希望把北大的优秀教授一一罗致到中大。1927年5月16日,朱、傅致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的信上^②,就说明了他们这一构想:

我们……筹一齐聘北大文理等科之良教授来此。既可免于受压迫,并开此地空气。已去请者,有马叔平、李玄伯、丁山、魏建功、刘半农、周作人、李圣章、徐旭生、李润章诸先生。并请一切被压迫之同学来……

1927年夏,中大便曾发电报邀请沈兼士、沈士远、沈尹默、马裕藻、马衡、朱希祖、陈大齐、鲁迅到中大。傅斯年尤极力敦促胡适到中大任教。一方面希望凭借中大充裕的经费,为这些在北京遭受政治

①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135—157。结果仅孙一人先至,周树人一年之后才动身,而沈兼士、林语堂则各自因北大与厦大事务没有成行。

② 朱家骅、傅斯年1927年5月16日致李石曾、吴稚晖书,《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7):102。

压迫的学者谋出路；一方面也想把中大建设成中国南方的学术中心，继承北大的学风，开当地之学术风气。虽然这些成名学者中只有鲁迅在1926年上半年曾于中大短期任教外，其余应聘的都是年轻一辈学人，包括顾颉刚、丁山、容肇祖、罗常培、董作宾、商承祚、罗庸、余永梁、杨成志等。尤其是1927年秋，中大决定成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由傅斯年担任该所筹备主任后，北大年轻一辈的学者纷纷集中到这所新兴的学术研究机构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学术机构与学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书信与电文为这次学术人力资源的迁徙留下了历史的证据。主事者的规划与设想，学人的流动对于当时的学术研究影响相当深远。

而另一封陈寅恪先生请辞^①的书札，又可见其学人之本色，读后相当感动。信是写给傅斯年的，说明了他决计不南行的原因，因为不愿意请假耽误学生的授课，上课之前也需要预备功课数日，可见教风之严谨。特将傅处所寄来的川资退回，并不愿意以“史语所第一级主任”的名义领取薪水，愿意担任“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任何报酬，可见学人的高风亮节。

孟真兄左右：

手示敬悉。所以稽迟未即奉复者，以尚未决计南行与否故也。今决计不南行，特陈其理由如下：清华今年无春假，若南行必请假两礼拜，在他人，一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统合计之，非将至三礼拜不可也。初意学生或有罢课之举，则免得多请数日之假，岂知竟不然，但此一点犹不

^① 陈寅恪集·书信卷，上海：三联书店，2001：50—51。

甚关重要。别有一点,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见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印象之劣,故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亦尚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且开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弟觉此次南行亦尚有请假之理由,然若请至逾二星期之久,则太多矣,此所以踌躇久之然后决定也。院中所寄来之川资贰佰元,容后交银行或邮局汇还。又弟史语所第一级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遥领,致内疚神明,请即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于此也。所欲言者尚多,特先约略奉复,即希鉴谅,并代候诸公,至深感幸。敬叩

撰安

弟寅恪顿首(一九三六年)四月八日

2. 对大学事务提出意见与议论

在严复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明他对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的看法,“比者,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记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

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①,主张中学、西学各自发展,文科则纯为讲治旧学的场所。由于这样的办学思想,所以聘请的教员以旧学为主。聘请著名的桐城派文人姚永概为文科教务长,同时任教的还有林纾等人。因此当时的北大文科以桐城派为主,至章太炎弟子们开始进入北大任教,局面才为之改观。

在1902年王国维写给张之洞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②的信中,王国维明确地提出反对把经学置于各分科大学之首,他强调必须设置哲学一科,直言不讳地指出,由张之洞制定的分科大学的章程存在重大错误。他说:

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夫欧洲各国大学无不以神、哲、医、法四学为分科之基本。日本大学虽易哲学科为文科之名,然其文科之九科中,则哲学科裒然居首,而余八科无不以哲学概论、哲学史为其基本学科者。今经学科大学中虽附设理学一门,然其范围限于宋以后之哲学。

他的意见涉及大学的分科乃至现代学术的分类,尤其应予以注意。

对现代大学的具体校务,现代学人的参与更多。傅斯年在1921年致函北大校长蔡元培说:“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提供舆论者颇多,而提供学术者颇少。近代欧美之第一流大学,皆植根基于科学上,其专

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191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605。

②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36。

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乃中世纪之学院,今北大之科学成绩何若?颇是可以注意的。”^①这些都对办学方针及学校的事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见当时大学之风气。

周作人 1926 年 4 月 25 日致蔡元培函中,其中提及不少关于北大当时情况的意见,如“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在先生去国之时,不得不由同人勉力支撑,得过且过”,“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中,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之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②蔡元培收到此信后,在 5 月 15 日就写了回信,先感谢周作人之来信“语重心长,感荷无已”,之后解释了他不能北上的原因是因为胃病发作,医生禁止其长途旅行。而周作人信中所谈及之事,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1919 号,1926 年 5 月 28 日出版)的记者按,“总务长兼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自被选为教务长后,已请余文灿先生为总务长”。^③对于敦促蔡元培北上到北京大学主事的函电还有很多,有蒋梦麟、胡适等以个人名义所发的函电,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评议会、北京大学教职员等多方所发函电。

① 国内与国外求学问题(一),傅斯年先生致蔡子民先生论留学书,新教育,1921 年第 3—4 期合刊,转引自唐克军,傅斯年的大学理想与实践,高等教育研究,1999(2),88。

② 蔡元培全集,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67。

③ 蔡元培全集,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68。又根据《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一文,提出周作人该信是为责难蔡元培而写的公开信,发表于 4 月 30 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对于蒋事也属无中生有,因此 5 月 28 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才会有此记者按。在此之前的 5 月 19 日,周作人已经向北大校方提交了告假两年的声明函。这也是研究学人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的有趣史料。

现代学人这类参与大学事务管理的书信不在少数,笔者在阅读、研究时也在犹豫是否将其划定为论学书信。但大学是现代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学术环境更是学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将其归纳其中。

除了大学,学术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也是学人书信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向,欧美式的学术机构在各地纷纷成立,最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综合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反映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及社会组织正进行转化和重组,学术研究也出现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趋向。

我们以“大学院”为例,借以说明书信对于当时环境的反映。

蔡元培1926年10月8日复胡适函中对中国学术未来的发展勾勒,“北京国立各校将来终有统一之办法,若有一最高等之研究院(大学院),不分畛域,选各校一部分较优之教员为导师(自然可别延国内外学者),而选拔各校较优之毕业生为研究生,则调和之机,由此可启。鄙意若能由赔款而成立,正不必以狭义之北大之范围之。……时局若无新发展,北京政府殆无清明之望,此等研究学术机构,即不在北京,亦无不可,文化中心,人力可以移转之。”^①

不过这一关于“大学院”的想法,最后实施下来是建立了管理机构——大学院,而非学术机构了。经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决议,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在《大学院组织法》第一条中规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民国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在《提议设立大学院案》中,蔡元培说“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可见其性质。不过

^① 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88。

在《关于成立大学院答客问》中,蔡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于学术的理解,并非为稻粱谋,“此次各方学生,多有为生计来索位置者;然吾党之士当超出生活,以发展文化,增高智识为前提;谋生之术,非所愿闻云。”^①

正是在这种种热潮的推动下,在1928年至1937年,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经历了成就辉煌的十年。在这十年间,各种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蔡元培在30年代中旬回顾说:“十几年来,次第成立的有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最近有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研究部。各大学,如北京、清华、燕京等,亦往往设研究院;最近教育部且通令各大学建设研究机关。”^②可见研究机构之设立,在国内局势相对稳定、国际上学术竞争愈益激烈的情势下,已由少数人的提倡,进而成为政府大力支持下众多学者全力以赴的事业。

大学研究院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由教员开设各种研究项目,给大学毕业生以深造机会;独立研究院则主要供给学者以精研之地,让其从事学术研究。这些机构的成立,对学术研究所带来的整体积极影响,朱自清这样描述说:“战前的十年来,我们的学术确在长足的进步。中央研究院和一些大学的研究院的工作都渐渐有了分量。于是没有研究院的大学都纷纷设立研究院,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也或多或少在外国人资助之下办起来了。于是研究的风气盛极一时……知识或学术的估价算是到了最高峰……结果无论在人文科学或自然科

^① 关于成立大学院答客问.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138。

^② 蔡元培.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610。

学方面都有了新发展。”^①

二、论学书信与现代学术传媒

前文已经谈过由于现代学人积极参与到现代出版业当中,论学书信也反映出与现代学术传媒之间的密切关系。学术期刊的发行、学术书籍的出版都为学人提供了学术交流的空间,使分散在广大地域的学者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凝聚起来。尤其是学术期刊,能够组织、发起各个领域的不同问题进行讨论乃至辩论,大大推动了相关领域向前发展的速度与研究深度,对促成学术讨论风气的形成,以及推动学术的发展,的确可以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书信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用。

1923年4月间,顾颉刚在代胡适主编《读书杂志》时,曾写信给钱玄同,说明刊物与学术风气形成的关系。他说:“我很希望先生把辨伪的见解多多在《努力》上发表。《努力》销路很好,可以造成风气。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这大原故由于没什么发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辩论,和自己的勉励。如能由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②。这是一封约稿信,同时也是发起学术辩论的号角。顾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层累造成说”,胡适立刻给予支持,而钱玄同和傅斯年也作有力的回应,疑古思潮遂掀起波澜。当钱玄同和顾颉刚讨论古史的信函在《读书杂志》公开发表后,

^① 朱自清.论学术的空气.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4):491。

^② 顾颉刚1923年4月28日致钱玄同函.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3:82。

马上在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东南大学的一群学者也撰文与顾颉刚辩论,所谓的“古史辨”即由此揭开序幕。于此可得一例证。

顾颉刚的眼光非常敏锐,他参与过《新潮》的编辑工作,故深切了解到纸杂志在现代社会(包括学术界)所能产生的影响力;也认识到文章的发表与公开讨论,可以引起外界的注意,有助学术风气的形成和传播。

1923年10月胡适在一封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①以报纸杂志划分时代,可见媒体与时代的密切关系。以当时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例,以胡适为代表的学人们通过在南北各大专院校的演讲,以及各地报纸杂志、学术期刊、乃至论文集的转载,使“整理国故”的口号越来越为知识界熟知。当时主要的学术阵地有北大出版的《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等刊物,尤以《国学季刊》拥有最广大的销售网,不但北京各书市均有代售,而且全国十四个主要城市如上海、南京、广州、成都等地,都有该刊的代售处。这些代售处一般是书店、小型书报流通处和学校。此外,各省商务印书馆也负责代售这份期刊。外围阵地包括北京出版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晨报副镌》与《东方杂志》不但是京、沪两地知识分子常读的刊物,其销售网也遍及国内的各大城镇;借由这些报纸杂志作为媒介,整理国故的主张,得以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引起知识界广泛的注意,达到号召同志,以及向社会宣传的目的。

^① 胡适致高一涵等函(1923年10月9日),见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22。

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例,那里汇聚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他们深切认识到社会上新兴传播媒介的影响力,所以同人一面发行学术期刊,一面也利用报纸副刊及杂志,作为陈述其学术理念的外围阵地,且不时向社会大众公布和宣传国学门的学术主张和活动。结果是短短几年间,整理国故的工作即由北大学者的鼓吹,扩大成为全国无数学者共同努力的事业。“由此既可看出现代新式学术媒介出现后,学术研究及传播是如何一种崭新的方式进行;同时它也说明国学们当时确实有领导时代新学风的力量。学术刊物之销售网,与北京、上海地区报纸、杂志、出版社的发行网交织在一起,使得作为全国学术中心的北大得以与各省通声气,整理国故的主张也因此传播到各处,很快便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新学术运动。”^①

而在学术期刊当中,论学书信也起到了特有的作用。下面就以当时新文化运动之舆论先锋《新青年》为例来讨论。《新青年》中设立的“通信”栏目就是论学书信在期刊中得以应用的典型代表。其形式的变迁,内容的变化,发起的争论与探讨都值得我们注意。周策纵认为,《新青年》的“通信”一栏,“在许多方面成了中国杂志上第一个真正自由的公众论坛,许多重要的问题和思想都在这里得到认真的讨论和发展。”^②也有研究者利用哈贝马斯的理论,以《新青年》为例,也包括“通信”栏目,考察近代报刊民间化和政党化两种趋势,《新青年》“通信”栏目戏剧性的演变过程显示了近代报刊民间化和政党化的双重影响,从特定角度投影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公共空间”的伸缩历程,即中国近代以来“公共空间”既建构又解构的悖论性状况,使“现代性”

^① 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329。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93。

在中国语境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面目。^① 这些解析都相当有见地。

“通信”栏目是《新青年》中最长久的栏目之一,虽然杂志宗旨几经变化,编辑方针也发生过偏移,尤其是1920年夏迁回上海之后,《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内容改学术争论为政党主张宣扬,但“通信”栏目仍一直持续到第9卷。《新青年》杂志刚刚创办时(1915年9月,时名《青年杂志》),即按照当时杂志通行惯例,设“通信”一栏,以方便编读间的往来,并在创刊“社告”中特意说明:“本志特辟通信一栏,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一般而言,这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向读者提供相关的信息,或回复读者的咨询,并倾听读者的意见与建议,现在的很多期刊仍保留此类栏目,也是刊物与读者进行反馈与互动的重要渠道。因此,这栏目处理的只是读者的事务性“来信”;而至于“来稿”,则另有“投稿章程”的规定。第2卷更名为《新青年》后,更因要拓展稿源而设立“读者论坛”栏目。这两卷中,每一号的来信并不多,且多为事务性的咨询,如上海有无合适的外文学校,能否买到某一学科的入门书籍,甚至如何进行身体保健等等,杂乱而琐屑。只要与“青年”相关,一系列问题就接踵而至,没有特别的“理论思考”。比如读者程师葛的来信(2卷1号),我们今天读来会觉得十分有趣,他因见“通信”栏“为读者析疑解难之助”,而列出六条疑问,询问如何解决“德育与智育不并立”,中国是否适宜提倡德国军国主义,写实主义文学能否树立“高尚之思想”;

^① 参见刘震,《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79—83。

同时也询问是否将来人类“男女平均 25 岁即死”,以及催眠术是怎么回事等,但是记者对此认真地逐条回答。

这与初期《新青年》本身的办刊宗旨,尤其与它当时在文化界籍籍无名的地位相关^①。最重要的来信,大约当数读者张永言对发表于 1 卷 3 号的陈独秀文章《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的反应。1 卷 4 号、6 号刊载了张永言的两封来信,就陈独秀关于文艺四“主义”的演进提问,并联系到中国的文学状况。不过陈独秀的答复比较简单,并未在回信中就文学进化问题大加阐扬,更没有以此为机缘策动相关的学术讨论。虽然这个时期的“通信”未能成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的园地,但其事务咨询的功能,倒也与既“改造青年之思想”又“辅导青年之修养”的刊物宗旨颇为相符,更重要的是编者、读者之间平等开放的交流形式已经确定下来。

第 2 卷之后,随着《新青年》的声名鹊起,“通信”栏也随之日渐活跃。来信明显增多,通信的内容不仅更趋丰富,而且持论愈发尖锐;相应地,记者对于来信的答复也更加深入,并因此不断鼓动更多的质询,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编读之间就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你问我答,而逐步形成多回合的、重交流的研究讨论。“尤其是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开始成为《新青年》杂志核心内容,并逐渐扩大在知识界的影响进程中,“通信”一栏更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之势,“通信”栏目的活跃也在很大程度上构筑了《新青年》杂志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激

^① 《青年杂志》1 卷 1 号中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在这样的宗旨指导下,《青年杂志》刊载了不少为青年读者介绍欧西文化常识,及英文辅导之类的文章,“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最初其销量只有一千份,还包括部分赠阅。可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3 年版。

进景观^①。

这一方面表现在通信的数量和篇幅都成倍增加,3卷3号1期“通信”的分量(占28页)就几乎是第1卷全部通信的两倍,到1917年前后,“通信”则是其中最具特点的栏目之一。它在整个杂志中有相当可观的地位,常常占到整本杂志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新青年》去掉广告等内容后的正文约在八九十页),当时《新青年》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五六千份。另一方面,“通信”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务咨询类来信越来越少,而各种讨论性质的通信大量出现,占据了“通信”的主导,使“通信”栏目的功能开始由“事务咨询”向“编读讨论”转型。这些“讨论”涉及的话题各种各样,争论最激烈的“焦点”当然是孔教问题和文学革命,它们本身也是同期《新青年》最为注重的两大主题。

大量来自读者的讨论“我之青年观”、“我之孔教观”、“我之文学改良观”的信件不断在杂志上刊出。有些是针对《新青年》杂志内容或记者的态度与见解,有些则出自自我的感受与经验,而编辑者也会根据这些来自读者的反馈对杂志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则是编辑者本身或杂志同人之间,也通过信件方式,就相关问题展开思索与讨论,并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各自的思想理路与具体主张。与刊载正式论文的其他栏目相比,“通信”更像一个思想观点及社会现象的“集散地”,它讨论过“许多重要的问题和思想”,但也有不少不那么重要的话题,或者当时重要后来湮没的话题。

“通信”栏目积极的讨论参与者都是青年或在校的学生,而即使

^① 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

在比较排外和专业化的同人杂志时期,普通读者的来信虽然减少,也并没完全消失。参与感有效地激发起读者的兴致。即使不是学人,或者对一个问题只有一知半解,只要自认为真知灼见,都可以到“通信”中一试身手。因而这样的讨论在维持一个相应的水平线的时候,兼及专家与普通读者,可以使交流在一个尽可能广的范围内产生,提升其社会功效。“通信”的过程化也是支持讨论的重要特征,它使讨论的眉目清楚,有迹可循。而且,过程化也常常伴生着新的论题的生发,关联着论题的生命力。如文学革命,如果不是在“通信”中一直讨论,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旁逸斜出。

当时在“通信”里,与陈独秀展开讨论的读者大多已不可考,就能确定的而言,既有青年学生、教员、学者,也有银行职员、军人、工人,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职业,具有相当的包容性。陈独秀对来信也一式对待,对旧朋新友固然热情,就是素昧平生的一般读者也决不慢待,还常常以“连环通信”的方式和他们耐心讨论,既坚持己见,又大方地接受批评。

“通信”中讨论的话题,与《新青年》杂志基本一致,尤其如孔教问题和文学革命的讨论。这两个中心论题,尤其后者,基本上是以“通信”为论辩场的。孔教问题除了陈独秀、吴虞的论文之外,在“通信”栏中的讨论主要在陈独秀与北京高师预科生常乃德及读者俞颂华之间展开。不过,这场讨论虽然往来数个回合,但基本上没有最后“统一思想”,我们始终能看到正反双方在两条线索上展开论辩。常乃德在赞同“反孔”的前提下,以“辩孔”思路要求将孔教的历史发展及后儒之坏孔教等予以辨析,不能将孔子及孔教全盘否定;而陈独秀正是在与常等人的通信论辩中,指出对孔教是不能区别对待的,抓住孔教为专制之根本原因,孔教不能适宜于现代社会这样的中心环节,强调要

彻底反孔。

在“通信”中,陈独秀的态度显然与他驳斥康有为的态度有极大不同,他有许多的赞赏激励之词,引导讨论的继续。这里面其实应该包含有陈独秀对这问题的考虑及采取的策略。陈独秀对当时国中的尊孔势力做了一个分析,认为尊孔者可分为甲乙两派,“甲派以三纲五常,为名教之大防”,以孔教为“中国特有之文明,不可妄议废弃者也”。而乙派则“谓宋以后之孔教,为君权化之伪孔教。原始孔教,为民间化之真孔教”。陈独秀以为乙派的论调虽多有谬误,但却更具迷惑性,因而“宁是甲而非乙”^①。那么在“通信”中,他正是通过与常乃德等人的多方辩难,希望取得对此问题的“根本解决”。

对于文学革命的通信讨论则更加规模宏大,也更为长久,而且具有非常强的延展性。从2卷2号刊登胡适关于“八事”的来信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天比一天热烈。最初的参与者基本都是通过通信这种方式加入,以胡适的信为中心。对“八事”,尤其“不用典”一条,进行各自的评说。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加入后,讨论向度扩大,在中国文学的探讨方面,既有文学史的重构(如关于文学史的分期),又有对文学作品、作家及现象的批评(白话诗、白话小说、“黑幕”等),还有与此相关的如旧戏改良讨论等。在众多的讨论中,白话问题渐次成为中心,文学革命也集中在“工具”与“方法”方向,文字革命的讨论日见发达,如朱经农所说,“‘通信’一门所论,大半是‘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与文字问题相关的注音字母、今韵、汉字索引、世界语

^① 参见《新青年》2卷4号、2卷6号、3卷2号、3卷3号之“通信”栏,可参见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社会思想卷、语言文学卷(3卷本)》,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

(Esperanto)以至标点符号、横行书写等的讨论,都在“通信”中激烈讨论喧哗。虽然这问题现在基本已经淡出,但当时却几乎是4至6卷“通信”中最热闹的,参与者济济一堂,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并且伤了同人和气。后来尽管招致批评,钱玄同仍旧坚持讨论下去。7卷后《新青年》再次进行大的调整,8卷开始迁回上海,“通信”的论题随之变化,文学革命、文字改革的讨论消失,劳工问题取而代之。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有“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8卷1号有“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工作时间与工资”、“劳动问题”8卷2号有“工人教育问题”,8卷3号有“劳动专政”等,伴随着《新青年》的思想变迁,“通信”栏目为我们勾勒出当时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

虽然有些论题没能展开,但我们也可以从“通信”中找到一点踪迹,并以此推想那些新文化人的改革思路与规划。比如陈独秀曾想继续旧文学批判、旧戏批判的路子,对中国美术、医药进行批判,使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范围更为广大,但除了一通书信论及中国画,终于后继无信,大约这到底是专业性太强的论题。《新青年》6卷1号载有吕澄论关于“美术革命”的来信。陈独秀在复信中说:“本志对于医学和美术,久欲详论;只因为没有专门家担任,至今还未说到,实在是大大的缺点。”并希望“足下能将对于中国现在制作的美术品详加评论,寄赠本志发表,引起社会的讨论,那就越发感谢了”。而且陈本人还陈述了大段他的美术革命观。但此后并无关于美术和医药方面的文章或来信。

与2卷、3卷相比,4卷之后的“通信”,“公众”的范围基本限定在比较固定的杂志同人,其“外围”则是他们的友朋。无论来信还是复信,主要由他们写就;包括来往双方(或多方)外的“主持人”(有时由轮

值主编担任,他们通常以信件作“跋”或“按语”加入讨论),还是由同人担任。2卷、3卷“通信”中参与者最众的青年读者(有不少是在校学生)已经寥寥可数。也就是说,从发问到解答,到讨论到评论,基本是同人们自给自足。而“论坛”的内容也显得“主题”鲜明,专业性大为加强,同时编辑上也更加“系统”。

从4卷开始,“通信”中的信件统统被编辑者加上了标题,有的还被列出了纲要,或刊登在封面的“要目”中。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一种方便读者阅读的做法,但无疑也是编辑者加强“管理”的措施,也是散漫的通信“主题化”的方式。加标题的做法同时还意味着遴选及其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标准看来是专业化与学术化。以前那些宽泛的青年话题及时政话题锐减,而像新韵、汉字索引、注音字母、罗马字、修辞学这一类的论题,显然不是一般读者可以随意插言的。即便是些有一定“公众”性的论题,如新文学问题、旧戏改良问题,也在“学理”、学术性方面要求甚高,以往那种关于常识问题的解答简直不可想象。

与此对应,“通信”的编辑、编排方式也有了改动。一个显著的改动可能算是填补通信“时间差”,展示讨论的同步性,使讨论更为集中。比方说此前的来信,如果不是直接致“记者”,而是同其他人讨论问题的话,那么复信一般会迟至下期才能刊出,这就造成一个“时间差”。那样,不仅读者会因不了解“上下信”的情况而造成理解的困难,有时论者也会因不能及时了解对方的修订情况而求全责备,甚至误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4卷之后,《新青年》采用编辑集议制,使得通信讨论变为同步进行。不仅来信与复信会刊发在一起,而且经常会有一信多复,集中刊发的情况,有时还会再加上主编者的跋或按语,使讨论的意味变得更

浓。讨论的各层面更清晰,更直观,“声势”也显得更浩大。比如4卷4号的论 Esperanto,孙国璋因“顷读《新青年》4卷2号钱玄同先生之 Esperanto 通信一则,因更翻阅陶先生之信(指3卷6号陶履恭致陈独秀信),并3卷4号钱先生之信,以及独秀先生之答语数则”,因而就陶、钱、陈诸人的观点逐一评论,并提出自己对于 Esperanto 的见解。故而钱玄同、陶履恭都对此信进行回复,胡适也加了一个跋语。这样的讨论无疑更清晰,读者也会在对诸人的比较中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又比如5卷2号“通信”中关于新文学的讨论。朱经农、任鸿隽、朱我农分别致信胡适讨论文学革命问题。胡适则不仅分别做答,还要将三信再转呈钱玄同,由他解答与其相关的部分。这样就相当于九封书信并置,自然能够讨论得更加透彻。因此,综合主题的选择、学术性的加强、编辑方式的改动,这些“通信”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学术讨论笔谈”;而“通信”栏目也成了这个学术群体“自己的园地”。由公众论坛转而趋向自己的园地,与4卷之后《新青年》成为同人杂志相关,更与同人们的启蒙思路的转换相关。

比如围绕“世界语”的问题,同人们就分成赞同和反对两派,在“通信”栏里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论战,针锋相对,全无之前“小批评大捧场”的默契。虽然最后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无疑大大深化了对世界语问题的思考。但是对一般读者的来信,同人们就不复以前的热心,往往不屑耐心讲理,只用“恕不奉答”四字便打发过去。鲁迅的态度很有代表性,他在给钱玄同的一封信里说:“《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爱看。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以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笔墨,移作

别用。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工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对读者的商榷意见,不少同人更是没有以理服人的气度,动辄冷嘲热讽,甚至以“野蛮人”、“尊屁”、“粪”等粗语相赠。其蛮横的态度不但遭到很多读者的批评,就是在新文化阵营内部也不被认可。5卷1号的“通信”里登有汪懋祖的一封来信,批评《新青年》“如泼妇骂街”、“似不容人以讨论”的霸道作风。胡适在回信里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并表示:“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同人杂志的编辑方针固然能深化许多问题的探讨,使文学革命这样的新观念、新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提供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方面的思想理论资源,也使得学术研究在现代传播的意义上有了一个富有启示性的进展,影响深远。但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这也使得《新青年》失去了部分勇猛与决绝带来的朝气,并引起了一些一般读者的不满,一位署名“Y.Z”的读者这样写道:“贵志的通信栏,不过一个雄辩场罢了,没有一些商榷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正有无数青年男女,要与诸君商榷种种要事;你们可以新辟一栏么?”

“通信”中有许多长篇大论的文字,可视为学术论文,不仅条理清晰,且讲求“逻辑”。而且事实上,对某些作者来说,“通信”栏就是一个实习场地,他们的言论也正是为正式论文做准备的。因此,这些读者会将他们在“通信”中讨论的问题,经过整理,改写成正式的论文。但是,尽管是以论文为潜在框架的“公开信”,也到底是以私相交流为形式的信件,且又多在同人间进行,不仅商榷学问事,也兼及私谊及性情,更遑论其中也不乏表演与游戏的成分,因而有尺牍文的亲切。

《新青年》尽管对包括“应用文”在内的旧的文章体式有强烈批判,但对尺牍信件的格式倒也没特别要实行“大解放”。因此虽然滤掉了一些过分的谦辞,但一些称呼、排印格式(如空格、字号)等都改动不大,而书信头尾的写法,虽废弃了一些套语,但“愿足下不吝赐教”、“未知以为然否”、“足下所论极是”、“言辞昏乱望祈恕罪”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则极常见,这恐怕不能视为完全是客套,而确乎是包含着交流沟通的愿望,彼此间的尊重,以及温文的气度。

“通信”栏目保留了书信体特有的轻松随意的特征,尽可放言高论,不必拘泥。钱玄同曾经就戏剧改良问题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在这里他表示,“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但马上他又补充道,“如其通信,却是可以”^①。说明对“通信”中有不同观点,则为宽容的认可。即使在通信中所发表的言论被人抓住“把柄”,也会不以为忤,在此后的信件中检讨自己的轻率,也绝不会被指责为缺乏主见或自相矛盾。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均有这类落落大方的检讨。

在文白之争的特有时代背景下,白话的赞同者往往会刻意使用白话,而小心谨慎地规避文言。“通信”栏在同人大力倡导下,也同样强调使用白话。因此,我们在“通信”中常会读到一些生动鲜活的白话口语,尤其是钱玄同的书信。但另一方面,“通信”又是保留文白夹杂的语言风貌相当久的栏目,直到7卷、8卷都能见到。以书信的形式讨论学术问题,也使这种语言风格让学术话题更平实,使理论话语崇尚明白晓畅。

总之,论学书信的学术组织功能在现代学人的学术生活中还是

^① 胡适.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25。

能够屡屡寻到踪迹的。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是空白,希望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三节 论学书信的情感表达功能

本节的命题来源于导师刘梦溪先生,用来探讨书信中所呈现的精神层面。在不断翻检材料的过程中,我也越发觉得本章节是阐述学人书信论学传统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余英时所著《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中有《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一文,从旨意和写作手法上都对我很有启发。通过对书信的解读,让我接近这些学人们的内心,尤其是他们日暮桑榆的晚年心境,实在是研究之中的意外之得。

一、论学书信中的情感探微

书信本身就是情感的纽带,董桥曾在文中说得友人信,“一室皆春气矣!”^①语出自梁鼎芬写给缪荃孙的信,董桥叙之,信中有“寒天奉书,一室皆春气矣”之句,又有“秋意渐佳吟兴如何?”之念,还有“天涯相聚,又当乖离,临分惘惘。别后十二到朱雀桥,梅犹有花,春色弥丽”之淡淡的哀愁,可谓对书信当中绵绵情意的诗意解读。无论是古人所称的鸿雁、尺素等,都寄托了美好的情感。学人书信同样也负载着丰富的情感,从总体看,通常包含以下内容:

1. 仰慕与提携

这些书信通常会体现后辈学子对前辈学者的仰慕之情,同时往

^① 见陈子善编《董桥文录》,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345—348。

往包括前辈学者对于后来者的鼓励与期许。这里典型的例子不妨选取陈垣与方豪^①的例子。牟润孙先生在《悼亡友方杰人——陈援庵先生与方豪》(载1980年12月24日香港《新晚报》)中说:“杰人出身于杭州天主教的修道院,他之治史学是由于与老师陈援庵先生通信的关系。修道院中的修士本不能与外人通信,他为了热心求学问难,偷着给援庵老师写信,才引导他走上治中国史学的路,极为难能可贵。杰人念念不忘援老,抗战期间他在后方写文章称援老为爱国的史学家,援老逝世,他在台湾写文章纪念援老。”

修道院里的修士给大学里的著名学者通信,这在当时本身就是非常规的举动。方豪在《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一文中回忆:“我第一次冒昧地写信给陈先生,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一月。我在杭州天主堂修道院肄业。当时修道院的教育非常落伍。而禁令最严的是,绝对不许和任何人自由通信。我和陈先生通信,很显然的是犯了修道院极严重的戒条,但我又如何能做到呢?因那年先兄正在杭州天主堂附设的启悟小学教书,往返信件即由他代为偷送。”自由通信代表着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单靠人为的禁绝是难以阻挡的。

他写给陈的第一封信是在1926年的11月17日,表达钦佩之请,“晚闻先生名久矣!驰心向往亦久矣!每以未能亲炙为憾!”并求赠书,“晚所欲见书为:《灵言蠡勺》、《主制群征》、《名理探》、《寰有诠》四种,及英君与先生所著所刊各书。(又《天学初函》,其书英君谓已觅得全帙,未知已刊全否?如其不全,则祈将已刊者各惠赠一部)诸书价值颇贵,世人倒囊,或不易置,而晚以家贫,徒手为请,虽大君子乐成

^① 方豪(1911—1980),字杰人,浙江杭州人。

人之美,与人共善,必肯分惠,而晚蒙厚馈,则受之弥愧矣!”^①

面对陌生青年的索书要求,陈垣很快就回了信,并满足了他的要求^②。在1926年12月6日写给方豪的信中表现得非常友好、热情:

“远辱惠书,喜东南之得朋,欣慰何似!唯猥以万松相比,令人愧作。《灵言》、《主制》等作已奉寄,今又寄呈数种,乞察收。诸书或已绝版,或非自刊,故《寰有诠》未刊,不能备寄。最近印有二种,则非论道之书,广告如另纸。尚望时赐教言,商量学术。固所愿也。专颂台祉。陈垣谨覆。十二月六日。”^③

“杭州谢三太傅祠旧址为元时也里可温之最大天主堂,闻今已改作菜市,明年拟游杭一登临其地,届时或可晤教,至足乐也。方先生史席。垣又及。”

并在附言中提到“杭州谢三太傅祠”,并有在杭晤谈之约,表现出旺盛的求知欲,也为两人的书信往来提供了共同话题,可谓温厚的伏笔。从此方豪与陈垣往来通信不断,《陈垣往来书信集》中收录的信件往来书信有39通之多,其间陈还不停地给方寄书、讲义等材料,方也将自己的著作寄给陈指正,时间一直延续到1946年,之后因为海峡

① 方豪1926年11月17日来函,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78。

② 陈垣在1927年4月19日写给方的信中解释了方没有收到图书的原因,并又寄出了一批图书,包括自己的稿本,可见其意之诚。“第一次寄上之书籍,系公教大学秘书所办,事后询问包裹不得法,想未收到之故,系因封面破坏,无由投递也。今在检上《教宗通牒》二份、《辩学遗牒》三种一册、《灵言蠹勺》一册、《主制群征》一册、《蹇斋剩墨》一册、《万松心画》一册、万松联一对、《火袄教入中国考》一册、《摩尼教入中国考》二册,共为一包,挂号另邮寄。火袄、摩尼二种,曾登北京大学《季刊》,稍有添改,此系稿本。又承询《四库书目考异》五卷,书成未刊。《武州石窟寺记》,久已绝版,故无由寄奉。”参见,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③ 陈垣1926年12月6日往函,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79。

隔绝才渐渐没有书信往来,实际的数量可能还要更多。

方豪对陈垣相当敬重,“……回忆前以乞书于公,得附友朋之末;并承不弃鄙陋,允为商量学术;大惧草零木落,有伤知己之明!”^①其意拳拳。并又将自己的学术志向、未来抱负向陈垣倾诉。“顾生今年二十有四,其所得实寡,况无证书、学位之可恃,故出而应世,实难归适。恐将来为饥寒所驱,终于一无所成,想亦为我公所深怜也。况我公以史学号召天下,爱士之忱又汲汲如恐不及,生敬而慕之,已非一日,久以不得亲侍左右以求效其恳恳为憾。且尝辱数语甄奖,知必能哀其志也。是以直陈无讳,冀以文字自效。所望口不弃废,伏举纤介之微长,收抚奖励,俾得奉候几砚,陪侍游从。仍畀以暇晷,使续治其学,或于大学中量才位置(薪金自然不计)。如是,则我公乐育人才之志既遂,生亦释然自拔,以卒就其生平之学,以终不负我公之知,其他无所望也。”^②陈也不断地用亲切的话语、源源不断的赠书鼓励、关心着这位向学的司铎。在称呼中也使用“杰人仁兄”“杰人司铎”等敬称方豪,落款也曾以“弟”谦称。他始终关注着方的成长,方在《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一文中说:“三十一年一月十日,励耘老人特在辅仁大学附设司铎书院演讲《国籍司铎之新园地》,龚士荣笔记。老人特赐寄一份。他提到我:‘方豪司铎今任国立浙江大学讲师,为国籍司铎在国立大学教书之创举。’”在1943年写给方豪的信中提到,“至《司铎园地》讲师之称,系根据去年来书,今云实系教授,更为可贺。”对方在《复旦学报》上的献疑,陈也表现得宽容、平等,“文章天下之公器,有人

^① 方豪 1927 年 2 月 12 日来函,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83。

^② 方豪 1933 年 8 月 12 日来函,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90。

指正,求之不得者也,便幸裁示为感。”并鼓励方的学术设想,“垣老矣!恐不能复有所造述,关于天主教史及《日历》等,皆二三十年前所致力,此调不弹久矣。今得诸君子为之接力,岂不甚善!”^①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论学的学术环境相当的宽松、平等。

而在陈垣与蔡尚思^②的交往当中,这种殷殷之情同样也有流露。在蔡 1928 年 3 月 22 日致陈的第一通来函中表达了对陈的敬仰,“向在故乡(福建),未尝不自恨其生于遐陬,既寡师友之观摩,又乏书籍之浸灌,故于前年(来京三年所矣)不远千里而来。盖欲乘此时机,脱蓰危邦,远离陋俗,专心致志,求诸通都广邑之中,与夫名山大川,有道通古今,学博中外,以承先启后为怀,以经世诱民为任,真足为师资者,而亲炙之。……”1933 年,时蔡在武昌华中大学任教。6 月 3 日陈去函问他华中的情况,“华中大学是何性质?有若干年历史?学生若干人等等”,非常关心蔡的近况。之后 6 月 16 日又去函希望蔡到辅仁任教,对蔡的期望也甚高,“……前函区区之意,固系想念吾尚思,亦因近感热心教育之难其人。尚思英年,必能超乎流辈,但未识尚思近年生活何如。辅仁局面不大,月二百元之内之数,恐不足招罗贤者。吾之念念不忘吾尚思者,非爱其主观之哲论,爱其滔滔不竭之词源也。辅仁之所需亦在此不在彼,尚思有意北来乎?幸举实情告我。……”6 月 24 日,又再函,“兹因国文系主任病假,史学系又颇缺断代史教员,故垣忆及足下。照辅仁史系课程,中国史分六阶段,即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足下所开示之哲学史、政治社会思想史、文化史等,能改任六阶段中之一则善矣。又国

^① 陈垣 1943 年 11 月 10 日往函,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79。

^② 蔡尚思,1905 年出生,字中睿,福建德化人。

文系有普通国文,所谓普通国文者,系因各系一年级学生有国文较劣者,一律须补国文一年。每两星期作文一次,每班约卅人,分四五人担任。足下可担任一班,每两星期并讲授一次,即足下所开示之国文、韩文、学术文、文学史等功课也。至于国学概论,诸子概论等,近来担任此项课目者人甚多,须到年后方能分配。总之,现在辅仁所需要者,一断代史,一改作文。后者足下最适宜,前者则请足下斟酌也。抑有言者,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①陈垣像一位耐心的父亲,将蔡到辅仁来任教可能担任的科目一一道来,并为之选择适合他的科目,又对他的学术研究提出忠告,劝其缩短战线,语重心长。一月三函,促其到辅仁任教,其情殷殷。辅仁聘请教员,例由系主任主持,“校长不过画诺而已”,而这次大力推荐蔡尚思是因国史二系主任向其征求人选,又忆及蔡有北上之意,所以特为介绍,积极促成。前辈对后辈的爱护、提携之情跃然信上。

2. 学谊与友情

学人往来之间的书信也传递着浓烈的情感。以胡适与杨联陞的书信来看,他们之间的学谊与友情相当深厚。“胡适在纽约作寓公的期间,爱同年轻朋友来往,真如(唐)德刚所说的,年龄相等的朋友间,除了李书华先生外,可同胡适促膝长谈的真的绝无仅有。鲁迅在晚年,虽有文坛盟主之名,喜结交的也只是萧军、萧红这辈比较纯洁的青年”^②。他们之间并没有因年龄的差异而有距离,杨与胡的交情比

^① 三函均见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54—356。

^② 夏志清,五十年代的胡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上海:三联书店,1998。

其他青年学人更为深厚。这不仅因为两人性格都温厚开朗,特别投缘,而且知识上的兴味也最为接近。他们都喜欢历史考据,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语法,尤其是都爱写诗。这些共同兴趣很早便把他们两人的友谊进入到不拘行迹的境地了。《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所收信件起于1943年10月,迄于1962年2月,不仅书信数量众多,而且信的长度也颇为可观,《书札》中所录信件有的长达四五千字(如胡适1954年10月11日致洪业杨联陞、胡适1954年11月15日致杨联陞两信)。它的编印缘起及胡杨交游的经过和书信的价值,陶英惠和余英时在书前有专文介绍。按余英时的序文,这些信大略可分为前期(1943—1944)和后期(1949—1958),前期是指胡适卸任驻美大使移居纽约的时期,书信的一个核心是关于《水经注》的讨论,其分量仅次于胡适与王重民的通信;后期他们除继续谈《水经注》外,还论说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报”的观念、南宋的会子、王莽新朝的“新”、六朝人名字中的单字加“之”、词尾性助词等问题。书信往来,在学术交流的进展中,也让人感受到“旧学商量加邃密”的真意。对于不甘寂寞却陷入寂寞境地的胡适(1891—1962)而言,和晚一辈的杨联陞(1914—1990)论学谈诗也许是他晚年中最感安慰之事。

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胡适正式接受哈佛远东系的邀请,教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长期住在剑桥,他和杨的关系便益发紧密了。“据我所见到的一部分杨的未刊日记,杨不但旁听胡的思想史课程,而且等于作了胡的助教,代为选英文材料,并在胡外出开会时代他监考。”^①

1949年4月,胡适流寓美国,在最初的一年之内,心情失落,几乎

^① 参看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5册,1854—1865.转引自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印,余英时序,《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联经出版社,1998。

从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了。这一年5月以后的日记最能看出他全无兴致的低潮心情。7月间,杨写信给他想用诗来解开他的心结。胡在7月27日的回信^①中说:

谢谢你七月二十一日信。

你劝我“多作几首诗”,这个意思颇新鲜,我一定记在心里。

可惜的是

待等秋风落叶,

那时许你荒寒?

诗是你的,“?”是我借加的。

这种细致体贴的诗的感情,今天读来还能使人低回不已。顺便可以描述一下当时胡适这批流亡海外的中国学人的处境。由于国内政局变化,许多学人流落海外,精神上的苦闷,加上物质上的贫乏,使他们的处境相当艰难。1955年和1956年,胡适曾两次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道:他不想向研究汉学的洋人“讨饭吃或抢饭吃”。1957年7月26日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他在美国大学的眼中是个“白象”(white elephant),亦即“大而无用”的意思。接着他说,“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 take me more seriously”^②。正是在这种境遇下,学侣的关心尤其显得重要。胡对杨的关怀和爱护,也同样地无微不至。1958年3月4日胡给杨的信^③说:

①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02。

② 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台湾萌芽出版社,1970:128。

③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09。

收到你三月二日的信,知道你有血压过高的现象,我很挂念,很盼望你多多休息,多多听医生的话。……你实在太辛苦,得此警报是有益的。……那晚上你来我家,我没听见你说起身体近况,只在你走后我颇责怪自己“干么不让联陞多谈谈他自己的工作,干么只管我自己的 talk shop!”现在我明白了,那晚上我说话固然太多,其实时间也太晚,你也太累了,已不是向来的你了,所以你说话特别少。

其实,这已经是杨大病的前兆了。第二年他便入院长期治疗了。1959年4月27日胡在台北回复杨报告病愈的信^①中说:

今天在台大医院里收到你四月十八日的信,我看了信封上你的字迹,高兴地直跳起来!拆开看了你说的“昨日(四月十七日)出院回家,这半年不用教书,还可以接着 take it easy。下月起想写些短篇文字,但当爱惜精力,决不过劳”,我特别高兴!我一定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我们的许多好朋友。他们都很挂念。

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关怀。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止在诗的唱和或私交方面,更重要的是二十年间几乎没有间断的论学往复。胡适一生始终不失为一个学人。他一生最爱好的还是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各方面的研究。他不但自己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学术兴味,而且终身以推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最大的乐趣。因此他随时随地留心人才,发现人才之后则不断加以鼓励,并不

^①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33。

辞“到处逢人说项斯”。同时又深受现代价值的影响,完全接受了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因此,他对后辈学人确能站在对等的地位上讨论问题,从不露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1943年与杨联陞、周一良等人订交以后,他们之间的论学,无论是口舌的或文字的,都体现了一种苏格拉底对话式的精神,而与中国的语录传统不同。”^①胡适研究《水经注》一案始于1943年11月。在以后的两三年的通信中,他曾写了其中梵文问题一再征询周一良的意见,也曾为校勘和考据问题要杨联陞替他严格地审查证据。1946年回到北平以后,他在百忙中仍然保持与周一良讨论学术。1948年秋天,他还写了一封长信与周商榷牟子《理惑论》的年代问题。这封信后来附在周的论文之后,刊于1950年出版的《燕京学报》上。

杨在治学方法上受胡的影响很深。但是他并不以胡所标榜的“科学方法”为治学的无上戒令。早年在清华时期,他已从陈寅恪治隋唐经济事,毕业论文(关于中唐的税制)便是在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的专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圣以社会科学治史的主张。后来陶为他的《汉学评论集》(英文文集)作序,说他是“转益多师而自成大师”,确不失为知言。余英时先生在序文中指出,杨从胡真能择善而从,而不致把胡的限制变作自己的限制。对于胡立说过当的地方,他往往献疑质疑,不稍假借。例如有关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的问题、《坛经》之“壇”是否“檀施”之“檀”的问题,杨都不同意胡的“大胆假设”。

杨联陞的治学特点,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在为杨氏

^① 余英时序,《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8。

所著《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 1969 年版)所写的导言中指出:“杨联陞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①20 世纪 50 年代杨正当壮年,在西方汉学界正开拓疆土、勇猛精进,而胡适宝刀未老,依然挥洒自如,有博大精深的气象。他之所以能入此状态,与杨联陞的激发也大有关系,棋逢对手,再加上相似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兴趣,所以在书信中往往要“斗”上好多回合。输赢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切磋中的快乐。

胡、杨在《书札》中所展示的学术高度在某些方面恐怕为后人难以企及,而其中所蕴涵的一种如梁启超所言的“温厚”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缺乏的。温厚宽松自然是源于学问上的平等,有这种氛围方能谈得上学术上的独立自主。

1944 年 1 月 11 日杨联陞在给胡适的信中附寄了一些他的中国古代文法讲稿,引起了关于“所”字的往复讨论,1 月 31 日杨复信:“您对于‘所’字的分析,非常细密,读了佩服得很。不过我还想保留我的‘所是代名词而有时带副词性’说,因为这跟我的两个重要假定很有关系。”

而杨向胡的求教往往是“小扣大鸣”,获益匪浅。如胡适就杨著《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1952 年版)所引发的关于南宋会子问题的讨论,澄清了杨著中的一些含糊断语;而杨联陞在 1973 年发表的“最为社会学家所激赏”的《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也得益于 1952 年他与胡适的商榷。他的论文《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将胡适对于《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的意见抄录、容纳,并在文中详细描

^① 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67。

述了这一过程,“8月9日,我把这篇文章的稿子,寄给胡适之先生,请切实指教。胡先生在8月15日,从纽约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对自搏的考证,颇为嘉许,对自扑的解释,则提出疑问,对我的推论,也不甚以为然,我很感谢胡先生的指示,但因稿已寄出付印,只就必要处略加改动。胡先生有很多宝贵的意见都未能加入,很觉得遗憾”。^①之后抄录了胡适这封长达4000多字的原信,并根据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论搏颊求乞的资料和他搜集的其他资料作为补论,发表于1962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第34本上编,后收入《杨联陞论文集》中。

胡适对他的批评也是虚心接受:“你们指示我《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短文里对于谢山有过分严厉的贬语,我很感谢”(1954年10月×日),“谢谢你们对我短文的批评!这正是我最愿意得到的反响”(1954年10月11日)。关于王莽国号之“新”的问题,胡适在做结论时,也说“并不敢坚持己见”(1956年4月22日),这完全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毫无唯我独尊的霸气。

他们也不是将书信论学视为私密之事,从《书札》中可以看出周一良、裘开明、赵元任、陈观胜、全汉昇、陈世骧等参加了讨论,有时胡适明示杨联陞将信给他们看,私人性的书信在此获得了宽泛的交流环境。

他们之间反复讨论所发挥的积极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上述几篇论文之严密周恰,正得力于胡一方面攻瑕抵隙,另一方面又

^① 刘梦溪主编.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841。

倾其所知以相助。朱熹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于此见之。他们论学二十年，达到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的至高境界。这一知性的乐趣，寓隽永于平淡之中，自始至终维系着两人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后世读他们的书信集的人是不能不为之神往的。^①

而且杨联陞将这一论学传统自觉地保留和传递下去，1977年在他的学生余英时离开哈佛之前，他对余说起20年间与胡适的书信论学，文字往复，受益无穷，乐趣也无穷。因此希望与余依然能继续彼此之间长期论学的习惯。1985年在余英时撰写《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时，除函札往返外，在电话上更和他长谈过无数次。最后他为该书写《原商贾》的长序则是他晚年最用力气的论学之作。

余英时满怀感慨地说，“和适之先生一样，他具有异乎寻常的宽容精神，他不但没有半点介意的表示，而且尊重我的决定，鼓励我在学术上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从学术之为公器的一方面看，他肯定了我的决定的证明意义”，“他和适之先生互相攻错在他学术生命中所发生的创造性的作用，于此可见。他不惜以晚年衰病之身从多方面启发我，主要也是因为他要把他和适之先生的论学传统延长下去”。^②

3. 托付与冀望

学人一生的精神成果凝结在他们的著作上，而将自己的著作整理托付给其他人，这其中该有多少信任与期待。陈寅恪赠蒋天枢诗句：“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蒋天枢（1903—1966），字秉

^① 余英时序：《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9。

^② 余英时先生序：《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2。

南,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1943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从1953年,受陈重托出版陈寅恪文集,自受命以来,殚心竭力,不负重托,为陈寅恪文集出版作出巨大的贡献。而现存于《陈寅恪集·书信集》中的致蒋天枢一函中也提到了对其作品的整理情况。“一九五三年廿二日就所钞得者辑成此目。所注年月,曾载各期刊者著出版时期,其未发表之作著写成时期。所遗漏者,俟续搜得补录……”^①无独有偶,在杨联陞致胡适1957年5月27日的信中也有相似的内容,“您修改‘遗嘱’,授权毛子水先生同我处理您将来的‘遗稿’。这是一件大事,我不敢不从命。您在前些年早就同我说过:学生整理先生的文稿,不可贪多,而收录未定之稿,或先生自己以为不应存之稿。但这里实在需要很大的判断能力。我觉得编辑人决定不收入‘全集’的文稿,也该有个目录,附在集后,并说明不收之故(例如‘未定稿’),如未刊行,并应说手稿保存在何处。我觉得‘刊布’与‘保存’是两回事。即便刊行‘全集’,也应该有些选择,至于‘保存’,又有学术性纪念性两端,从学术看,也许还可以选择,(例如先生关于一个问题,曾起草过两次稿子,自然以后稿为定,前稿只供校勘之用)若为纪念,则片纸只字,都可能有人要保存,那就只好各行其是了。您如果再详细的指示,有时间倒可以写下来,将来负责的人好遵照办理。”^②

毫不夸张地说,杨联陞是胡晚年最信任的人,胡在《遗嘱》中指定杨为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绝不是偶然的。杨不仅欣然受命,而且对整理文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们之间那种相知与信任与日弥深而且终生不渝的情感让人感佩。在陈寅恪的书信当中,尤其是建国

①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272。

②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397。

后,一个关键词不断出现,就是著作的问题,在信中屡次提及自己的著述,有谈赠送、有谈出版、有谈读书的,晚年将著述之事交给蒋无疑也是一种托付。他在1950年9月18日致吴宓的信中说:“现已将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约十六万字十一月底出版。当寄呈一部求教,并作为纪念。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版之机会故也。《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敦古谊集腋报师门’,今日四海困穷,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①1955年9月19日,致唐长孺的信中说:“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解唐诗,聊以此糊口。所研者大抵为明清间人诗词及地方志乘之书,而旧时所授之课,即尊著所论之范围,其材料日益疏远,故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并赠送一册《从史实论切韵》^②。

1957年2月6日致刘铭恕,仍托人查找缩微影片中的资料(续高僧传通伦传及伦敦印度部西藏文卷子),叙及现状:“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所苦者衰疾日增,或作或辍,不知能否成篇,奉教于君子耳。”^③

而正是这个视著作为生命的人,在“致牟润孙”的信中提出不要再寄书给他了,这又是什么原因?“数月前奉到大著,‘乌台’正学兼而有之。甚佩,甚佩!近年失明断腿,不复能听读。敬请以后不必再寄

①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268。

②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277。

③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279。

书为感。”在牟润孙 1971 年元月 8 日附记中：“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我寄了一册魏晋以后崇尚诡辩之由来及其影响给陈寅恪先生，后来就得到这封信。……另外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千万不要再去信，并请转告伯郊不要再寄东西或药品。我才知道寅老当时的遭遇，后悔莫及，数年来珍重地保存这封信，以为纪念。今日检出重读，百感交集。忏悔之外更有知音难遇之感。”^①

陈的晚年境遇下文中会有介绍，而这也愈加让人敬佩蒋天枢为完成文化托命所作出的努力与坚韧的意义了。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中的写于 1979 年 6 月 20 日的题识中，“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十周年，余亦老矣。……所知道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谱，故题‘编年事辑’云。……先生论著已悉交出版社，故未能撮举。仅著编年目录附后。商希知者纠其谬误阙失，所深望焉。”^②其事切切，该书的图版中，《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抄本工工整整与蒋的增订手迹密密麻麻，都给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由蒋的学生章培恒所撰《后记》中，这样理解蒋的工作，“我觉得蒋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以及七八十年代为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所做的大量工作，同样是为了中国，为了学术。自然，蒋先生对陈先生十分敬仰，但这种敬仰首先不是由于陈先生是自己的老师，而是由于作为自己老师的陈先生是一位坚持独立人格的、忠于学术的、从而也才是真正忠于自己民族的接触的学者。……所以蒋先生是将此书的编著作为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来对待的。在一九八一年初版刊行以后，先生仍在不懈地从事补订，直到发

①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283。

② 蒋天枢撰.题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

病逝世……师母就将一册先生生前作了不少亲笔订补的《事辑》排印本交给了我；有些页的行间写满了密密的蝇头小楷，而先生其时已经是八十余的高龄了。古人所说的‘薪尽火传’，我想，在蒋先生为陈先生整理文集、编写《事辑》的事情上，是不难理解其内涵的吧。”^①这种文化托命正如薪火相传，维系了学术的精神传承。

二、晚年心境：以史学二陈为例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读这些学人书信，最“怕”读陈寅恪的书信，尤其是晚年，可谓满纸悲凉，读来欲哭无泪。特别是《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最后两封写给当时中山大学卫生保健室主任梁绮诚与“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驻中山大学工作队”的信，看来真是凄凉无比。第一封信希望“从1966年8月1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第二封信则是由陈的夫人唐筼代写，针对“有意污辱护士”、“非外国药不吃”及食用中山大学农场产品所做的辩驳，以“总而言之，陈寅恪的每日饮食，所服药物等也欢迎有同志来实地调查，以明真相”，^②语气平静而充满悲愤，这些书信虽与论学无关，但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已无安静做学问之环境，诚可痛哉！

余英时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一文，所使用的材料是《柳如是别传》、《诗存》与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编年事辑》，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尤其是对陈诗的解读更见功力，选取诗歌来探讨其晚年心境其做法很有见地，吴宓在1959年抄录了陈好几首诗以后，曾加附记云：“诸诗借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

^① 章培恒·后记，见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58。

^②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286。

明白写出,为后来作史及知人论世者告。至其记诵之渊博,用语之综合,寄意之深远,又寅恪胜过他人处。”^①从研究方法上,师法陈在《柳如是别传》“以诗证史”的方法,对陈诗做了“剥蕉见心”的方法笺释,对诗句的分析从历史层面的典故入手,联系到生活中的细节,陈当时的处境,对有些经过篡改的句子利用校勘的方法予以纠正^②,分析深入合理,得其精髓。因此,文章最后所提出的“他在1958年康南海百岁生日献词中写道:‘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对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刻画再也找不到比这两句诗更恰当的了”,也显得真实可信,合情合理,震撼人的心灵。

随之,我也另有一疑问,书信,尤其是陈寅恪的晚年往来书信对于探讨他的晚年心境是否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书信,不仅是晚年心境的写照,同时也是晚年生活状态的写真。

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③收录了1923—1966年间迄今所能找到的陈寅恪致数十位亲朋、学者的200余通书信。其中他1950年9月18日致吴宓的信中说:“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④与前文所论及的晚年心境有佐证之功。信

① 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上海:三联书店,2005:389。

② 根据余英时文,1980年出版的《柳如是别传》中,《丙申五月六十七岁生日,晓莹于市楼置酒,赋此奉谢》一诗中“……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幸得梅花同一笑,岭南已是八年留”;而《寒柳堂集》中《寅恪先生诗存》中为“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头,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并参照诗笺的复印本,考出“欠□头”为“欠斫头”,余以此诗为例证,“从这首诗之不见于《学术研究》及其发表时一再经过改易与掩饰,即可见陈先生晚年遭遇之沉痛实有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于万一者。”

③ 在三联书店的《出版说明》中:“根据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④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268。

中所附其近作诗一首《庚寅广州七夕》：“岭树遮楼暗碧霄，柳州今夕倍无聊。金瓯已缺云边月，银汉犹通海上潮。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魂销。人间自误佳期了，更有佳期莫怨遥。”更见凄凉悲苦。像这样的第一手材料，应也作为真实可信的论证材料。在陈寅恪建国后写给朋友的信中，这种情绪多有流露。

令人感慨的是在 40 年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三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①

与上文的陈寅恪相对应，史学家陈垣的晚年生活又是另外一番情景。在阅读《陈垣来往书信集》的时候，感觉最突兀的莫过于《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②，这封信发表在 1949 年 5 月 11 日的《人民日报》及 1949 年 5 月 17 日的《进步日报》，已经不是两人之间的私人信函，而是陈垣向旧时代的公开告别与决裂了。

这在之前的通信中，毫无征兆，在 1948 年 12 月 13 日的来信中，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对陈依据梁节庵与叶浩然两人在武昌的时代“断定杨惺吾两札作于光绪廿三年丁酉（1897 年）四月，当时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提出一些反证，语气平和，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开头写道，“这几天，天天想写信给先生，总不得闲暇，故十二月七日的信到今天还没有奉答，千万请恕罪。北大五十周年，承允惠临讲演，不胜感谢！”未

①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166。

② 这封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公开信，至今未见手迹。不过，由陈垣先生之孙陈智超教授编辑的《陈垣来往书信集》还是收入了这封信，表明它的真实性不存在问题，或者即便有造假情节，陈垣先生或编辑者也默许了。

尾鉴于时事,发此感慨,“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①

而3个月后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却全然没有了学问上的切磋和朋友之间的友善,虽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友谊的结束,情感的破裂。在公开信中,陈垣反驳胡适的“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的说法,“我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地说,只有在这解放区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是受着蒙蔽,适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之后从治学方法、政治态度等方面彻底批判胡适,“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而且他在信中也提及了陈寅恪,“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这一说法,对陈寅恪相当的不公平,陈到广州去并未离开大陆。

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②这封信发表之后又有英文

^①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1。

^②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2122—2133。

译本在海外流传,远在美国的收信人胡适不久之后就读到了。根据胡适日记,他是在当年6月18日得到英译本的。6月19日日记说:“……此绝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次日日记:“今天又细读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 ,可怜!”再后一天,他读到中文本,愈发相信此信出自陈垣之手。不过,后来胡适还是拿出了自家的考据功夫,证明这封信属于一小部分真实内容和其他大部分内容属于伪作。^① 根据我对于《陈垣来往书信集》的编者陈智超的访问及他公开发表的文章,“这封信虽然由陈援庵的助手执笔,但无论是写信的动机还是信件的内容,都完全是他本人的意思,可以确认是他写的信。”^② 我们可以推测,在当时的情形之下,陈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写这封公开信,也就容易理解了。

以这封信为转折点,陈垣从此转变,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③。在1952年1月22日写给包赓的信中说,“解放前我著书,只凭自己一时的兴趣,不问人民需要不需要,故所著多不切实用之书,现正深自懊悔。足下乃想花钱买这些书,大可不必,今除去绝版者外,特检寄数种,能不客气的批判,幸甚。”^④ 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

① 胡适的文章见自由中国,2卷3期,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2122—2126。

② 陈智超,陈垣与胡适.陈智超自选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235。

③ 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206。

④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77。

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①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②

对于政治的态度,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中,陈垣这样说:“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动,但是我先前并不知道你在服务于反动统治政权,我只是以为学术与政治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这种错误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从于政治,而又指导了政治’。”

建国后,辅仁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办,陈仍任校长。1951年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团团长,到四川巴县参加土地改革。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逝世。之后,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1949年陈垣正好70岁,距他1971年在北京去世,22年的时间里,多是发表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在其1951年11月8日写给族人的信

^① 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206。

^②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上海:三联书店,1995:118。

中,旗帜鲜明地写道:“如果我们父兄是地主,我们就要斗争我们的父兄;如果我们自己是地主,我们就要斗争我们自己。换言之,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如果我们是地主阶级,我们就要背叛自己的阶级来作自我斗争,我们是要废除地主阶级,但不是要消灭地主的肉体。……应该老老实实遵守政府法令,向农民大众低头,听受群众处理,群众对你好不好,就看你平日对人好不好,自作自受,也是心安理得。”这段话,并非言不由衷,在同年12月14日写给族人的信中还谈及此信,“前信族人见之,是否痛快,但思想搞通后,知道理应如此,心中自然舒泰。”^①当时的风气固然影响有之,但其思想的转变确实可见一斑。

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的末尾陈垣这样写道:“我现在很诚挚地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应该说,在这封信中提及的三位学人,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同,个人命运也从此截然不同了。

仍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政治取向的不同也并不影响他们的互相牵挂,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在1949年12月15日夜,手录陈在1948年12月7日给他的信和他在同月13日的复信,在复信的录稿后面记着:“这是我在北平的最后的一封论学书,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陈垣先生没有答复我问的话。”^②陈垣在北京得知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有纪念胡适之生日及傅斯年逝世的论文集后,于

①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89。

②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2062—2063。

1960年4月20日致信在澳门的友人汪宗衍：“关于胡、傅论文集，甚欲一见，邮局能寄，则请寄下为幸。”^①5月份他收到了这两部论文集。这也是学人之间的情愫与本色吧。

^①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18。

——| 第五章 以抢救图书为中心的论学书信

本章节选取抢救图书为中心事件,讨论论学书信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书斋生活通常围绕着“图书”这一中心,藏书、读书、编书、写书、评书,学人们对图书、文献怀有一种职业的、也是发自内心的重视与珍爱,他们对于图书的价值评估与图书对于文化的存亡续存的重要作用都有深刻的认识与扎实的功力,而他们积极地参与到抢救图书运动当中也是中国的典籍之幸,文化之幸。

第一节 学人书信与图书抢救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现代学人对风雨飘摇中的故国情愫往往寄托于文献之中。兴学校、办报纸、广印书籍以开民智,搜珍本,整理善本,抢救面临流失海外厄运的珍贵图籍,也是现代学人所担负起的时代任务。在1927年1月21日致傅增湘的信中,张元济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

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①

一、图书抢救的文化价值

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②这一著名的论断,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或世界汉学领域中,不断被证实,如敦煌文献、汉晋简牍、内阁档案、外族遗文,以及近期的简帛佚籍、徽州文书等等,皆是典型的例证。学术研究在进步,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一直是学人努力的方向。对图书文献资料的抢救就是对学术研究的莫大贡献。没有文献基础,则为空中楼阁。没有图书文献的支持,学术研究会因于文献不足,或浅尝辄止,或人云亦云,因此,学术的根基就是文献的抢救。

中国学人对于图书的抢救始于对学术的重视。例如到日本的访书活动,到法、英等国的抄书活动,其实就是对流入海外的汉籍的搜求、整理与抢救。“国中发见之资料,殆皆可遇而不可求者,故吾人尚宜转移视线,求之于国外,如研究敦煌卷子者之宜赴伦敦、巴黎,研究小说者之宜赴日本。”^③在访小说戏剧书的行列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董康和孙楷第,还有后来的傅芸子。董康自1926—1936年在日本四次访书,后成《书舶庸谭》(又名《董康东游日记》),他的访书记录除记录经史子集典籍之外,对不登大雅之堂的戏剧小说也颇为用心,有关版

①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45。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三联书店,2001:266。

③ 傅芸子.东京观书记.见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24。

式、题识、目录均详加抄录。胡适称董康在书中所记录的“许多流传在日本的旧小说,使将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因此知道史料的所在”^①,在他为孙楷第编撰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言中,也有提及,“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做了中国旧小说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决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方才可以了解孙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说的使命的重大”^②,对于学术的价值由此可知。

之后随着时局的发展,图书抢救运动开始不只关系到学术研究的发展,更与民族文化的保存与续接相联系。当时,由于政局动荡,一大批珍贵的文献流落民间,如明清内阁档案,日本、美国等都有收购之意,由于中国学人的抗议与阻止,这批档案终于归北京大学国学门及后来的中央研究院所有,确是安妥所在。及至抗日战争爆发,藏书多有烬于炮火者,江南地区所受损失更为严重,许多藏家急欲出售所藏以度日,例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被毁,其中普通书均荡然无存,而特别珍贵的善本则尚存上海,有出售意;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因迁藏于上海,不致散失,而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洵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旧书摊上发见者;南陵徐氏藏书,也有一部分流出来换取家用。这时,北平等地的书贾云集上海,购去大量江南各藏书家的藏书捆载北上。美国、日本、伪满,都将这些古籍珍本视为猎取目标。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曾就中国图书输入美国情形发表谈

① 胡适.《书舶庸谭》序.1930年6月28日,胡适文存,四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445。

② 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1932年7月24日,胡适文存,四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292。

话。“中国珍贵图书,正在源源流入美国。举凡希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学者荟萃于此,诚以中国 4000 余年之典章文物,集中在北京各图书馆,应有尽有,自今以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他并预料“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①。

郑振铎在《劫中得书续记》中沉痛地说道:“然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为烈。平沪诸贾,搜括江南诸藏家殆尽;足迹遍及晋鲁诸地。凡有所得,大抵以犖之美日为主。百川东流而莫之障,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溪外游学。为后人计,中流砥柱之举其可乎?”^②尤为严重的是敌伪所购之书,“都以府县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念及此,忧心如捣!”^③

二、关于图书抢救的学人书信

鉴于上述危急情况,当时的现代学人积极地参与到图书的抢救活动中,在他们的论学书信中也有集中反映,可以作为证史的材料之一。

综观这些书信,从内容大抵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交换图书信息、线索;学者之间交换珍贵图书的信息,为收藏、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线索,例子很多,这里就不详细叙述。

① 郑振铎.劫中得书续记.卢今等编.郑振铎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22。

② 郑振铎.劫中得书续记.卢今等编.郑振铎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8。

③ 郑振铎.求书目录.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37。

第二类提请有关当局出面购买、收藏珍贵文献。

这里不妨以前文所提及的明清档案之抢救为例。这批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损失极为严重。根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光涛先生云,“本所的明清档案,原为清代内阁大库所存。宣统元年,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参事罗振玉请张氏将档案移至国子监,装八千麻袋。民国二年,教育部设历史博物馆,民国五年,迁午门,视同废纸。后以‘烂字纸’三字以四千元代价出售于商人作造纸材料;罗振玉氏以三倍之价购回;以财力不足,拟转售外人;李盛铎氏急以一万六千元购于罗氏。后由傅斯年先生转蔡先生以二万元购回,幸免落于外人之手。”^①

当时的著名学者罗振玉、马衡^②、傅斯年等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议时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以政府名

① 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285。

②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早年在南洋公学读书,曾学习经史、金石诸学。精于汉魏石经,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1924年11月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兼任临时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1926年12月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1928年6月南京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时,曾受接管代表易培基的委派,参与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工作。1929年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抗战期间,他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的维护工作。抗战胜利后,主持故宫博物院复员与西迁文物东归南京的工作。北平解放前夕,为确保故宫建筑与文物的安全,他坚守院长岗位,并与社会名流呼吁国民党当局避免战火,保护北平文化古城。北平解放后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3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义购买这批档案,最终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的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这封写于1928年9月11日^①重要函件的内容如下:

子民先生左右:

午间与适之先生及陈寅恪兄餐,谈及七千麻袋档案,本是马邻翼时代由历史博物馆卖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袋。李盛铎以万八千元自罗振玉手中买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储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房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羨,其价值重大可想也。

去年冬,满铁公司将此件订好买约,以马叔平诸先生之大闹,而未出境。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存,恐归损失。今春叔平先生函斯年设法,斯年遂与季、骝两公商之,云买,而付不出款。遂又有燕京买去之议。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

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之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 Qonation^②。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

^① 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285—286。

^② 意为捐赠,应为 Donation,原文如此,照录。

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至于失散,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此实非一浪费不急之事也。先生虽辞去大学院,然大学院结束事物,尚由杏佛先生负责,容可布置出此款项,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与杏佛先生切实商之。此举关系至深且巨也。至费用,因李盛铎索原价一万八千元,加以房租,共在二万之内,至多如此。叔平先生前云可减,容可办到耳。专此,敬颂

道安

杏佛先生同此

学生斯年谨呈 九月十一日

满铁公司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势力,燕京大学则以美国的雄厚资金为基础,无论流入哪家,都是我国珍贵文献的流失,因此,傅斯年主张由国家购买,并以捐赠方式拨给中央研究院,一来充实中央研究院的资源,二来也可使这批材料得以整理研究。蔡元培得知此事后,立刻函致杨铨(杏佛),“杏佛先生大鉴:……孟真来函,欲大学院以二万元购李盛铎所藏之档案。如能腾出此款,当然甚好。但几日内有法筹出否?(下缺)”,玉成此事,为国家保存下了重要的文献。难怪台湾联经版《傅斯年全集》的编者孙常炜在抄录此两函时加按语,“按此二函明清档案失而复得之重要关键。”史语所获得这批档案,对其学术地位的提升颇有益处,而明清档案的整理,也成为日后该所的主要工作之一。

而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由陈垣起草的《故宫博物院致(北洋政

府)国务院函》^①(1926年1月):

敬启者:本院组织,内分古物、图书二馆,图书馆内又分图书、文献二部。文献部所藏,悉为有清一代史料。除实录、起居注等已纂有成书,尚堪检阅外,余如朱批谕旨、留中奏折等,皆散帙零编,搜讨不便。加以年代久远,尘封积寸,狼藉异常,非予清理,恐终废弃。曩者内阁大库旧档,当局曾以贱值出售纸商,麻袋八千,易钞半数,不俟秦火,已沦劫灰。兹幸本院成立,关于有清一代史料,保存编纂,职有专责。拟利用此等史料,编纂《清通鉴长编》及《清通鉴纪事本末》,以与清史相辅而行,用垂不朽。唯院中所藏史料,尚虞不足。查清旧军机处档案,现存集灵囿,自雍正以来,二百年间,军事机密,胥自于是。今境迁事过,无所忌讳,是宜公表于世,以资考证。且此项文件,与宫中所藏档案,关系至密,往往一档分载两处,或两种记载相互发明,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亦宜汇聚一处,加以整理。考历代官私书目,史料传者,大抵编勒成书,方能流布。其以散帙传者,未之前闻。即已有成书,如唐二十二朝实录之见于高氏史略者,除顺宗一朝外,至明多已不

^① 关于此函,单士元先生在《回忆陈援庵师》一文中(载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中曾说:“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袁世凯曾将清王朝军机处档案,从清故宫迁至旧国务院,在集灵囿楼上储藏,尘封鼠啮十余年。到1927年(按:应为1926年),其时北洋政府总理为许世英,是援师的旧识。商之于许,要求将军机处档案和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一并移交故宫博物院。已得同意,但须有一公函。给旧国务院的公函,当时说是由援师来起草。我虽未亲阅援师手书,但从文字观之,非有学者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当日援师命我还有其他一、二人,至集灵囿交给负责管理此项档案和图书的朱师辙先生。朱先生接到公函,朗诵一通,拍案称许。军机处就是在这时又回故宫,皮藏于故宫所属大高玄殿中,这批档案才得保存下来,它现在已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重要的历史档案。”

传。宋代史料之见于晁、陈二家书目,如《元丰广案》百卷,《嘉佑御史台记》五十卷,《国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至明朝亦已不传。元代史料之见于明初《文渊阁书目》,如《经世大典》七百八十一册,《太常集礼稿》百册,《大元通制》四十五册,至清初亦已不传。以此类推,清代遗文,失今不图,后将何及。查德、法等国所有各机关过时档案,均移存文献馆,以为编纂国史之用。本院现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见,用特函请贵院,将旧存军机处档案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以便从事整理。一面分类陈列,并可勒为专书,一举两得,岂非较胜于束之高阁,徒供蠹鱼,终归湮没也。又集灵园图书室所藏书籍,内多有关清代掌故,兹拟照松坡图书馆前例,请将该项书籍同时划拨本院图书馆,俾供众览,并作编纂参考之用。贵总理阐扬文化,素具热心,故宫博物院之成,亦夙蒙赞助,倘清代史料,得藉此编制成巨帙,传示将来,岂惟本院之幸,实国家之盛业也。特此函乞准予施行,实纫公谊。此上国务总理。

以公函的形式,正式而庄严地陈说文献的历史价值与藏之于公的文化意义,通篇有理有据,文字工整典雅。

第三类是以筹建收藏机构(图书馆)、研究机构保存、研究珍贵文献为内容的书信。

以学者的一己之力有时很难完成大批文献的保存与研究。以前文所提的明清档案为例,当这批档案从历史博物馆流入民间,罗振玉当时立刻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批极珍贵的史料,马上以个人财力购买,并试图对档案进行分类整理。但工作几个月后,罗振玉发现:要对这样数量庞大的档案进行保存整理,实在不是个人所能办到的,

他在答沈曾植函^①询“何时可毕事”的信上即直告：

检理之事，以近数月为比例，十夫之力约为十年当可竟。顾检查必旷宅，就理者须部署度置，均非建专馆不可。顾以前称贷既竭吾力，将何从突兀见此屋耶？即幸一二年间此屋告成，天假我年俾得竟清厘之事；典守、传布，又将于谁望之？私意此事竟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

故他期盼：

若得三五同志，协力图之，一面鸠金建筑，一面赁大屋从事检理。检理所得，随时刊布。假以月成百纸，则十年得万余纸。是检理告终，紧要史材亦得大要矣。虽然，茫茫人海，何从竟得其人，亦托诸空言而已！

同样的，当时与闻此事的王国维，在欣然于内阁史料得蒙保存之际，考虑到日后存放问题，亦甚感其难，在致罗振玉的信^②上说：

此项材料……将来置之何地，真是一大问题。重要材料，至多不过百分之一，尚易处置，惟不甚要者，私家即无法藏度，若为公有，则恐仍作燃料耳。如何如何？

① 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序》，见：罗雪堂先生全集四编，台北：台北大通书局，1972（6）：2323。

② 王国维 1922 年 5 月 13 日致罗振玉函，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532。

从罗购置与整理明清档案的经历看,说明在新材料不断出土的20世纪,要全面搜罗、整理乃至研究新材料,只有走向设立专门学术机构、依靠群体力量来进行一途。后来明清内阁档案于1921年流入民间后,北大学者就深知这批档案的重要性,呈请教育部把所藏档案(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如奏本、誊黄,报销册,试卷等)拨归北大整理,“……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尚祈钧部顾念近世史之重要,史料之难求,准如所请……”北京大学国学门在得到这批档案后,拟定整理的方案,分为三个步骤,“按档案形式分类,区别年代”,“编号摘要”,“编辑、考证各项重要事件及分别编制统计表”,相关工作开了中国学术团体整理档案之风气。而且这批材料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①。30年代之后,由于学者渐多利用档案从事研究,明清史的研究也得以蓬勃发展。

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关于筹建收藏机构与研究机构的学人书信相当丰富。以张元济为例,他主持创办了通艺学堂图书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四个图书馆。在他与缪荃孙的往来通信中讨论收书的方针、范围等,内容很丰富。他认为图书馆应该以抢救珍贵典籍为首要任务,在写给缪荃孙的信中说,“来书慨然于旧书之将绝,此亦兴会使然。要在有一二先觉者出为转移,自有挽回风气之日。承示图书馆宜多备通行书,甚是甚是。但难得之旧本,若无公家为之保存,将来终归渐灭。”^②缪荃孙曾提议图书馆应该收藏一些通行之书,但是张元济还是认为图书馆应该以抢救珍贵典籍为要。创办

^① 相关内容可参见陈以爱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中第三章《北大国学门整理国故的方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② 张元济致缪荃孙书,见张元济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和为涵芬楼收集藏书的实践充分切合了张元济的这一思想。除了善本之外,张元济重视地方志的收藏。他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其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犹重者。”搜罗的完备,国内藏家无与伦比。张元济常引以自豪,他在1927年9月27日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先是,客有自大连来者,谓该馆所藏吾国方志几于全备,为之神往。今乃知仅有六三八部,才本馆三分之一弱,殊为失望,因此又不禁斤斤自喜矣。”^①

1932年淞沪之战中东方图书馆几乎化为灰烬。上海沦陷后,公私藏书再次大量流失。有感于此,张元济与叶景葵、陈陶遗等商议创办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于1941年建成,在其创办意见书中,张元济指出:“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已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太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②这无疑也是张元济的心声。

第四类以整理、出版珍贵文献为主要内容的书信。

购买、收藏并不是抢救文献的全部,抢救珍贵文献的真正价值在于出版、流通与发扬光大,现代出版业的繁荣,使现代学人抢救图书的途径又多了一条,就是将图书进行复制或出版。关于现代学人以整理、出版形式抢救珍贵文献的例子,张元济无疑是最为典型,而且研究资料也很丰富的人物,尤其是书信、日记、年谱等材料较为完备。

关于张元济的材料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多,1951年出版了《涵芬楼烬余书录》,1981年出版了《张元济日记》与《张元济书札》,《张元

① 张元济致黄炎培书.张树年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② 张元济.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张元济诗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济日记》与《张元济书札》“在上海商务厂排印,而且作为商务印书馆 85 周年馆庆礼品出版”,“因为是赠品,版权页上没有书号、印数、定价。但没有书号就不能上市,图书馆不能入藏,当时邮局规定没有书号不能算是印刷品。为此在看到校样后,又加了书号但仍无定价,馆内也没付发表费”^①,在 1983 年出版了《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1986 年出版了《张元济诗文》,1990 年出版了《校史随笔》,1991 年出版了《张元济年谱》,1992 年出版了《张元济蔡元培往来书信集》,1997 年出版了《张元济书札增订本》,除全部收录《张元济书札》外,又将《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中致傅信全部纳入,又加辑《年谱》中所得,共 3 册。因 1981 年出版的《张元济日记》是全文,《书札》则是很少一部分,只就“文革”中上海图书馆起潜馆长请人誊录的,原准备在上海图书馆流传、给政治上有好评者的信,薄薄一抄本,并增加一些现成的,主要是给商务印书馆同仁的信,不足 20 万字,张生前交游极广,书信往来极多,后经整理,就上海图书馆保存的原件抄录整理成增订本,约有 100 万字。除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资料,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了由顾廷龙辑集的《涉园序跋集录》,共收录序跋并题记 316 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出版了《张元济友朋书札》,收 51 人来信 139 件。2001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元济日记》索引本。关于张的信札,因其长期的政治、文化生涯,广泛交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积累了大量书札,书札既是知人论世的第一手资料,又是近现代史的最好见证。其内容或涉及清季朝政,或关系国家大事和国计民生,或关系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而更多的则是谈书籍版本及古书流通。

^① 汪家熔.从《张元济书札》说起.出版史料,2004(2):33。

将这些珍贵图书复制、整理、出版的形式很多。例如录存副本，就是传统的“钞书”如通过依缪荃孙氏的介绍，影钞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且专印格纸，悉如原式照印，以存真相。后为傅增湘向刘氏嘉业堂借宋本《诸葛武侯传》及商借各省方志，拟录存副本，以供众览。又如从傅氏借影《冷斋夜话》、《老学庵笔记》、《曲洧旧闻》、《白虎通德论》等，一一钞录副本，俾供流传。这些在《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中都有记载。

这里特别谈一下利用远游域外的机会抄写或影照。1910年期间，张元济环游法英，拟将敦煌经卷钞存著录，因法英当局的限制而作罢。1928年张以中华学艺社名誉会员身份赴日访书，在静嘉堂文库观照宋楼珍藏，计影照北宋刊《说文解字》、宋刊《太平御览》、宋刊《诗集传》、宋钞《群经音辨》、宋刊《名公书判清明集》、明刊《饮膳正要》；自帝室图书寮借照覆印宋刊《尚书正义》、覆印正宗寺本《春秋正义》、元刊《山谷外集诗注》；自福井氏崇兰馆照回宋刊《搜神秘览》；自东福寺照归先生祖九成公著宋刊《中庸说》残本等等，使这些在中土已经失传的秘密再返中原。

为了使这些珍罕书籍流通，不致因万一灾变而失传，张元济发起仿照毛晋刻《津逮秘书》，鲍廷博刊《知不足斋丛书》之例，选印涵芬楼所藏珍秘古籍，编为丛书，题名《涵芬楼秘笈》^①。该出版计划是在1916年推行的，规定了《涵芬楼秘笈》用《知不足斋丛书》模式，分集陆续出版，每一集为线装本八册，包含顾及若干种。印刷方法大多数是用原书或原稿件影印，也有小部分是铅字排印的。1916年9月出

^① 底本来源，如前所述，皆是涵芬楼藏书，但有两书为例外，一是第四集中的《敬业堂集补遗》，乃傅增湘所提供；二是第十集中的《进呈书目》，原书为美国图书馆员在广州购得，孙毓修向之借录，印入《秘笈》。

版第一集。以后每年出版两集,到1921年4月出版第十集为止,共收书51种,印成80册。《涵芬楼秘笈》的“缘起”中说“纸墨装潢,力求精善,使爱古者不至薄今,垂绝者赖以续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顷所能成,因仿《知不足斋丛书》之例,刊成八本,区为一集。岁行月布,以副海内先睹为快之心”,可见其出版之功。

1919年的春天,商务印书馆规划印刷一部巨型的古籍丛书,其要求是:(一)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书中的必要书籍;(二)选定之书皆采用最善之书影印。目的在于解决“旧籍日就沦亡,求书之难”与“流行版本之差”的问题,从此可以“所求之本,具于一编,省事省时”。这就是《四部丛刊》的来由。

它与《涵芬楼秘笈》不同之处,在于《涵芬楼秘笈》是由主观决定选目,将涵芬楼所藏珍希之书加以编印。《丛刊》的选目则是经客观地验定的,依据这个选目进而寻找善本作为底本,于是善本必须求之于公私藏家,各出所储,方能成此大业。经张元济号召后,学界版本目录名流,纷纷响应。于是王秉恩、沈曾植、翁斌孙、严修、张謇、董康、罗振玉、叶德辉、齐耀林、徐乃昌、傅增湘、莫棠、邓邦述、袁思亮、陶湘、瞿启甲、蒋汝藻、刘承干、郑孝胥、叶景葵、夏敬观、孙毓修、张元济共25家联名发布通启,并各出珍藏,择其善本提供。仍有不足,需用南方公藏图书,南京的江南图书馆拥有清季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全部善本藏书,商务印书馆乃于1919年7月到8月间,派孙毓修去驻江南图书馆,查清馆藏中为《四部丛刊》选目中可采用的善本,作出记录,并与馆方负责人士商定借用方法。一切就绪后,《四部丛刊》印制工作在此年年底开始。主要的具体工作都委托孙毓修主持。《四部丛刊》共收书323种,用六开线装印成2100册,至1922年12月完成。《四部丛刊》编有《书录》一册,记载书名、卷数、著者、借自何家所藏何

种版本以及版本的特点和收藏家的印记。该出版工程浩大,《四部丛刊(初编)》于1927年(丁卯年)开始重版,重版本有些书的版本更换了更好的底本,因此种数未变,卷帙上则较初版本略增,而为2112册。1929年印成。重版工作竣事之后,张元济以“涵芬楼储书岁有增益,予取予求,恣其甄择;海内外藏书大家闻有是举,咸欲出其珍异,来相赞助;天府秘藏,名山逸典,骈列纷罗;所得善本,视前殆有过而无不及”,遂进行编印《续编》,摹印之书刚过数百册,而1932年1月,张元济作《辑印四部丛刊续编缘起》,1935年10月又作《辑印四部丛刊三编缘起》,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续编、三编共145种,1000册都出齐。这也是现代学人借助于组织机构的力量从事学术活动的例证。

关于就某图书的出版而进行的来往书信那就更多。例如郑振铎在买定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之后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并为该书的影印出版向张元济提出建议,言辞恳切。“知保存国宝,实人同此心。不知商务印书馆方面有影印此书之意否?因此种孤本书,人不流传,终是危险也。如一时不能承印,则最好用黑白纸晒印数份,分数地保存。不知商务愿否保存一份?”在他们的积极促成之下,在11月3日郑给张的信中说,教育部已经同意接受商务提出的付予1000元版权和送书10部的条件,答应出版。1939年1月17日教育部同意商务提出的合同。^①其间,郑振铎对书反复研究,在1940年1月23日提出,“其中有通用本,可以撤出不印。”这就形成了后来商务版《孤本元明杂剧》。

商务版《孤本元明杂剧》的出版,不仅凝结了郑振铎的心血与汗

^① 汪家熔.略叙《郑振铎与脉望馆钞校本》.江苏图书馆学学报,1998(3):50。

水,商务的出版人同样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与心血。在上海图书馆的特藏部里还保存着张元济和王季烈(君九)关于整理该书的往来信件。张元济在整理、印制期给郑振铎的信有6封,给王季烈(整理人)的信有8封,给丁英桂(平印厂厂长)的便笺26件。张元济在1939年1月4日曾致书郑振铎,说,“其中有通行本,尊意可以撤出勿印者,并祈指示。”原书共64册,242个脚本,后来选未见流传的和虽有流传而与《脉》本有重大差异者144种用排版印刷,3000余页。1941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了线装32册的《孤本元明杂剧》^①,共收剧本144本,其中包括久已失传的孤本136本。从此以后,这些珍贵的古剧就为人们所熟知了。

郑振铎当时不仅为此书奋力撰写了一篇长跋,而且还作了一番整理与挑选,并积极促使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制订出版合同,委托该馆排印出版其中的精华部分,并在具体的校订过程中献计献策。在该书的校订过程中,由于张元济、王季烈、郑振铎三位专家的整理方针并不完全一致,郑振铎极力主张保存原貌,进行影印,在看到一部分王季烈整理稿后也立刻提出意见,致书张元济,信中提出王整理时影响原貌的8点做法应予改正。张在1940年6月27日的回信中说,对原书“不必曲从”;“原书未分大小字,此间分,不会错”,“似无可虞”;

^① 郑振铎对此书一直很关注。该书初版正值战火纷飞,仅印350套,很快脱销。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又根据商务原版纸型重印,钉成平装4册,流传更广。1949年之后,郑振铎主管社会文化、文物工作,兼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组织了“古本戏曲丛刊委员会”,陆续影印了各图书馆和专家所藏罕见曲本,供戏曲工作者研究,名为《古本戏曲丛刊》。具体的印刷工作由商务印书馆担任,并点名要丁英桂主持,第一集1954年出版,《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全书262种收入第四集,于1958年出版,圆满地实现了他20年前将其影印的愿望。这套书的出版工作得到了郑振铎的高度关注,每册订样他都亲自检查无误签字后才能出版。包括影印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在内的签字样书,现在完好地保存在商务印书馆。

加注曲牌名“当不致误”；“原字无可留之价值，不敢勉遵”；“鄙见以为应当一律”；“前人校笔中浓圈密点者鄙见以为应当删去”；“王君所加跋，仅见一种，不能遽决”；只有反对王将原剧重新分析一条，答应“谨转达王君”。

总之，或买书，或搜书，或呼吁当局，或出版印行，现代学人们利用各种途径在抢救图书，保存文化的血脉，民族的灵魂。

第二节 郑振铎与图书抢救运动

本节以郑振铎为例具体谈谈在文献即将毁于兵燹战火的危急时刻，现代学人们利用书信沟通信息，通力协作，建立组织抢救了大量宝贵的文献。在写作过程中也尝试使用大量书信材料作为证据，以“信”证史。

一、郑振铎“为书籍的一生”

郑振铎先生 1898 年生于浙江永嘉，原籍福建长乐。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郑振铎先生 1920 年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 年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 年回国后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

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郑振铎的一生可谓是“为书籍的一生”、“爱书籍的一生”。他热心搜集中国古籍，考订各种珍贵版本，为了搜集散佚的珍本古籍，他四处求访。他个人的藏书（中文线装书和外文书）达到17224部（计94441册），而且多为有价值的珍本、善本。在他去世后，由家属将其藏书全部捐给了国家，这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抢救祖国文化遗产最好的见证^①。更为可贵的是在上海的“孤岛”沦陷期间，他抢救了大量的民族文献，“当郑振铎他们一举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藏书及群碧楼邓氏藏书后，引起书贾震动，迅速扭转局势，甚至反而使书贾们将北方的古书拿来让售。这样便有效地从敌伪与外国人手里夺下了大量民族文献。此后陆续购入的大户，就有嘉业堂刘氏明刊本1200余部，及蕴辉斋张氏、风雨楼邓氏、海盐张氏、涉园陶氏等家在上海的部分珍品和南洵适园张氏的全部珍品。一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工作被迫停止。虽然前后不到两年时间，但这是极关键的两年”。他们抢救的古籍善本约4000种，可抵得过当时北平图书馆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善本总数，其中80多种珍品于1941年7月辗转运往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到这批书后，曾开了次展览会，轰动一时。

关于这段历史记录有如下一些重要参考资料：首先是郑振铎的

^① 参见郑尔康所撰写的《勤奋、俭朴、不断进步的一生：忆我的父亲郑振铎》。载于卢今等编《郑振铎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书信集,这些珍贵的书信为研究提供了最原始、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主要包括刘哲民编的《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 1984 年 2 月版),刘哲民、陈政文编的《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郑振铎书简》“汇集了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于 1947 年 2 月至 1958 年 5 月,致原上海出版公司负责人刘哲民的信,共 167 件。信件内容广泛,涉及文化出版工作、对历代艺术珍品的研究以及思想修养等方面,是很宝贵的资料。并附与信件内容关系密切的几篇序、跋和编辑出版计划等。信件和文章等,都保持原来的面貌。为了便于理解,请刘哲民同志加了若干简要注释,并撰写了《回忆西谛先生》一文”^①。

在 1988 年,还出版了《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影印本,刘哲民这样评价,“虽然在素材的收集尽了一点力量,但在编辑工作方面却出了不少的讹误”,“我觉得这部影印本印得不理想;而且对研究者来说,既不能普及,又是力有所不逮。”^②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于是决定印行“繁体字铅印单行本”,也就是《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共收入郑振铎先生自抗日战争初期至 1957 年 11 月期间,致张咏霓、赵景深、张元济、唐弢、夏鼐、郭宝钧、苏秉琦、顾廷龙、徐森玉、刘哲民、徐伯郊、梁思永、郭若愚等人的信,共 384 封。分别收信人,按时间先后排列。文字均保存原貌。只对个别笔误等错漏作了订正”^③。该书为繁体竖排,可能是出于编者便于海内外交流的初衷,刘

① 见《郑振铎书简》一书的《出版说明》,该书卷首附有 1952 年 1 月 31 日郑振铎给刘哲民的信的手迹第 1—3 页(全信共 10 页),可供参考。

② 刘哲民.前言,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1。

③ 见《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一书的《出版说明》。

哲民在《前言》中这样写道：“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读到了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字慰堂）先生的《珍帚斋文集》书中载有抗战时期他为政府组织抢救版本古籍的经历。因而我想到‘书信集’，如果能在台湾印行，就可以和当年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具体从事抢救工作的两方面配合起来，那几成了抗日战争史上我国教育界抢救祖国版本图籍的完整材料，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① 这部书信集搜录的书信相当全面，“在编辑郑振铎先生致张咏霓先生书信时，尔康（郑尔康，郑振铎先生的儿子——笔者注）又以编辑《郑振铎文集》收集到的郑先生致其他友好的书信见贻，因而一并编入本集”^②。与张元济的信，已在《张元济友朋书札》（商务印书馆）中印出，因其中有关也是园（即《脉望馆钞校本元明杂剧》）的收归国有，香港陈澄中的善本入藏北京图书馆等和本集其他书信有互相引证关系，也一并收入。^③ 郑振铎写给刘哲民的信，已编有《郑振铎书简》，这里收录的，为唐弢收藏而未编入《郑振铎书简》的。

其次是郑振铎的日记也是记录这段生活的珍贵材料，《求书日记》正是郑振铎从1940年1月4日至2月4日的日记^④，抗日战争胜利后，连载于1945年11月、12月份的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

① 刘哲民.前言,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2。

② 刘哲民.前言,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7。

③ 尤其陈澄中为著名的版本收藏家,当时在国内与周叔弢齐名,有北周南陈之誉,他所藏版本古籍能争取归来,是特别引起专家关心和重视的。郑振铎在徐伯郊收购到陈澄中的善本后,认为从此善本图书的收集工作,除了存在台湾及美国者那里的之外,可以告一段落了。

④ 郑振铎.求书日记.选自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求书目录》所记的是“书事”，同时也是惊心动魄的战争，争夺文化资源，抢救民族血脉的战争。另外，20卷本的《郑振铎全集》也为本节写作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面对劫火中许多极为珍贵的古籍珍本、民族文献正在受到掠夺、搜买、毁坏的时候，郑振铎一开始所采取的方法是倾自己的全部资金收购有关古籍，但是个人的财力实在不够，于是借助国家的力量保存重要的民族文献，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与《孤本元明杂剧》的出版是他为国家收书、并将之整理、出版的开端。《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是我国古代保存下来最大的一部戏剧总集，共有元明杂剧242本，其中有一百多种是仅见的孤本。这部巨著隐晦了近300年。先是王国维曾发现明黄丕烈旧藏《元刊杂剧三十种》上题有“乙编”二字，因此推断，必有“甲编”，可能还有“丙编”、“丁编”等。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发表了丁初我《黄尧圃题跋续记》，透露其曾见过《古今杂剧》六十余册，郑振铎立即去信查访，对方却含糊其辞。“八一三”战役之后，当他得知钱遵王《也是园书目》所载的元明杂剧剧本在苏州地摊上出现，“高兴地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吧”^①。书贾索要万金，1938年5月，郑振铎一面托人继续接洽，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千方百计通过在重庆的教育部工作的友人促使有关当局收购了极其珍贵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包括242种元明杂剧，一半以上是失传的孤本）。

教育部回电决定要购置，后来以九千元成交。在《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郑振铎这样评价该书：

^① 郑振铎.《求书目录》.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29。

这宏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发见,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中再次指出:

肯定的,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发现。^①

至今再读他所写的《求书目录》的时候,仍能感受到他抑制不住的狂喜之情,“在这样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我竟发现、而且保全了这未重要、伟大的一部名著,不能不自以为踌躇满志的了!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这部不朽的宏伟的书,隐晦了近三百年,在三百年后的今日,终于重现于世,且经过了那末大的浩劫,竟能保全不失,不仅仅保全不失,且还能印成问世,这不是一个奇迹吗?”

^① 转引自陈福康《郑振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32。

二、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

为国家收购孤本元明杂剧,是郑振铎抢救文献的开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一计划的,有组织的。”^①

上海沦陷之后,郑振铎没有选择离开上海,他不仅几乎停止发表文章,甚至还闭门谢客。被坏人诬陷和造谣,被朋友误会和怀疑都不要紧,为了不让敌人发觉这一工作,郑振铎决定除了少数几个与此事有关的人员,对外严格保密。在书贾面前,他们只打着为光华大学、暨南大学等单位购书的名义。连最亲密的朋友,不管是内地还是上海,都没有告诉他们。叶圣陶在《西谛书话》序中感慨地说:“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

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

^① 郑振铎.求书日记.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35。

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持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挑选。^①

当时情况危急,关系到民族文化血脉的存亡续存,正如郑振铎所说:“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机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1940年1月5日,他与当时留在上海的张元济、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等人商谈,联名致电重庆政府,“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希望由政府来帮助做这一工作。“我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像张菊生、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②。

不久得到陈立夫、朱家骅覆电同意,电文有二^③,全文如下:

何张夏郑先生均鉴歌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钦佩现正遵嘱商
进行谨此奉覆弟朱家骅叩

张何夏郑六先生大鉴歌电奉悉诸先生关心文献创议在沪组

① 郑振铎.求书日记.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33。

② 郑振铎.求书日记.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37。

③ 朱家骅陈立夫来电抄件注(二).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2。

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语重心长钦佩无既惟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由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谨此奉覆伫候明教弟朱家骅陈立夫同叩

其中,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长;陈立夫,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何张夏郑”指的是何炳松,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凤举,考古学家,版本收藏家。郑振铎,当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教授。由此,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郑振铎、张凤举等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①。政府也相当重视此事,派当时的中央图书馆的馆长到上海与他们秘密见面,据郑振铎 1940 年 1 月 14 日记载,“……上午,柏丞(即何炳松——笔者注)先生来,说起蒋复璁^②来此,系为了我们上次去电,建议抢救、保存民族文献事;教部已有决心,想即在沪收购,以图挽救……”。1940 年年底,教育部又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字森玉)问道来沪。徐为国内著名文物、版本鉴定专家,除负有使命外,并留沪协助鉴定收购善本工作,对运送图书去香港转赴内地多有劳绩。

^① 郑振铎在 1940 年 1 月 16 日的日记中说:“晤柏丞先生,谈及购书事,已决定由菊生、咏霓、柏丞、凤举四位及我负责。”见求书目录,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51。

^② 蒋慰堂,名复璁,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后为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在 1 月 16 日的日记中,郑振铎描述了和蒋的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畅所欲言,有如老友。他说起,这次战事中中央图书馆的损失;说起内地购书的困难,说起将来恢复的计划;说起内地人要他来此一行的原因,然后谈起我们的去电事。……”

文献同志保存会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包括：

1.明确分工,制定办事细则

热忱的爱国之情、高度的责任心,与明确的分工管理保证了其工作的高效率。文献保存同志会开始拟推举张元济主持其事。因为他因病力辞不就,之后转推张咏霓。他们五人也进行了明确分工,“凤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①,而充满丰沛热情的郑振铎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予生性多事,恐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

同时,为了让“文献保存同志会”正常运转,订立办事细则。在郑振铎 1940 年 2 月 4 日写给张寿镛的信中附有《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②,共 7 条。

《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

一、本会设办事处一所,以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二人组织之,办理图书点查、登记、编目及装藏事宜。

二、凡购买图书每部价格在五十元以上者,须委员全体签字通过。

三、各委员购买图书,无论价格多少,均须先进行开单知照办事处查核登记,以避重复,再由办事处以书面通知各委员征求同意。

① 见郑振铎 1940 年 1 月 19 日日记,求书目录,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55。

② 郑振铎 1940 年 2 月 3 日致张寿镛信中已提及,“办事细则已拟就,现送菊老一阅,明后日即可送上”,2 月 4 日信中说,张元济已经阅过,来信云,“办事规例 10 条已读过,甚周密。命名只对内不对外,字无可无不可。弟前声明不与于办事之列,故为能遵命署名于上。”

四、办事处应每二星期将所购图书开列清单及价格送交各委员存查。

五、重要之宋元板及抄校本图书在决定购买之前,应分别延请或送请各委员鉴定。

六、各委员需要抽查或检阅某项图书时,办事处应于详细登簿后送去,收回时并应即行销号。

七、购得之重要图书,于登记、点查、编目后,即应由委员一人或二人负责督同办事处人员装箱封存寄藏于慎密保管库房中,每箱均应详列图书清单一纸。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经费来源是“当时中英庚款董事会存有中央图书馆建筑费一百数十万元,因战时无法建筑,而币值正迅速贬值,于是决定用来购书”^①。在经费的使用上,他们也认真规划^②。在收购图书的过程中,在不断强调为国家购书的原则。在1941年1月6日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第6号工作报告》中,“近来与森公连日商榷决定:除普通应用书外,我辈购置之目标,应以:(一)孤本,(二)未刊稿本,(三)极罕见本,(四)禁毁书,(五)四库存目及未收书为限。其他普通之宋元刊本,及习见易得之明刊本,均当弃之不顾。而对于‘史料’书,

^① 见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5.

^② 即使在收购图书的过程当中,币值贬值,书价也在大幅上涨。在1941年4月16日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第7号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今岁之价,较之去岁,已大不同;明日之价,较之今日,恐又将异。普通应用书,所涨最巨。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务售至一千七百元,《四部丛刊初编》,市价已达二千金。我辈于去岁购得此书一部,不过费九百数十金耳。故将来用款百元,仅能抵得过去岁之五六十金而已。”

则尤当着意搜罗,俾成大观。总之,以节省资力为主;以精为贵,不以多为贵;以质为重,不以量为重。”

2. 进行有关图书的收购。

文献保存同志会自1940年1月成立后,他们立刻投入到实际的工作——收购图书当中。在他们1940年1月19日在张元济家中的聚会^①中,确定“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同时,郑振铎力主,“购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就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仿黄尧圃诸藏家的办法,多端收书”。这与其他人的意见“总以注意大批的收藏为主”稍有分歧。最后,仍达成一致意见,“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②

文献保存同志会以国家的力量收书,从事“抢救”文献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仍需秘密从事,“至张咏霓先生处,商谈购书事。他提出两点意见:(1)对外宜慎密;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名义购书。(2)款宜存中央银行。”^③以个人或暨大、光华及涵芬楼名义购书,与书贾们接触。

在与书贾的接触、收购过程中,郑振铎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了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余

① 郑振铎在1940年1月19日的日记中说,“正午,与柏丞先生同赴张宅。慰堂、凤举二位亦到。谈甚久”。

② 此段可参考郑振铎在1940年1月19日的日记.求书目录.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55。

③ 郑振铎在1940年1月19日的日记.求书目录.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55。

时间,都投入到抢救工作。他整天接待旧书商,书商们送来的版本图籍,他一一亲自过目,进行鉴定、论价。每天收购的图书都要经过点查、登记、编目、装箱、运送。贮藏另外有工作人员,但他还要一一检点。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意外,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相当繁重。他在《求书目录》中这样描述这段生活,“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没有铺子的捐包的书客,我也一律地招待着。”与书贾们的接触和合作,使郑振铎对于书贾们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敬佩,“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书贾们的爱国决不敢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所以不必责之以大义,他们自会自动的替我搜访罗致的。只要大公无私,自能奔走天下。这教训不单用在访求古书这一件事上面的吧。”^①

在具体的收购方法上,郑振铎也有自己的方法,他注意收集书目,研究各藏书家之藏书目录,并编有收书目录,以书目指导古籍收藏。他不仅将已购书编有“善本目”,还编有“征访目”。“征访目”大致以《四库标注》、《邵亭书目》、《四库存目》及《贩书偶记》为主,先行剪贴成为一“总目”,并就见闻所及加以补充;然后在此总目上,随时将已

^① 求书目录,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31。

购之书注明,这样所缺何书,应购何书一目了然。^① 利用书目,事先可剔去重复之书,事后补购落选之书。他在购书之前,均取藏书家书目细审。沈氏海日楼书目、刘氏嘉业堂书目、邓氏风雨楼书目等一一仔细考察、研究,有些还亲自登门翻看图书。他认为刘晦之藏书中只有九种宋版书为善本库中“甲”中之“甲”者。^② 其远碧楼之藏书规模虽大,但“择焉不精,所收每多下驷,庞杂无伦。仅知充目,诚非藏书家之藏书也,更不足以语读书者之藏书”^③。有了这些版本目录学上的深刻认识,在收购其藏书的时候也是择其精华收入,“则远碧之藏,大可弃而不顾矣”。(可参考下表)

郑振铎深受黄丕烈收书方法的影响。黄丕烈曾经说过,他对于书商带着书找上门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惊奇的发现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

下表为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主要藏书楼文献。当时,他们抢救得到的典籍,分为三部分:其一是“首先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之古书 80 多种,由徐森玉先生运往香港,再由香港空运至重庆,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其二是明刊本、抄校本等典籍约 3200 部。这些书初拟通过美国大使馆将它作为外交文件运往香港储存,后因故费时两月陆续由邮局运抵香港,由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寄存在香港大

① 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132。

② 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127。

③ 郑振铎,西谛书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78。

学。根据蒋慰堂先生在《珍帚斋文集》中所记,这部分书抵香港后,他请示陈立夫,经同意觉得在港一一在书上盖章后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不意费时三月,书未运出,发生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这批典籍尽为日本劫去。日本投降后,蒋慰堂亲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80余箱全部归还我国。1948年国民党政府败退,便将这批珍贵典籍全部运往台湾。第三部分书籍,原分藏于上海几处地方,最后全部归还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觉园法宝馆内(觉园为佛教居士的一个社团,也是后期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办公地点——笔者注),抗战胜利后,这批书究竟由北京图书馆还是南京中央图书馆接收,不详。^①

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主要藏书楼文献^②

藏书楼	简介	收购过程
刘氏玉海堂	刘聚卿,安徽贵池人,收藏甚丰,最珍贵的是两部“玉海”以之命名藏书之所。其中有一部元刊本《玉海》,一部宋刊《魏书》,都是玉海堂的镇堂之宝	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后首次较大规模抢救的就是玉海堂藏书。1940年2月初,商定购书款为1.7万元并付了3000元的定金,2月底全款付清取书

^① 刘哲民.前言,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6。

^② 参考《略论郑振铎在抢救祖国文化典籍上的巨大贡献》编制,内容有增删修改。李性忠,略论郑振铎在抢救祖国文化典籍上的巨大贡献.图书馆论坛,2001(2):88。

续表		
藏书楼	简介	收购过程
邓氏群碧楼	邓孝先,江苏江宁人,1904年开始大量收藏图书,1911年编印的《群碧楼书目初编》九卷计收录藏书24964卷,以宋元古本和明代嘉靖刊本为两大特色	1940年2月,郑振铎得知群碧楼藏书被古旧书商收购后,立即与书商沟通,要来了书目进行圈选,还亲自抄写拟购书目交同志会诸人传阅。以3.15万元成交,计得1100余部,1.6万册左右,其中善本约300部
沈氏海日楼	沈曾植,浙江嘉兴人,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之学。沈氏藏书分藏上海、嘉兴两地,收藏的宋、明刊本有不少为天一阁旧物,绝佳,尤其是数十种明刊本,大都极罕见	1940年8月间,郑振铎见到沈氏书目,得知沈氏后人愿拆售,即着手选择分批购买,使海日楼精品尽为国家所得。对沈氏收藏的普通书郑振铎亦不放心,数次到书店目验,生怕有好书从手中流失
邓氏风雨楼	邓实,广东顺德人,光绪晚年迁居上海,其风雨楼藏书以清代焚、毁、禁者为特色,别具一格	1940年8月11日,陈乃乾过访郑振铎,表示出让邓氏藏书之意。郑振铎认为邓氏藏书中明遗民著作最多,抄本部分尤佳,可补充同志会已购各批书之不备者不少,遂购下全部书籍,计750余部,9000余册,费金3.15万元
刘氏嘉业堂	刘承干,浙江湖州南浔镇人,民国时期国内私人藏书家中的巨擘,其一手创建的嘉业堂全盛时期藏书18万卷,57万册,以明刊本与稿抄校本为菁华。由于经济难以为继,藏书于三十年代开始散出	1940年初,刘承干向外界透露了大规模售书的意向,引起郑振铎的高度重视,他拟定了全购、选购两种方案,圈选书目,并用了十几天时间到刘宅阅书,鉴定版本,决定取舍,最终选定1200种明刊本与36种稿抄本,以25万元成交。1950年11月,刘承干将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及留存的藏书、书板连同各项设备悉数捐献国家
刘氏远碧楼	藏书楼主人,刘晦,所藏宋刊等书,是其特色。经过筛选,同志会选择了宋刊本《中兴馆阁录》、《中兴馆阁续录》(黄跋)、宋刊《新定续志》(黄跋)(此三种是志书中的国宝),宋刊本《唐僧弘秀集》(清宫旧藏),宋刊本五臣《文选》(孤本),宋刊本《广韵》(《四部丛刊》之底本),宋刊本《礼记》(天一阁旧藏),元彭寅翁刊本《史记》(此书各家皆残,此独完整),汲古阁刊陆氏《南唐书》(黄顾合校并跋),士礼居抄本马令《南唐书》(黄校并跋)	共5.3万元。另抄本《圣济总录》160册,3000元成交。刘氏藏书之精华,已全在此

续表

藏书楼	简介	收购过程
瞿氏铁琴铜剑楼 ^①	瞿氏铁琴铜剑楼,清代以来,江南著名藏书楼之一,虽因战事频仍,累经散失,但运至上海保存的藏书仍很可观。不少是书中珍品,如宋板《毛诗注疏》、《宋书》,元版《中峰和尚广录》,明洪武本《元史》等	郑振铎与瞿凤起数度面晤恳商,又亲自到瞿家阅书。瞿家表示:“如若售书,必给郑,不交坊贾。1940年间,经郑振铎之手收购的瞿氏藏书在60种以上。郑振铎认为应将铁琴铜剑楼藏书全数收购,但因经费有限,瞿家亦无全售之意作罢。1950年,瞿氏兄弟将所藏宋元槧本及抄校本52种1816册捐献给国家,将另一些善本作价归公
张氏适园	适园创办人张钧衡,浙江湖州南浔镇人,藏书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1916年张氏编的《适园藏书志》收录宋本45部,元本57部。1941年其子张乃熊编善本书目时,宋本增加到88部,元本增加到74部,明本达407部。张钧衡还曾大批搜藏诸如朱学勤结一庐、张蓉镜小琅圃福地、吴騫拜经楼、顾沅艺海楼等家旧藏抄本,杨守敬在日本传抄的流传海外的孤本,有13部转让给了适园。其所藏黄丕烈校跋本101部尤为人所重视	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郑振铎就密切关注张氏藏书动向,一方面力争经费,一方面多次与张氏家人接触。除一些清代刊本和吴兴乡贤著述外,1941年10月底终以70万元全数收购。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抢救活动以成功收购张氏藏书而降下帷幕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五位学者,在学术上各有专长,也多为藏书家(如张元济、郑振铎等),收藏图书的兴趣各有不同,但在他们收书的过程中,始终以“国家图书馆”的标准衡量之,在文献的选取、收购上不以个人趣味为标准,为国家收购、抢救了大量珍贵文献。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第4号工作报告》中这样写道:“……然窃谓国家图书馆之收藏,与普通图书馆不同,不仅须在量上包罗万有,以多为胜,且须在

^① 清末四大藏书家的藏书之一,与之齐名的杨氏海源阁已散佚,丁氏八千卷楼归江南图书馆,陆氏皕宋楼更漂洋过海,流入日本。

质上组成为国际观瞻之目标。百川皆昭宗于海,言版本者必当归依于国立图书馆。凡可称为国宝者,必当集中于此。盖其性质原博物院之同流也。”“此一大事业能在‘抗建’时期完成,则诚是奇迹之奇迹,不仅国际间人士诧异无已,即子孙百代亦将感谢无穷矣!”^①在收书的过程中,在多收好书,标准不宜过刻与相对紧张的经费矛盾中掌握着平衡:

敝意为中央图书馆购书,应务其远者,大者,不能以小规模之普通图书馆为满足。对于中文部分,至少须有五六百万册,始可应有尽有,细大不捐。(若伦敦博物院之例)且不仅求备,亦应求精。盖国家图书馆原有保存国宝之义务与责任也。我辈工作,方在创始。将来续款到齐时,不妨放大眼光,多购奇书、罕见书。我辈与敌争文化遗物之目的,原亦在此。至《书目答问》中物,如购齐,价亦不多。尽可有。余力从事于此保存工作也。近来古书益罕,益昂。将来之患,不在于缺款购书,恐将在于无书可购也。我之工作,近全在邀致书贾们为我辈收书;俾好书不漏失,此项工作已有相当成绩。然已费九牛二虎之力矣!我辈收书,固不可浪费;然亦不宜过刻。盖刻则将无书可见矣。现在情形仍如过去,我辈不收之书,欲收之者大有人在。此一点似须注意及之。^②

语重心长,也相当有长远宏观的文化眼光,显示了以郑振铎、文

^① 陈福康整理.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出版史料,2004(1):107。

^② 郑振铎致张咏霓 1940年8月8日信.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130。

献保存同志会这些学人为代表的文化情怀与学识见地。在为国家收书的过程中,他们甚至忘却了自己的收藏,“我殚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他们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图书馆的收藏是为了大众的及各种专家们的。但收藏家却只是追求于个人的癖好之后,所以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顾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骛,不杂取,不兼收并蓄,但为图书馆收书时,情形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由于收藏目的的不同,为国家图书馆购书与凭借个人兴趣的购书区别很大,他们在购书原则上也在不断地调整。

3. 编目、影印、整理装箱、运输等日常工作

由于收购图书的数量较大,所以日常工作的开展也相当艰巨。首先是编写书目的工作量就很大,“敝处所编书目现分三种:(一)购入各家之原来书目,均录留副本,对于各肆之书已购入者亦然(以一肆为单位);(二)各箱书目,分别‘甲’、‘乙’、‘丙’三种;依箱号为次第,俾每箱内储何书,一检即获,此种‘目录’亦录有副本;(三)分类书目,先写卡片,然后分别部类;此项目录,分为两种,一为善本书目,一为普通书目。原来乙种善本,提一部分入‘善’目,一部分则编入‘普通’目中。第一项书目,已誊清甚多,将以告竣;第二项及第三项书目均在编写中。陆续写成,可告一段落时间,即当将副本奉上,以供稽考。此项分类书目编成后,即可进一步编一‘征访目’(不公布),择已购书目中之未备而重要者,设法购置,以资补充。如‘史料’书,如丛书,如‘书目’,则以多多益善为宗旨,如此,每月所费不多,而所得则必甚可观。”并要求保密,“收到后,除诸股东外,尚祈秘之,不可任人借钞,以免漏出,至盼,至感!盖此点关系甚大;如漏出,或将惹起意外之是非

也。为慎重计,不能不守密。”^①此后店中工作,当集中于编目。五月份内必可陆续将“善目”先行编就,分批寄上。(每批约30张,约共有10批)此项书目,除诸股东外,乞勿传观为盼!^②

其次,影印。影印工作有些可以依靠与出版机构的合作,有些不宜出版的则只能由日常开支负担此项工作。“此间诸友均主能将孤本、善本付之影印传世,我辈亦有此感。惟石印甚不雅观,宋本元槧,尤不宜付之雪白干洁之石印。至少应以古色纸印珂罗板。……《吴郡图经续记》等,篇幅不多,或可试印一二种,如何?(名义为:□□□□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种),惟选纸择工,未免较费时力耳。此项工作,商务恐未必肯担任。或可在每月经费中撙节为之。”“关于‘史料’书,因篇幅较巨,工程较大,却非交商务印不可。前函拟印之《晚明史料丛书》,或以为过于萧瑟凄凉,非今所宜,不妨扩大范围,自汉以来,迄于太平天国,先选五六十种,作为‘史料丛书’,以影印为主,大都皆未刊稿本,或明刊罕见本,似于读者更为有用。(约先出百册)不知商务能担任否?兹先将已拟定之《善本丛书目录》附上,乞决定。”文献保存同志会积极与出版机构与其领导机构中央图书馆沟通,以完成该项工作。

4. 运输

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就是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运出日统区。“……运输中断,无法寄递。所有尊处亟需参考之目录金石等书,及《大藏经》等,均已装箱,专待寄出。……大函云可派专人带上,但敝处

① 第7号报告,陈福康整理.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出版史料,2004(1):107。

② 第8号报告,陈福康整理.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出版史料,2004(1):107。

实无人可派,且费用亦极巨,将来或可托便人,分批由滇越运入(闻滇越路旅客尚可通行),先藏昆明,由昆明运渝,便易于设法了。现时藏书之所,已无隙地,将来续购,势非另行觅屋不可。惟此间房租日逐昂贵,经常费用恐要增加不少,(现用编目二人,理书者一人,书记一人,茶房一人,共仅二百元)已购各家书目,已另雇一人陆续以复写纸誊写二份,除尽先寄一份至尊处外,并存一份在敝处(分批作信件寄上)”。中央图书馆方面也派人出面解决运输问题。“丁、陈二先生^①业已动身,想不日即可相晤,携上之书,共计二十箱,皆关‘目录’之书”。又,“关于运货事,与森公日在设法中。惟运输困难,日益加重。自当于万难之中,设法运出,以期不负尊望。或当先行运港,再作第二步之打算。现在存货所在,皆甚谨慎,无虞水火,堪释远念。”这些报告中的情景再现了他们为了文献保存所做的种种努力。

另外,文献保存同志会还定期向中央图书馆递交报告,报告收购图书的进展情况,详述购书的渠道(自哪里、经何人购得),书名、种类、册数、价格^②等,有些还另外介绍其版本价值,起到备案及接受监督的作用。由陈福康先生整理的《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全部9份报告分两部分刊登,《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三份)刊登于新刊《出版史料》2001年第1辑上,《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刊登于《出版史料》2004年第1期上,分别为《文献保存同志会第4号工作报

① 郑振铎1941年3月19日致张寿镛信:“丁衣仁君又已决定动身西行。此君为何先生(即何炳松,笔者注)北大时代之学生,与慰堂同学,此次赴渝,系就中央图书馆之某职务。”陈,陈颂虞。陈福康整理,《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出版史料》,2004(1):102—124。

② 参考其价格时,应注意报告中为保密起见,所标注的价格有些为原价格的十分之一。

告》(1940年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5号工作报告》(1940年12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6号工作报告》(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7号工作报告》(1941年4月1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8号工作报告》(1941年5月3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9号工作报告》(1941年6月3日)^①,这些报告洋洋万言有余,可以说是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工作“月”志,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国家高度的责任心与忠诚。

总之,他们在具体的收书过程中,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坚贞坚苦到底,自不至于有人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于浪费公款一毫一厘;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如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②

管理也很严格,涉及钱款,相当谨慎。因此,当年故宫博物院古物

① 具体可参阅陈福康整理,《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出版史料,2004(1):102—124。

② 1940年3月20日郑振铎给张咏霓信,可以见到他们当时买书之艰辛与甘苦,及对国家之忠诚。见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24。

馆馆长、著名文献学家徐森玉在 1941 年 1 月 20 日致当时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信中,也谈到郑振铎等“网罗遗佚,心专志一。……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

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文献保存同志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 1940 年 1 月 10 日起,迄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止,“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救版本图籍整整工作了两年,购买善本古籍 3800 余种,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当时北平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善本图书目录 4 册,藏馆善本书目却仅 3900 种。他们两年内所购善本图书差不多相当于北图原藏善本之数。“在这两年里,我们确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献。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和‘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①

三、关于抢救图书的学人书信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后,他们立刻投入到实际的工作当中,书信往来成为他们传递信息、互相商量的主要渠道之一。“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信札叠起来总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部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②因此,在这期间,郑振铎与张咏霓之间的信件保存得最为完整。在《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中收录了郑致张的信件

^① 求书目录,郑振铎 1940 年 1 月 19 日日记.求书目录,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② 郑振铎.求书目录.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38。

270 通,时间从 1940 年 1 月 10 日至 1941 年 12 月 5 日,不足两年时间,基本上两三天就是一通信,有时候更是一天两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了 27 通书信。据《光华大学与张校长》中注文:“在郑先生逝世前,由张氏后裔归还郑先生。”1958 年郑振铎去世后,其家属将藏书捐献给国家,连带这部分书信也入藏北京图书馆。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记录文献。同时,这些书信中对各种图籍的鉴别、分析、论断都非常精辟,事关版本、目录学,足供参考和研究。

除了郑振铎与张咏霓之间的通信,文献保存同志会之间的通信也相当频密,只是因为保存下来的资料较少无法呈现原貌。现仅以《张元济年谱》中的记载,简单勾勒一下郑振铎与张元济之间的通信:

时 间	内 容	备 注
1940 年 1 月 22 日	详述苏州刘晦之玉海堂藏书情形。并告知因购书款须俟蒋返回重庆后,才能汇来,尚不能与书贾有具体的商谈和决定,只能能力阻其不散售	郑致张
1940 年 2 月 4 日	“办事规例 10 条已读过,甚周密。命名只对内不对外,字无可无不可。弟前声明不与于办事之列,故为能遵命署名于上。”	张致郑
1940 年 2 月 23 日	谈收购清人文集及《仁宗大事档案》、《海左地图》等书价格事	张致郑
1940 年 3 月 9 日	谈收书事	张致郑
1940 年 3 月 13 日	谈收书事	张致郑
1940 年 3 月 20 日	郑询翁文恭校本书三种,索价 500 元,拟购否。张建议不收,并感叹近来书价之昂	张致郑
1940 年 5 月 21 日	托抵香港后与叶恭綽转商,请叶出面与上海法宝馆主持范成法师交涉,维持文献保存同志会办公用房,用于办公及堆书用	郑致张
1940 年 6 月 5 日	返沪后,致书郑,约来寓一谈,并云玉虎(即叶恭綽)先生有一函交法宝馆董事会	张致郑
1940 年 6 月 29 日	郑征询刘晦之宋版书九种当购否。张认为须购,惟嫌价昂	是否有信,不确,推之
1940 年 8 月 8 日	郑等拟就所购书中善本托张存于银行保险库,约期会晤,当日复告以染恙不能外出	张致郑,此事后果

续表

时 间	内 容	备 注
1940 年 9 月 5 日	谈收书事	张致郑
1940 年 10 月 15 日前后	询问收购张芹伯适园藏书“成交与否”。	张致郑
1940 年 10 月 15 日前后	告以善本书运出之前,拟将要印行“丛书” ^① 之一部分重要图籍及其录副之孤本,托商务先行摄印一部分底版保存,征询张意见	郑致张
1940 年 10 月 18 日	拟出售自藏宋版《荀子》一部	张致郑
1940 年 12 月 2 日	郑告之有袁昶友朋函稿 12 册,索价 1000 元,“此书关系颇大,且系编年者,于近代史料大有关系”,张亦颇为关注	是否有信,不确,推之;时张在病中
1941 年 3 月 31 日	谈收购嘉业堂藏书事,提及书目多种	张致郑
1941 年 4 月中旬	郑托施韵秋送嘉业堂藏钞校本 36 种,送张估价。张复函,力主速购 ^②	

在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的时候,张元济先生已经是 74 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仍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当中,除去外出、卧病^③的期间,他与郑振铎书信不断,传递着各种关于古籍文献的信息,彼此交换意见。并且经常见面,进行书籍鉴定工作。他因病辞同志会的领导之职,仍积极承担起同志会原先商定的“鉴定”之责,并三次将自己藏书中的精品转让给国家。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同志会的工作,现根据《张元济年谱》与《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简单追溯一下张元济与郑振铎之间为了抢救文献而进行的接触,与上表对应,可以基本了解他们在这一时间段的主要交往活动。

① “丛书”即《玄览堂丛书》,收明人著述课本、抄本 70 余种。1941 年 6 月,第一集 34 种由上海精华印刷公司影印出版。后二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影印。

② 张复函,“如今法币价值跌落,书价当可涨至原价十倍”。经努力,流入书贾之嘉业堂藏明刊本 1200 余种,连同此项目钞校本 36 种,以 25 万元成交。

③ 1940 年 12 月至 1941 年 2 月间,张发热,住院,进行了两次手术,2 月中旬才出院返寓所休养。

时 间	事 宜	备 注
1940 年 3 月 3 日	由郑振铎陪同至孙伯渊处看苏州邓氏群碧楼藏书。后与郑商定拟选购 100 余种	
1940 年 3 月 17 日	郑来,送呈刘晦之藏季辑《唐诗》底本一函,请鉴阅	
1940 年 3 月 19 日	郑来,送呈弘光刊《雪窦寺志略》及《寓山志》二种,请鉴阅	
1940 年 3 月 25 日	郑来,将孙伯渊标列邓氏群碧楼各书价格送呈现审定	
1940 年 4 月 23 日	郑来,送呈铁琴铜剑楼藏书数种及北平修绠堂书数种,请鉴阅	
1940 年 5 月 16 日	郑来,送呈北平修文堂孙贾交来明抄本《皇明宪录》、旧钞本《圣宋皇佑广乐图记》二种,请鉴阅	
1940 年 6 月 7 日	郑来,交以叶恭绰致关扃之、范成等信	
1940 年 7 月 1 日	郑来,交朱家骅重庆来电,言划汇购书款事	
1940 年 7 月 21 日	郑来,送呈朱家骅来电,电云将已购善本运美保存	
1940 年 7 月 26 日	郑来,将何炳松拟就复朱家骅电文呈阅定	
1940 年 8 月 5 日	郑来,送呈拟购嘉业堂藏书数种,请鉴阅	
1941 年 3 月 25 日	郑来,送交出售宋版《荀子》款 4000 元	
1941 年 4 月初	送郑振铎处古籍五种,拟售于文献保存同志会,后以 26000 元成交 ^①	

① 《张元济年谱》中未标注五种古籍具体名称,“书名不详,其中似有《永乐大典》二册”。不确。根据陈福康整理的《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中所载:“张菊老处,得其藏书中最精者五种:(1)唐写本《文选》一巨册(日本有数卷,已收为“国宝”,并印为帝大丛书);(2)宋写本《太宗实录》五册;(3)宋刊本《山谷琴趣外编》一册;(4)宋刊本《醉翁琴趣外编》一册(残);(5)元刊本《王荆文公诗注》10 册(李壁著,国内无藏全帙者)。此五书,皆可称为压卷之作。菊老大病后,经济甚窘。彼意谓:将来必将散出,不如在此时归于我辈为佳。因毅然见让,计共二千六百元,实不为昂也。得《文选》,总集部可镇压得住矣;得《太宗实录》,史部得冠冕矣,得山谷醉翁《琴趣》二种,词曲类可无敌于世矣;得元刊本《王荆文公诗注》,元刊本部分足成称豪矣。”列出了详细书目及文献的重要价值。

另,1941 年 5 月 20 日郑振铎致张寿镛信中云,付“菊生先生书款六千元”,《张元济年谱》云:“又售予文献保存同志会古籍若干(书目不详),得款 6000 元。”根据《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中所记,应为以下 6 种:(1)宋刊本《春秋经传集解》16 册(以“纂图互注”本配);(2)宋蜀刊本《权载之文集》一册(存卷四十三之五十);(3)宋刊明印本《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十册;(4)《正德十六年登科录》四册;(5)《万历十四年会试录》四册;(6)《嘉靖十九年应天乡试录》四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文献抢救工作被迫中断。《张元济年谱》中频繁的关于郑振铎的记载也基本没有了。这些见证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珍贵书信也告一段落。

书信,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的主要渠道之一,包括向重庆中央图书馆递交的秘密报告也是以给蒋复璁的信件形式,在路途不便、电话不普及的情况下,同志会与重庆之间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电报及书信,使重庆方面掌握同志会的工作进展情况及主要存在的困难。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书信这一信息渠道也受到若干的限制,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日本人随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多和抢救版本图籍有关,如果一旦被查出,则不仅抢救古籍的工作受阻,而且会危及他们的自身安全。所以在委托唐弢来发信,当时他为邮局邮务员,有机会每天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付邮的信件投入邮袋而后封口,可以万无一失。郑振铎在1949年7月21日信中说:“寄发的方法甚为稳妥,可不经寻常收信员手,亦不经检查,故可放心也。”本书收入的28封托带付邮的信,看来是小事,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确实不可小视。

本章选取了以图书抢救的中心事件,现代学人对图书抢救的参与也是大范围、全方位的,这里只是选取了典型人物与特定事件,而反映在论学书信中的思想与行动也只是这一事件的缩影或是一角,与其他材料相配合,方能勾勒出现代学人参与图书抢救运动的全景图。

—— 余 论

时间行至 20 世纪末,掀起的互联网络展开了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全新图景,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存样式和生活形态。现代学术传播也迎来了全新的网络模式,而书信论学这一传统的学术传播渠道受到来自于网络的挑战,网络电邮、讨论组、BBS(讨论版)等新形式以技术上的优势对书信论学在传播的速度和效率等方面提出了种种质疑。书信论学传统也逐渐告别了其黄金时代,不再是学术传播模式的主流,而成为一种补充。但有理由相信,这种传统的学术传播渠道不会就此消亡,仍有不少留恋旧时月光的人对此情有独钟,近读美国作者海莲·汉芙著,台湾作者陈建铭译的《查令十字路 84 号》^①,译者序中有段话深得我心:

我一直相信:将手书的信件装入信封,填了地址、贴上邮票,

^① [美]海莲·汉芙著,陈建铭译,《查令十字路 84 号》,台北:时报文化,2002,后由译林出版社在大陆地区出版简体字版。

旷日费时投递的书信具有无可磨灭的魔力——对寄件人、收信者双方皆然。其中的奥义便在于“距离”——或者该说是“等待”——等待对方的信件寄达；也等待自己的信件送达对方手中。这来往之间因延迟所造成的时间差，大抵只有天然酵母的发菌时间之微妙差可比拟。

在这崇尚速度的时代里，在因技术而节省下来的时、空缝隙里，是否也有美好的事物就此流失？当冰冷的电脑荧幕上闪烁的电子邮件，取代了书信那文字与情感的质感，是否也缺失了一些什么？

电子邮件与传统的通信方式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它所体现的信息传输方式与传统的信件有较大的区别：

发送速度快。电子邮件通常在数秒钟内即可送达至全球任意位置的收件人信箱中，其速度比电话通信更为高效快捷。如果接收者在收到电子邮件后的短时间内作出回复，往往发送者仍在计算机旁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收到回复的电子邮件，接收双方交换一系列简短的电子邮件就像一次次简短的会话。

信息多样化。电子邮件发送的信件内容除普通文字内容外，还可以是软件、数据，甚至是录音、动画、电视或各类多媒体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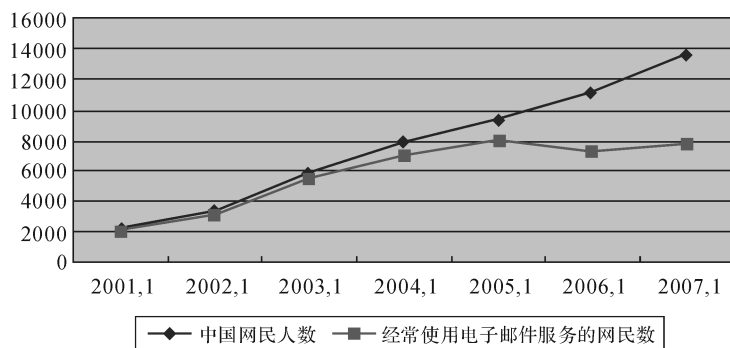
收发方便。与电话通信或邮政信件发送不同，电子邮件采取的是异步工作方式，它在高速传输的同时允许收信人自由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接收和回复，发送电子邮件时不会因“占线”或接收方不在而耽误时间，收件人无需固定守候在线路另一端，可以在用户方便的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甚至是在旅途中收取电子邮件，从而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成本低廉。电子邮件最大的优点还在于其低廉的通信价格，用

户花费极少的市内电话费用即可将重要的信息发送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用户手中。

更为广泛的交流对象。同一个信件可以通过网络极快地发送给网上指定的一个或多个成员,甚至召开网上会议进行互相讨论,这些成员可以分布在世界各地,但发送速度则与地域无关。与任何一种其他的 Internet 服务相比,使用电子邮件可以与更多的人进行通信。

下图为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网民数的增长情况以及经常使用电子邮件服务功能的网民数。使用电子邮件服务功能的网民数总体呈增长态势,从比率上看,自 2004 年开始,出现下滑趋势。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一方面中国总体网民数量在大幅度增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互联网发展,各种新的应用服务不断涌现,MSN、特别是博客的出现大量分流了一批电子邮件的使用者。



电话的普及与使用,电子邮件等互联网服务的使用,使书信这一传统的学术交流方式受到了冲击,书信的投递数量减少,内容发生变化(私人信函的减少)等都使论学书信数量萎缩,成为辅助的学术交流渠道之一。也随之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在互联网时代如何保存学术交流的痕迹,如何判断学者之间的互相启发与观点碰撞,又有多少人会完整保存电子邮件等的记录,在书写、传递、保存变得非常便

利繁荣的同时,谁又能将这些有意地保存、流传下来呢?几乎成为时代绝响的现代学人的论学书信也因之有了格外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一、著作

- 1.刘士林,20 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 2.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 4.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 5.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 1986 年 12 月版
- 7.刘焕辉,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 8.王希杰,修辞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 9.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10.沈仁干、钟颖科著,著作权法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11. 吴汉东, 知识产权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2 年版
12.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思想史的写法,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3. 羊春秋、何严编, 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 岳麓书社 1982 年版
14. [明]王阳明著, 张怀承注译, 传习录, 岳麓书社 2004 年版
15. [美]艾尔曼, 赵刚译, 从理学到朴学: 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6. 章学诚, 文史通义,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17.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18. 胡适书信集(上、中、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19. 艺风堂友朋书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20. 胡适口述, 唐德刚译注, 胡适口述自传,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21. 徐雁平, 胡适与整理国故: 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22. 胡适, 胡适文存, 黄山书社 1996 年版
23. 陈以爱,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 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25. [苏]A. И. 米哈依洛夫等著, 徐新民等译, 王熹审校, 科学交流与情报学,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
26. 周庆山编著, 文献传播学,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27. 张舜徽, 张舜徽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8. 程焕文, 晚清图书馆学术史,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
29. 李希泌、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

五四前后),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30.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31.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2.曾国藩,曾国藩家书,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33.上海图书馆编,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1981 年版

34.王国维全集,书信卷,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35.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36.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文学理论卷、
哲学思潮卷,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3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38.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39.邓逸梅、陈左高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书信日记
卷,上海书店 1992 年版

40.严绍璁,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4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年版

42.袁世英、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43.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44.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任务,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45.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46.傅斯年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47.陈寅恪集,书信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48.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1998 年版
49. 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50.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51.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52.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 1998 年 7 月版
53. 刘梦溪主编,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54. 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55.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56.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57. 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58.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5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60. 卢今等编,郑振铎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年版
61. 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 1984 年 2 月版
62. 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版
63.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
64. 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65. 张树年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66. 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67. 郑振铎全集,20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68. 卢今、李华龙编,郑振铎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69. 郑振铎,西谛书跋,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70. 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71. 章炳麟著,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72. 吴泽主编,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73. 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74. 鲁迅书信集(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版
75. 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76.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77. 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6 卷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78. 陈福康,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79.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80. 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81. 陈智超,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二、论文

1. 黄维华,书信的文化源起与历史流变,江海学刊 1996 年第 3 期
2. 谭邦和,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荆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9 年第 4 期(社会科学版)
3. 孙明君,刘勰之书信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

4. 张俊民,两千年前的私人书信,档案 1996 年第 6 期,第 35 页
5. 吴士海,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书信别称,档案与建设 2000 年第 5 期
6. 薛海兰,个人书信与修辞说略,平顶山师专学报 2004 年第 8 期
7. 李敏红,试论书信语体的语言特征,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2 期
8. 彭兰,网络中的人际传播,国际新闻界 2001 年第 3 期
9. 陆欣,书信修辞简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1995 年第 4 期
10. 安玉萍、沙莎,私人书信作品发表权论析,青海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6 期
11. 周敏,书信的著作权、物权和隐私权,河北法学 1999 年第 6 期
12. 贺卫方,史料建设,云梦学刊 2006 年第 4 期
13. 王俊义,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7 年第 3 期
14. 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读书 1996 年第 6 期
15. 杨子竞,情报的非正式交流,情报资料工作 1992 年第 6 期
16. 陈福康整理,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出版史料 2001 年第 1 期
17. 陈福康整理,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出版史料 2004 年第 1 期
18. 徐雁平,近代中日学术交流考论:以胡适与青木正儿为中心,汉学研究第 20 卷第 2 期,2002 年 12 月
19. 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胡适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20. 刘震,《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

的考察,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9期

21.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22.汪家熔,从《张元济书札》说起,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

23.汪家熔,略叙《郑振铎与脉望馆钞校本》,江苏图书馆学学报1998年第3期

24.李性忠,略论郑振铎在抢救祖国文化典籍上的巨大贡献,图书馆论坛2001年第2期

25.陈长房,厌足知性的好奇:试论英美作家全集的纂辑,台北:文讯,1998年第9期

26.罗振玉和王国维交往始末:《罗振玉和王国维往来书信》代后记,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

27.学者的幽怀与著述的体例,关于《陈寅恪集·书信集》,读书2002年第1期

28.南京大学李国红,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交流模式与规律研究,博士论文,2002

——| 后 记

时间是酵母,三年来我的这些不成熟的想法、困惑,经过揉搓、拍打,再加上时间的发酵,终于成型,无限感慨。对我而言,在研究中最 大的感受就是以往文学史、学术史中被面具化了的一个个名字,忽然变得亲近、立体起来,时空逆转,有见其面,闻其声之感,每每为他们的喜怒哀乐所动容,不由得对着在显示器下面不断闪现的 QQ 叹息。电子邮件、QQ、MSN 这些前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玩意儿代替了伏案书写、接信展读的传统书信的这些过程,似乎另外也缺少了点什么东西。亲笔书信这种用语言文字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和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形式,不仅可以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能给收信人以“见字如面”的亲切感;科技不断进步,沟通手段不断翻新,电话、电报、邮寄录音带、录像带、电子邮件、MSN 等交流信息的手段,是“书信的延伸”,同时也有使书信这种人际沟通的主流方式逐渐被取代。董桥在《“一室皆春气矣”》中说:“文学作品的最大课题是怎么样创造笔底的孤寂境界……书信因为是书信,不是面对面聊天,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处于心灵上的孤寂境界里,联想和想象的能力于是格外

机敏。”以“断处的空白依稀传出流水的声音”来比喻书信的境界,实在贴切又高妙。“雨冷,酒暖,书香,人多情;寒天得这样的信,当然‘一室皆春气息矣’”,不由得让人对书信这一传统的方式更多了几份怀想与惦念。这些诗意的描述固然可喜,对我而言,在面壁而坐枯对电脑之时,更为直接的感受就是多么希望收到远方的亲笔来信啊!

《礼记·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论文的资料搜集与写作过程中,我深深理解了“独学无友”的困窘与浅陋,与师长、同学的沟通、论疑更使我深深体会到学术交流对于一个以学术为职业、为志业的人的重要性。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他的博学与识见使我的眼界豁然开朗,对于解读历史人物时的悲悯之情,又使严肃的学术变得有血有肉,让人觉得学术的亲近,让我尤为感佩。而他的待人接物、行为举止也如同他的学术理念一样,另有一番味道,与当今学术界的名利场有“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隔”才拥有了令人难忘的“格”。要感谢我的师兄们,刘士林、刘墨、姜晓云,无论他们的名字前面挂着什么样的头衔或名称,对我而言,他们有一个更直接、更亲切的称呼——师兄,他们的优秀给了我太多的压力,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也使我有些家中“无赖小儿”的受溺爱的感觉。感谢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徐雁平博士,无论从选题、资料方面都给了我具体的指点与帮助,他关于胡适研究方面的专著与论文也给了我直接的启迪。感谢南京著名的藏书家徐雁、薛冰,他们为我敞开资料的大门,为我提供了比图书馆更为系统的藏书。感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院的何永康、骆冬青、潘大春、孙原靖、贺孟嘉、江庆柏、耿红、杨海若、周晓雯等给予我的帮助与关照。也要感谢我的同学们,愿我们的班长臧卫东在天堂里也能感受到这种温暖与喜悦。我是多么的幸运,在这样一个纯粹而美好的学术“场”中,这些都将伴随博士论文

写作时的艰辛与困惑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感谢我刚刚学会走路的儿子,我的论文写作使他失去了很多原应与妈妈在一起的时光,这让我满怀歉疚,无以补偿。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体谅和分担了生活中的琐碎事务。让我满怀感恩的心情,珍惜这段美好回忆中的所有细节。

另外特别值得一记的是 2007 年 3 月初的北京访学之行。我与师兄姜晓云带着论文初稿到北京呈给导师。我们有幸结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刘军宁、任大援、胡振宇、方李莉、秦燕春诸先生,各位先生就论文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鼓励,秦燕春博士就论文的内容、结构以及资料收集等都给予了详细的意见。经导师刘梦溪先生引荐,我们拜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他从学理层面对论文内容进行剖析,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之后,经导师刘梦溪先生引荐,我们又拜访了社科院历史所的陈智超研究员,他是《陈垣来往书信集》的编纂者,同时也是陈垣先生的孙子,与他的交谈又使我掌握了很多书本上找不到的信息与线索,在他对书信的编纂与研究的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心得也使我受用无穷。在北京著名藏书家韦力的现代私人“藏书楼”中,我也得以机会亲手展开黄丕烈、章学诚、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王懿荣等人的亲笔书札尺牍,无比激动。在这里,我要深深感谢导师刘梦溪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难得的学术机会与学术资源,同时又深深感受到学术交流的重要作用。

“转移风气,沉潜味道”,这是刘梦溪导师在赠书上所写的题签,一个伟大的学术梦想,希望我们所有的努力能让这个梦想距离现实更近一点,更清晰一点。

万宇写于 2007 年 3 月

— | 索引

A

H.门泽尔 7,73

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蔡尚思 162,163

48—53,79,81,82,86

艾青 100

安玉萍 27,29

傲择·瓦莱 (Arthur Waley) 50

B

巴金 100

白居易 40

鲍廷博 85,195

毕沅 86

宾田耕作 130

冰心 100

C

蔡尚思 162,163

蔡元培 96,99,104,105,108,

114,132—135,141—144,186

—188,194

曹靖华 98

曹溶 84

曹禺 100

岑仲勉 136

陈独秀 6,61,62,68,97,105,

108,113,135,149,151—153,

155,157

陈观胜 169

陈鹤琴 100

陈立夫 206, 207, 213

陈梦家 35

陈世骧 169

陈寅恪 1, 67, 68, 96, 105, 114, 董作宾 139

136, 139, 158, 167, 170—177, 杜牧 40

179, 183, 187 段玉裁 49, 50, 52

陈垣 68, 70, 71, 96, 104, 108—

111, 114, 135—137, 159—163,

176—181, 183, 188

陈中凡 97

程国政 24

程千帆 101

程师葛 148

D

大卫·尼维森 50

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67

戴名世 36

戴望舒 99

戴震 49, 50, 67, 83, 92, 102

黛安娜·克兰(Diana Crane) 78

邓邦述 196

邓以蛰 101

丁山 138, 139

丁声树 68

丁文江 68

丁雄飞 84

董康 115, 183, 184, 196

董作宾 139

杜牧 40

段玉裁 49, 50, 52

F

范文澜 102

范晔 40

方苞 36, 41

方豪 159—161

丰田穰 121

冯友兰 100

冯至 101

傅斯年 11, 102, 103, 105, 113,

115, 136—139, 141, 142, 145,

180, 186, 188

傅增湘 96, 182, 183, 194—196

富冈谦藏 130

G

高启 36

葛兆光 32, 53

- 龚自珍 99
顾东桥 42,44
顾颉刚 4,55,64,68,105,116,124,139,145,146
顾孟余 138
顾随 101
顾廷龙 68,107,112,194,201
顾炎武 1,19,36,39,40,46,49,50,87,88,91,92
顾毓琇 101
郭宝钧 201
郭沫若 100,105,106
郭若愚 201
郭小川 101
- H**
- 韩国钧 98
韩愈 36
何炳松 207,219,224
胡风 100
胡适 4,6,11,30,54—71,95,96,102—105,108—111,113—118,121—128,130,138,142,143,145,146,152,155—157,163—171,176—180,184
- 胡玉缙 130
黄大俞 51
黄庭坚 40
黄宗羲 19,36,46,88,92
惠栋 82
- J**
- 嵇康 36,39
江庸 96
江永 49,199
蒋复璁 202,207,221,225
蒋孔阳 101
蒋梦麟 103,142
蒋汝藻 196
蒋天枢 170,171,173,174
焦循 83
瞿启甲 196
- K**
- 康有为 101,105,152
- L**
- 莱布尼茨(Leibniz) 75
劳干 118
乐毅 36

- 雷震 96,109
 李大钊 101
 李鸿章 99
 李济 118
 李陵 36
 李斯 36
 李四光 100
 李因笃 89
 李中孚 88,91
 梁鼎芬 158
 梁方仲 118
 梁启超 4,5,47,49,50,67,68,79,80,82,87,96,103,105,111,168
 梁实秋 101
 梁漱溟 96,100
 梁思永 201
 廖梅 10,32,33,112
 廖沫沙 101
 铃木虎雄 117,128,129,131
 刘承干 196,214
 刘梦溪 33,72,158,169
 刘铭恕 172
 刘台拱 52
 刘勰 15,16,37—39
 刘哲民 201,202,206,209,211—213,216,220
 柳冕 40
 柳亚子 98
 柳宗元 40
 龙伯坚 19
 卢文昭 237
 鲁迅 5,6,23,64,65,97—99,103,105,106,117,138,139,155,163,199
 鲁仲连 36
 陆机 18,19
 陆厥 36,37
 陆侃如 55,68,116
 陆世仪 88,90
 陆原静 42,44
 吕澄 96,153
 罗常培 103,139
 罗继祖 35,95
 罗念生 102
 罗庸 139
 罗振玉 34,35,95,104,120,130,132,186,187,190,191,196
 罗整庵 42,44,45

M

- 马衡 138,186
马裕藻 138
毛子水 171
茅盾 100,105,106
梅光迪 56,58—60,63,68
孟浩然 18
缪荃孙 105,107,158,192,195
莫棠 196
默顿(Robert K Merton) 73
牟润孙 159,172,173

N

- 内藤虎次郎 128,130
聂成蔚 42

O

- 欧阳崇一 42,44
欧阳修 36
欧阳予倩 100

P

- 潘耒 87
裴度 40

- 裴景福 19
彭长卿 19
彭谷声 19
普赖斯(Derek J. de S. Price) 78

Q

- 齐耀林 196
钱大昕 40,48—50,86
钱德洪 42
钱基博 56
钱穆 3,68,126,168
钱玄同 55,61,62,68,98,113,
114, 116, 145, 152, 153,
155,157
秦牧 100
青木正儿 55,122,123,126—
128,131
裘开明 169
全汉昇 118,169

R

- 任叔永 56,57,59
容肇祖 139
阮元 52,83,86

S

桑原鹭藏 130
 沙莎 27,29
 商承祚 139
 邵晋涵 51
 神田喜一郎 117,125,128—130
 沈兼士 138
 沈士远 138
 沈尹默 135,138
 沈约 36,37,90
 沈曾植 190,196,214
 沈祖棻 101
 师陀 101
 史余邨 51
 狩野直喜 117,121—123,128,130
 司马迁 18,36
 宋濂 36
 苏秉琦 201
 苏代 36
 苏辙 36
 孙常炜 188
 孙伏园 138
 孙佳讯 69,70

孙楷第 55,103,121,183,184

孙犁 101

孙人和 130

孙星衍 86

孙毓修 195,196

孙中山 23,24,99

T

台静农 97,108,136

谭嗣同 99

汤用彤 102,169

唐顺之 36

唐弢 201,202,225

陶弘景 36

陶希圣 167

陶湘 196

陶行知 68,99

藤田丰八 130

W

万寿祺 87

汪大燮 32,33

汪康年 10,32,33,97,105,107,108,112

汪诒年 10

汪原放 68,149

汪中 53,83

王安石 36,40

王朝闻 101

王汎森 11,12,112,115

王国维 1,34,35,67,68,95,96,
99,104,105,107,117,120,

121,128—132,141,191,203

王季烈 198

王念孙 50,52,53

王守仁 36,41,43

王羲之 18,19

王瑶 101

王引之 50

王重民 55,65,66,103,164

维·A.克朗尼克(David A.
Kronick) 75

魏源 102

闻一多 97,100

翁斌孙 196

吴长瑛 19

吴晗 55,68,69

吴均 36

吴鲁星 69

吴梅 101

吴宓 105,172,174,175

吴任臣 87

吴式芬 19

吴文祺 68

吴虞 130,151

X

夏济安 32

夏敬观 196

夏鼐 201

萧红 100,163

萧乾 101

谢行惠 19

辛岛骁 121

熊十力 96,102,105

徐爱 41

徐伯郊 201,202

徐乃昌 196

徐森玉 201,212,221

徐雁平 55,65,122,123,
127,128

徐志摩 100,103

薛侃 41

Y

- 严复 96, 103, 105, 107, 117, 140
 严耕望 118
 严绍璁 121, 123
 严修 196
 盐谷温 121, 128
 阎若璩 46, 88
 晏殊 18
 晏阳初 101
 杨成志 139
 杨联陞 30, 55, 68, 95, 104, 109, 118, 163—171
 杨贤江 99
 杨杏佛 63
 姚鼐 16
 叶德辉 196
 叶景葵 193, 196
 余嘉锡 63, 64, 136
 余英时 158, 164, 167, 168, 170, 174, 175
 余永梁 139
 俞平伯 64, 98, 100
 俞樾 96, 120, 121
 郁达夫 100, 115

袁枚 19, 50

袁思亮 196

原田淑人 130

Z

臧庸 52

曾国藩 92, 93, 96, 102

曾纪泽 92

增田涉 97

张岱年 100

张凤举 206, 207

张耒 40

张力臣 88

张汝舟 68

张寿镛 207, 208, 219, 224

张舜徽 82, 87—90

张永言 149

张咏霓 9, 201, 202, 206, 208, 210, 216, 220—222

张元济 32, 68, 96, 108, 114, 117, 182, 183, 192—198, 201, 202, 206—208, 210, 215, 222—225

张之洞 102, 141, 186

章培恒 173, 174

- 章士钊 101,102
章太炎 61,62,67,96,101,141
章学诚 51,52,126
赵景深 201
赵树理 95,100—102,108,115,
118,165,169
郑孝胥 196
郑逸梅 19
郑振铎 9,101,105,149,185,
197—225
周道通 42—44
周汝昌 68
周绍良 96
周一良 167,169
周颖南 98
周永年 53,84
周永清 51
周作人 68,97,105,138,142
朱光潜 99
朱家骅 138,206,207,224
朱经农 61,68,152,155
朱维铮 10,47,49,80,82
朱希祖 137,138
朱熹 41,170
朱自清 23,32,99,144
宗白华 99,103
邹守益 41
邹韬奋 241